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近代后期文化教育史



内容提要

本书重点言教育，详细阐述和评析了这一时期世界各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重大事件、主要教育理论以及杰出教育家，突出了各国教育的相互影响、联系和交流。同时，本书还搜集大量史料，翔实地描述了此间世界语言文字的发展、研究和有卓著贡献的语言学家；介绍了世界新闻报业、通讯社、图书出版、广播电视的发展；勾勒了世界体育思想、体育制度、各种体育运动和卫生事业的发展状况。

本书对众多的教育家、语言学家、新闻出版家、体育理论家情有独钟，对他们曲折的人生经历、超凡脱俗的性格作风和独具特色的思想贡献给予了生动的介绍和评析。

一、概述

世界近代后期文化教育史研究和阐述的是 19 世纪中后期文化教育（主要包括教育、语言文字、新闻出版和体育卫生等领域）的发展过程和状况。

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走向巩固、发展和兴盛的历史时期，也是世界文化教育重要的发展时期。早在 17 世纪中叶，英国首先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此后，经过上百年的演变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在英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到 18 世纪后期，又有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和法国大革命的成功。19 世纪上半期德国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60 年代俄国和日本进行了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政治改革；同期美国发生了南北战争，北方资产阶级战胜了南方奴隶主。这表明，在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度过了它的幼年时期，决定性地战胜了封建制度，走上了成熟发展的阶段。

资本主义制度战胜封建制度，大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促进了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使文化教育事业异彩纷呈。在 19 世纪，旧教育传统的根基彻底动摇，教育观、学制、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对人的发展和培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不久就暴露了它本身固有的矛盾和弱点。它的发展和进步是以工人沦为资本的奴隶为代价的。首先起来正视这一现实的是 19 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三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深刻地抨击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试图通过教育来拯救受苦的人们，从而实现他们改造社会的理想。他们提出了包括教育在内的许多天才的见解。圣西门设计了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未来社会和国民教育计划，主张青少年要全面发展。傅立叶也提出了全面发展观。他认为青年一代不仅应具有健康的体魄、丰富的知识、高尚的道德品质，而且要掌握劳动技能和热爱劳动。他理想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和谐制度”，他的教育宗旨也是实现这种和谐。欧文则不仅有自己的教育思想，而且将其教育思想付诸实践，并以极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巨大的代价进行了社会教育实验。三大空想家真诚希望通过宣传、教育、普及知识和示范试验实现其社会改革理想，结果，与其善良的愿望相反，一切努力终归失败。

19 世纪 40 年代，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给了人们认识社会的锐利思想武器，也给教育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提出了自己的教育学说。他们揭示了教育的社会本质、社会条件对教育的制约性以及教育的社会作用，提出了科学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和全面发展的教育的思想。这一时期，工人阶级直接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迫切要求工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推动了各国的普及教育运动和教育改革。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丰富了这一时期的教育理论宝库，奠定了无产阶级教育的理论基础。

在这一历史时期，国家加强了对教育事业的干预。随着教会权威的衰落，教育逐渐从教会垄断转向由国家经办，逐渐建立起公立学校制度。

德国在 19 世纪初、美国从 19 世纪 30—40 年代相继建立起公立学校系统；英国在 19 世纪下半期加快了向公立学校制度发展的步伐。到 19 世纪末，公立学校制度已在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19 世纪，学校的宗教课已逐渐被公民课和世俗道德教育所取代。

这一时期实科教育或兼具实科性质的中等学校的发展以及课程设置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现代语文的加强，深刻地改变了学校的社会职能，密切了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各种职业技术学校的产生和发展改变了学校类型的单一性，提高了学校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中的适应能力，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德国的洪堡教育改革影响巨大而深远。这是包括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学校管理、师资建设等各方面内容的全面改革。它使德国建立起一套崭新的教育制度，使整个教育体系焕发出一种新的活力。在高等教育方面，洪堡提出了“教学同科学研究相统一”的原则，德国大学逐渐形成了学术研究自由的气氛，并展现了对外“开放”的姿态，致使世界对德国刮目相看，并成为美、法、英等国竞相效法的榜样。这一时期，自然科学进入大学课程表。大学由单纯教学型转向教学—学术研究型。这是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突出特点。在这一重大变革中，德国起了先锋作用。

1802 年，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首创世界上第一个幼儿教育机构。30 年代末期，德国教育家福禄倍尔开设了幼儿园，并发起幼儿园运动。他提出了系统的幼儿教育思想，主要包括实物教学原则、顺应自然原则和游戏教学原则等。他还开创了幼儿教育师资培训班。他的幼儿园模式和教育思想在 19 世纪下半叶风靡欧美各国。他的这些教育思想也适用于一般学校教育。总之，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学前教育机构的产生及后来的发展，开辟了世界学前教育的新时代。初等教育网的扩大则为普及义务教育奠定了基础。

世界教育发展近代，出现了新的特点。它气势磅礴、规模宏大，由被特殊阶级的少数人垄断发展到面向大众，并且在教育体制方面朝着多类型、多层次、多功能结构的方向前进。它还刷新了教育内容，完善了教学方法，丰富了教学设备，提高了教育工作者的素养，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教育质量。总之，在这一历史时期，启蒙运动中提出的教育理想大都付诸了实践。

当西方各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亚、非、拉美大多数国家沦为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而产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教育。在教育上，一方面仍以尊孔读经为主，另一方面也学习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和内容，废科举，兴学校，发展实科教育，增设自然学科等。同时，随着外国列强的文化教育侵略，帝国主义在中国也开办了许多学校。太平天国教育在这一时期的教育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太平天国为了推翻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实行了坚决的反儒方针，大力推行了普遍的平等的教育制度，把教育与政治和宗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太平天国，妇女与男子一样有接受教育、参加科举和工作的机会，开创了一代新风。洋务教育和维新派的教育也占有重要地位，从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维新派对教育的改革

主张，适应了当时中国政治和经济的需要。印度在殖民地初期，虽然西方传教士和东印度公司官员开始成为实施教育的主要力量，但主要还是“根据传统的原则来鼓励梵语和阿拉伯语的古典学习”，尽管这种教育活动已带有传播西方文化的成分。后来，逐步形成了要求在印度推行西方教育的一派。这样，就出现了印度近代教育史上的“东学派”和“英学派”。1835年，印度总督本廷克签署决议，提倡以英语为媒介、具有功利主义性质的西方教育和文化，废除以梵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为媒介、缺少实用价值的东方教育和文化。19世纪后半叶，西方化的文化教育开始在印度生根。1854年以前，印度基本上只有小学和学院两类学校；1854年印度政府颁布《教育急件》，要求建立小学、中间学校、中学、学院和大学。从此以后，这些学校基本上构成了印度殖民地教育的学校类型。埃及自1798年先后沦为法国、英国的殖民地，古老的传统教育被破坏。当时，外国人在埃及办的教会学校占优势，学费昂贵，只有富家子弟才能入学。在近代，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殖民当局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学校分为欧洲人学校、亚洲人学校和非洲人学校。教育结构以英国模式为基础，领导权属于殖民政府教育部。国内没有大学，文盲率高达90%。墨西哥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期间，所有学校均为天主教会所控制，文盲率高达95%。1821年独立后，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教育思想和英国的兰开斯特学校制度相继传入墨西哥。经过19世纪50年代的“改革战争”，特别是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天主教被赶出学校，世俗的国民教育制度才得以建立起来。巴西16世纪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1822年获得独立。当时在总人口中只有3%的人接受某种正规教育，文化教育落后，文盲率达85%。

在亚洲，只有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相应地也建立了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明治政府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总目标，也以此为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文明开化”是指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技术和知识，以保障日本的独立富强，免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1871年，明治政府“废藩置县”，设置文部省负责管理全国的文化教育事业。1872年，颁布《学制》令，开始教育改革。因当时财政困难，《学制》的改革计划虽未全部实现，但在普及小学教育、建立师范教育制度和推动教育发展中起了积极作用。1877年，明治政府把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合并，建立了东京大学，这是日本第一所近代化的大学。从1873年到1878年小学校数和学生数都增加了两倍多，适龄儿童入学率也由28.1%上升到41.2%。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了国家主义教育制度，助长了军国主义。

在19世纪，英、法、德、美、瑞士和俄国涌现了一些杰出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问世了许多系统的教育理论著作。裴斯泰洛齐对初等教育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推动，贺拉斯·曼和巴纳德对公立学校运动的推动，表明了他们既是普及教育的推动者和领导者，又是教育理论的拓荒人。他们身体力行，克服重重困难，为新教育制度奠基，体现了一种呕心沥血的教育的精神。

他们深入探索教育教学的内在规律，探索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规律，重视受教育者在教学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以及在教育活动中自身活动的作用。在这方面，裴斯泰洛齐和乌申斯基作出了突出贡献。赫尔巴特

也注意研究了受教育者在教学中的能动作用。他认为兴趣是人的意识的“内在动力”，培养多方面的兴趣是教育的直接目的。他提出了包括管理、教学和训育在内的教育学体系，提出了教育性教学的理论。他认为教育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相反，道德教育（或者品格教育）如果没有教学，就是一种失去了手段的目的。他明确提出了道德是人类的最高目的，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思想。在乌申斯基系统的教育思想中，民族性教育原则是其教育理论体系的基础。他的民族性思想，包含着深刻的人民性思想，并强调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强调民族语言的学习。这些教育思想至今仍是全世界的珍品，对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仍具有显著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教育家是令人尊敬的。人类永远不会忘怀他们所做出的贡献。1846年裴斯泰洛齐百年诞辰之日，瑞士人民给他立了一块纪念碑，碑文深情地写着：“在新庄，你是穷人的救星；在《林哈德和葛笃德》中你是人民的导师；在斯坦茨你是孤儿之父；在布格多夫，你是国民学校的创始人；在伊佛东你是人类的教育家。……裴斯泰洛齐之名，万古长存！”

德国教育家福禄倍尔被世人尊为“幼儿教育之父”，人们把他的名言刻在他的墓碑上：“来吧，为我们的儿童生活吧！”德国人民高度评价民主主义教育家第斯多惠，誉他为“坚决走进步道路的古典教育的典型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期还颁发了“第斯多惠奖章”，用以表彰和奖励功勋教师。

贺拉斯·曼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名誉学位，并在1900年被选定作为列入纽约大学美国伟大纪念堂的第一位教育家。亨利·巴纳德则以“第一流教育家”饮誉全美国。

美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到1894年其工业生产就跃居世界首位，生产量占欧洲各国生产总量的一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一甩文化落后的帽子，与欧洲文化先进之邦并行。这与美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及实行进步的教育制度直接有关。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沉重的封建历史重担，更易于创新和轻装前进。美国教育注重学习欧洲进步的教育措施和教育理论，并与本国实际密切结合，这是很有意义的经验。另外，美国注重调动各方面社会力量的积极性来发展教育事业，把现代科技广泛地引入教育领域，也是促进美国教育迅速发展的原因，值得借鉴。尽管美国社会制度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社会上也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差别和种族歧视，并没有真正实现教育机会均等，但是，美国教育把来自众多国家的移民融合为一个统一的美利坚民族，并以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称雄世界，说明它的教育是成功的。

语言文字是人类的伟大创造，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是世界语言文字发展和研究的重要时期。许多种语言的词汇量都得以扩大和丰富，例如英语、法语、德语和汉语，都从别种语言中引进大量词汇，并自创了许多新词。这一时期也是许多语言的标准语形成的重要阶段。挪威语、阿非利堪斯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摩尔达维亚语、俄语、乌克兰语、斯洛伐克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芬兰语及马达加斯加语都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标准语。在19世纪80年代，国际语音协会制定了国际音标；波兰医生柴门霍夫创造了世界语

方案。在语言学的研究方面，一些学者提出了历史比较研究法，构拟了印欧语系诸语言的谱系，对语言历史演变规律的研究有重要突破。历史比较语言学派和新语法学派作出了突出贡献。各国的外语教学普遍得到了重视，外语教学研究和翻译理论都有新的建树。1880年欧洲兴起了外语教学改革运动，1887年国际语音协会提出了外语教学的6项原则，强调外语教学要重视口语训练，提高应用能力。外语教学的加强和翻译事业的发展，促进了世界范围的文化教育交流。

19世纪也是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新闻事业的历史发展大体经历了口头新闻阶段、手抄新闻阶段、印刷新闻阶段和电子新闻阶段。19世纪世界主要处于印刷新闻发展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工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和新教育制度的确立，受教育的人数迅速扩大。市民文化程度的提高和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增加了对报纸的需求。另外，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报纸得以通过广告取得丰厚的收入，这也为报业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条件。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欧洲许多国家都逐渐取消了对新闻出版物的限制，报纸的职能也从一般传递信息发展成为进行政治斗争、宣传教育和制造舆论的工具。可见，这一时期报业的发展已成为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和政治团体的需要。于是，报业就从私人办的小企业发展成为与政党、工业金融资本家密切联系的有利可图的大企业。

19世纪世界各国报业迅速发展。世纪之初英国资产阶级就提出了自由出版报纸的要求；30—60年代廉价报纸纷纷创刊，出现了“一便士报”。1819年，法国司法部长塞尔主持制定了新闻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以后，政府颁布法令进一步扩大新闻自由，减少报纸税金；30年代诞生了哈瓦斯通讯社，这是世界上第一家向订户供稿的通讯社。19世纪民主自由的思潮在德国得到广泛传播，1848—1849年在普鲁士和奥地利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取消对报纸的限制，形成了办报热潮，还出现了工人阶级的报纸。世界上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报纸——《新莱茵报》（全称为《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于1848年5月在科伦出版。到八、九十年代，维也纳成为欧洲报业中心。这一时期，俄国、意大利和瑞士等国的报业也大有发展。独立后的美国报业更是发展迅速。到1830年，美国全国拥有8000以上人口的城镇仅26个，但全国竟出版发行日报65家，周报350家。到19世纪中叶，美国约有日报400家，周报3000多家。

18—19世纪，亚、非、拉广大地区和国家受到欧美殖民主义者的控制，殖民当局创办了主要用宗主国文字出版的报纸，成为亚、非、拉广大地区报业的开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本地人创办的以国语为主的报纸也纷纷诞生。这些报纸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号角和喉舌。

在19世纪，世界印刷技术和出版规模都有惊人的发展，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这一时期世界许多国家都诞生了出版社、新闻通讯社和公共图书馆，并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出版商。1835年法国创办的哈瓦斯通讯社、1848年美国创立的港口新闻联合社、1850年英国创办的路透社，后来都发展为世界性的大通讯社。

19世纪下半叶，英、法两国几乎同时出现近代“公共图书馆”，这是图书馆发展史上和人类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英国的爱德

华兹被誉为公共图书馆运动的“精神之父”；还涌现了英国不列颠博物馆的杰出馆长帕尼齐，人称“图书馆员的拿破仑”。杜威为美国图书馆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创造了《杜威十进分类法》，对图书管理的科学化和进步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随着科学技术和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国际交往扩大，一国作者的作品被他国翻译并出版的情况日渐增多，于是提出了国际版权的保护问题。为了保护本国作者和出版者的利益和控制国外图书市场，丹麦于1828年率先提议建立国际版权法。出版业发达的法国在1843、1851和1852年分别同意大利、英国和比利时签订双边版权保护协定。以后美国也参加了这一活动。1886年，法、德、英、意、西等10个国家正式签署《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1887年生效）。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出版公约，它的签订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化的平等交流。

总之，19世纪是世界新闻出版事业迅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19世纪中叶电报发明以后马上被用来传播新闻，使新闻传播有了革命性的进步。20世纪初，美、英又相继开始运用无线电广播和电视来传播新闻。这两种新闻传递方式具有迅速、逼真和不受距离限制的优势，立即受到全世界各国的重视，成为当今世界普遍的重要的新闻传递工具。

19世纪是世界体育运动的勃兴时期，也是人类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里，欧洲大陆先后形成德国体操、瑞典体操两大体系和学派。英国的传统户外运动、游戏也迅速得到改进，并逐渐向规范化方向发展。一些新的运动形式或项目，如棒球、排球等相继产生；一些国家纷纷建立体育制度，包括学校体育、体育管理、体育专业教育等制度。随着体育交流的扩大和加深，近代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其他国际组织也相继成立，从而大大改变了世界体育运动的面貌。

体育和卫生是与人类繁衍、生息、发展密切相关的永恒课题，是人类进步文明的重要标志。许多有远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都非常重视体育。19世纪著名的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在他的要素教育理论中，就包括体育。他主张体育应同教育的其他方面配合进行，以保证人的和谐发展。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进行过社会主义的各种实验。他创立的学前教育机构特别重视体育，许多时间都在户外对儿童实施体育和智育。马克思从欧文的实验中看出“未来教育的萌芽”，并且认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恩格斯在《欧洲能否裁军》一文中对青年的体育问题也有详尽的论述。这些超前意识促进了19世纪体育事业的发展。

19世纪的世界卫生事业在某些方面有突破性发展。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医学基础理论的发展，增加了人类的环境意识和防病意识，在西欧出现了实验卫生学。许多卫生学家开始用实验的方法研究空气、水、土壤和住宅等生活环境和工厂、矿区等生产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关系。

产业革命以后，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一方面使生产力得到发展；另一方面工业发达的城市和工矿区也产生了大量的废弃物，污染环境的事件不断发生。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详细记述了当时英国曼彻斯特污染的情况。1873年、1880年、1882年、1891年和1892年英国伦敦多次发生可怕的有毒烟雾事件。19世纪后期，日本足尾铜矿

区排出的废水毁坏了大片农田。这些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存极为有害。为了保护环境和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叶一些国家开始通过有关卫生、安全和福利的立法,许多国家都颁布了保护童工、女工和保持公共卫生的法律,并成立了卫生管理机构,健康教育也陆续开始在各 国实施。但对各国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在19世纪,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还是很差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工人农民阶级的处境更为恶劣。

世界各国文化教育总是通过彼此接触、相互交流而向前发展的。交流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方好的东西,他人必来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说,19世纪就是一个交流的时代。就文化教育而言,世界各国互相考察、交流、学习,大大促进了文化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在19世纪初叶,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他的教学法和教育改革实验,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英、法、俄、西班牙等国纷纷效仿,出现了“欧洲的裴斯泰洛齐运动”。许多国家的教育工作者登门求教。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福禄倍尔都深受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的影响。裴氏教育理论还间接传入美国。

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在19世纪中期以后超越德国而走向世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赫尔巴特学派运动的中心由德国转向美国。明治维新20年之后,赫尔巴特教育思想在日本大为兴盛,中国学者也从日本间接受到赫氏教育思想的影响。

19世纪美国高等教育深受德国式现代大学的影响。约翰·霍布金斯大学首任校长吉尔曼曾到欧洲许多国家考察教育,并于任该职前专程到德国考察,学习创校和管理经验。他还从德国邀请著名教授到霍布金斯大学任教。美国曾一度掀起留学热。在19世纪,美国陆续去德国的留学人员就达9000人之多。他们深受德国学术自由气氛的熏陶,把德国的学术传统、科学教育思想移植到了美国。

东方国家学西方是19世纪中叶以后兴起的潮流。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提出了“破从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两条原则,把学习西方、兴办教育作为基本国策。日本教育领导体制仿效法国,实行中央集权的大学区制;中学课程设置重视外国语课;重视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学习德国教育经验,兴办实业学校等。

中国吃尽了闭关锁国的苦头。国门被迫打开之后,西方的新鲜事物令人目不暇接,许多有识之士积极主张学习西方。秦朝以前是中国本土文化起源、融合与发展时期,汉代以后进入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汇期。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中外文化的交汇有两次,第一次是晋唐间与佛学的交流,第二次是与欧洲文化的交流。第二次大交汇开端于明朝万历年间,直至20世纪,19世纪中后期是一个重要阶段。这次文化大融汇,既不同于两汉时期对落后于本土文化的西域草原文化的吸收,也不同于魏晋唐宋时期对与本土文化水平不相上下的南亚文化的借鉴,这一次中国人面对的是水平超过自己的欧洲(后来又有美国和日本)文化。冯友兰先生曾说过:“中国民族,从出世以来,轰轰烈烈,从未遇见敌手;现在他忽逢劲敌,对于他自己的前途,很无把握。所以急于把他自己既往的成绩,及他的敌人的既往的成绩,比较一下。”耶稣会教士来华,他们肩负着罗马教廷向东方实行殖民的使命,为了叩开封闭的“远东的伟大帝国”的大门,“不使中国人感觉外国人有侵略远东的异志”,确

立了“学术传教”的方针，即通过介绍西洋科学、哲学、艺术，引起士大夫的注意和敬重，以此扩大耶稣会的影响。耶稣会教士来华固然意在传教，却带来了广泛的欧洲文化，客观上促进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如太平天国的洪仁玕、洋务派及维新派思想家，都力主学习西方。在这种形势下，兴起了洋务教育。洋务教育的方针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注重传统伦理道德教育的同时，进行外国语文、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训练，并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1872—1875年间，中国百余名留学生赴美，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维新派不仅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主张研究西方社会的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

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也传入印度，冲击了印度古老的陈规陋习，为印度现代文明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文化教育的产生是多元的。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在自己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创造自己的文化教育。从而构成全世界文化教育发展色彩斑斓的画面。然而，各国文化教育又常常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在和平共处的条件下互相取长补短的。不少国家都有过闭关锁国的教训，因为严格限制与外部世界的经济文化交往，而孤身置于世界经济文化生活的大潮之外，从而失去了曾经有过的生气和魅力。

放眼世界，纵观历史长河中世界文化教育的波波折折，把中外文化教育加以比较，深刻领悟人类文化教育的整体性，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改革开放政策的英明，使我国在未来的世界发展中再展雄风，再创辉煌！

二、西欧主要国家的教育

1. 法国教育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教育变革彻底摧毁了封建等级教育制度，逐步建立了近代教育制度。在整个19世纪，法国基本上保持着拿破仑一世建立的中央集权的教育体系。但是，从波旁王朝复辟到巴黎公社50多年期间（1815—1871年），法国在政治上经历了复辟与反复辟、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的反复较量和斗争，在教育方面也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

(1) 波旁王朝复辟时期（1815—1830年）的教育

1815年7月，路易十八（路易十六的弟弟）推翻拿破仑的“百日王朝”，再登王位，史称波旁复辟王朝。路易十八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实行有利于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政策，企图把教育变成为其复辟服务的工具。开始，复辟王朝曾想废弃拿破仑一世创建的帝国教育制度，后来又不得不保留，但取消了由政府任命的教育总监，成立了主管公共教育的王室委员会。复辟时期教育完全由教会控制，宗教教育大为强化，普通教育日趋衰落。

在法国教育史上长期存在着教会反对国家管理教育的斗争。教权主义者加强在教育领域里的进攻成为复辟时期法国教育的一大特征，“教育自由”是他们反对国家管理教育的口号。这一口号的主要倡导者是拿破仑。在复辟初期（1815—1820年），王朝政权对天主教会的让步尚有

限度，但路易十八上台的第二年就颁布敕令，强调教育以宗教和道德准则为基础，肯定了发展教会学校的合理性，对其控制与监督比拿破仑统治时期大大放松。复辟王朝后期，即 1820 年 6 月修改选举法以后，极端保皇党人在众议院占据了统治地位，王朝政权更趋反动，更加强了宗教对教育的控制。弗雷西努乌斯主教被任命为新设立的宗教事务与公共教育部部长以后，他的目标就是扩大天主教会在帝国大学内的影响，采取了免除教会学校一切税收和世俗政权对教会学校的监督、乡村神父可以在家培养两三名学生、帝国大学优先选择神职人员担任教师等措施。这些教育政策对法国教育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法国的初等教育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没有什么发展，但在拿破仑统治末年和复辟时期，发展初等教育的社会呼声很高。1816 年 2 月，王朝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在每一市镇设立一个委员会，负责支持和指导初等教育的发展，要求所有儿童都要接受初等教育，“贫穷儿童免费受教育”。但是，一方面这些规定并没有认真执行；一方面更加强了教会的势力。1819 年 3 月的通令则将基督教学校兄弟会并入帝国大学，免除其成员领取教学证明书的手续，使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治权，强化了教会对初等教育的控制。到 1830 年，基督教学校兄弟会所办的初级学校已达 1420 所。总之，这一时期的初等教育既缺少经费，也没有固定的校舍，教师也由水平较低的人充任，教育质量很差。

复辟王朝将拿破仑时期创办的国立中学改名为皇家中学，加强了古典主义倾向，办得没有生气，使之完全成了贵族特权学校。但是，为了适应工商业发展的需要，1829 年在市立中学开设“特别班”，学制 2 年，课程为现代外国语、商业理论、数学、物理、化学及其应用、绘画及测量等。这个时期还出现了艺徒学校和为女工而设立的“幼儿收容所”。

在复辟王朝后期，教育领域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力量逐渐加强。1828 年初，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华特门尼斯尔被任命为公共教育部部长，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恢复招生。1882 年 6 月，查理十世被迫发布敕令，禁止耶稣会的教士从事教育活动。

总之，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教育的发展遇到了严重阻碍，甚至连当时的教育部长都承认：“行将倒塌的校舍，饥饿的教师，书本缺乏——就是法国国民学校一幅悲惨的现状图。”

(2) 七月王朝时期（1830—1848 年）的教育

1830 年 7 月，巴黎人民举行起义，推翻了波旁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普为国王的七月王朝。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七月王朝时期，初等教育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较快地发展起来。

1831 年，法国政府派库森到普鲁士学习当时被称为全欧最优秀的教育制度。他回国后撰写了《普鲁士教育报告》，介绍了普鲁士教育制度、教育政策、地区和家长的教育责任、课程及教学方法等，提出在法国制定初等教育法律的必要性。

1832 年基佐担任法国教育部长，1833 年通过了著名的基佐法案。法案规定，每一乡镇设初等小学 1 所，每 6000 人以上的城镇设高等小学 1

所，每一省设 1 所师范学校。教师经过国家考试合格取得能力证书者，方可任教；废除 1830 年以前教会颁发教师资格证书和教士担任教师的特权。国家保证教师获得最低限度的薪俸。师范学校由 1833 年的 33 所，发展到 1838 年的 76 所；到 1848 年，法国小学校增加一半，学生人数增加 80%。这一时期小学的办学条件还是很差的，教师的工作和生活都极为困难，体罚学生的现象在学校极为普遍，也没有提出免费普及义务教育的问题。

七月王朝时期，中等教育几乎停滞不前，学生人数没有明显增长，毕业生也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在教学改革方面，大学更表现出惊人的保守，许多人仍坚持古典主义传统。但科学和工业的发展都要求革新教学内容，两度担任教育部长的萨尔旺迪提出了某些教学改革的主张。他强调了科学与数学的教学，主张削减希腊文的学习，增加英语和德语的教学。他的改革主张没有取得实际效果。七月王朝时期还强化了考试制度，形成了考试大纲，把学生引向了集中精力应付考试的方向。

在七月王朝时期，关于学校的控制权问题仍然是教育领域中争论和斗争的中心问题之一。教权主义者坚持“教育自由论”，认为指导与监督教育是教会的神圣权利。帝国大学评议会的成员虽不完全否定学校里的宗教教育，但却认定国家负有培养公民的责任，只有国家管理教育才能保证民族的团结。1836—1847 年，一项关于教会可以自由设立学校的法律草案在国民议会中反复辩论，终未通过。

(3) 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2 年）的教育

1848 年 2 月，法国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七月王朝，宣布恢复共和制，法国进入第二共和国时期。还在 1848 年革命期间，教育部长卡诺就提出了一个国民教育改革法案，规定对 14 岁以下男女儿童实施普及、强迫和免费的初等义务教育，免费供给学生书籍和膳食；广泛开设图书馆；扩充小学课程范围，删去神学的教学内容。但是这个法案未能付诸实施，并且国民教育方面的反动势力日益抬头，教师的处境日益恶化。1850 年颁布的“取缔学校教师法”规定，学校教师可以由省长任意免职或给以纪律处分。不久又把国民教育事业全部交给了僧侣和耶稣会教徒，并加强了政府对学校的监督。

卡诺担任教育部长时，还仿照巴黎理工学校的范例拟定了建立公共行政学校的计划。这个学校于 1848 年 7 月开学，1849 年 8 月被秩序党人控制的立法议会所关闭。卡诺的教育活动虽然没有取得实际效果，但他的进步方向获得了群众的拥护。

1848 年以后，法国教育事业一度陷入黑暗之中。起义失败后不久，有 800 余名进步教授被逐出高等学校。1850 年通过的法卢法案又把教育界的要职拱手交给主教及教会人员。法案规定，各大学区改为分属各省，其总长也不一定来自教育界；法案还提出加强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教育部长通过总督学对全国教育进行管理。法案正式宣布终止国家对教育的垄断，承认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具有同等地位。法案还规定，一切初等学校都应定期接受天主教神甫或新教牧师的监督，以保证宗教教育，法卢法案完全否定了卡诺改革法案。

(4) 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年）的教育

1852年路易·波拿巴称帝，法国进入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为了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巩固个人的权力，实行军事独裁，并把天主教会作为控制人民的精神工具。这一时期的法国完成了工业革命，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政府和教会对学校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初等学校全部为教会所掌握，小学课程以神学为主，在整个教育工作中都贯穿着宗教思想和君主制度精神。

由于法卢法案的推行，私立男子小学到1863年增加3倍，私立女子小学发展到14500所，而公立女子小学只有6500所。在许多公立学校中也有许多教会人士占据教师席位。小学教师的生活待遇没有保障。

第二帝国时期，教会的私立学校猛增，到1854年，教会中学的学生数已达2万以上，到1865年，其人数已占学生总数的24%。这说明宗教影响在中等教育领域的加强。

为了适应工商业发展的实际需要，中等教育结构也进行了几次改革。首先恢复国立中学和市立中学的名称，学制定为7年，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高级班实行文实分科，文科班注重古典语文，实科班增开现代外语、自然科学等。1864年取消中学的分科，开办实科性的中学，学制6年，为工商业培养专业人员。

这个时期，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作为技术教育组织的学徒制早已崩溃，兴起了各种工业学校。1852年东部铁道公司开设了徒弟学校；1864年还为女工创办了工业学校。这些学校要求学生在实习工厂进行生产工程技术学习。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变化，特别是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统治阶级对普及初等教育和女子教育开始有所重视。1865年3月，迪律伊又向立法团提出关于实施免费初等义务教育的建议，但未形成法案。不过在自己的任期内增加了一些城市的初等教育经费，增加了享受免费初等教育的学生人数。初等教育增加了法国历史、地理等教学内容。这一时期初等师范学校的工作也有所改善。1867年迪律伊又向立法团提出了加强女子初等教育的建议，并得到了帝国大学的支持，组织了有关团体来推进他的计划，取得了一些实效。

(5) 巴黎公社时期（1871年3月—5月）的教育改革

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以梯也尔为首的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成立了巴黎公社，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72天，却采取了许多政治经济改革措施，使劳动人民获得了解放。教育改革是巴黎公社伟大创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是：

成立教育委员会。3月18日以后，教育改革问题很快被提出。巴黎的许多区和教育群众组织都纷纷发表宣言，提出对教育的要求和建议。3月29日，公社成立了相当于政府部一级的教育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着手改革教育”，“起草免费普及的全部世俗教育的法令草案”。4月20日，教育委员会进行机构调整，由公社委员瓦扬主持工作。为了尽快在巴黎各区举办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尽快把宗教教育改造成世俗教育，决定成立教育组织委员会。另外，还成立了妇女教

育委员会，以示对妇女教育的重视。

爱德华·瓦扬被认为是领导教育委员会工作的最佳人选。他受过良好教育，曾获医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又是一位工程师，是第一国际会员，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有过直接联系。瓦扬在公社的教育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向对全面教育和职业教育有研究的人呼吁，要求他们向教育委员会提出改革建议，以便集思广益，制定出好的教育改革方案，制定各区统一的教育制度。

实行学校与教会分离。教育世俗化是公社教育改革的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措施。4月3日巴黎公社颁布了政教分离的法令。根据政教分离的法令，公社多次研究了如何使教育摆脱宗教束缚的问题。4月28日，瓦扬签署文件，要求各区将实现教育世俗化作为一项紧急任务，并责成教育委员会具体负责这一工作。5月11日，瓦扬又颁布了一道要求革除一切宗教象征、神象、教义及在学校实行祷告的命令。

根据公社的命令，各区政府广泛宣传以世俗教育全面取代宗教教育的方针政策，并从学校中清除教会人士，挑选世俗教师管理学校，并清除学校中的一切宗教教育措施与活动，如圣母像、十字架、宗教图案和宗教课、祈祷等，加强了科学知识和道德品质教育。

学校与教会分离，实行教育世俗化，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公社的命令到处遇到反抗，一些教会僧侣对公社命令置若罔闻，拒不离开学校。

实施普及义务教育。巴黎公社将实施普及的免费义务教育作为重要任务。公社及各区的教育文件都强调教育的普及性和义务性这一要求。第二区的呼吁书指出：“世俗的、免费的和义务教育，这是革命应集中力量促使实现的纲领”。《巴黎公社社员告劳动农民书》说，要让农民的儿子和财主的儿子受同样的教育，而且是免费的教育。第十区政府在《通知》中指出：“凡6岁到15岁的儿童，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只要持有区政府的证件，即可报名入学”。由瓦扬签署的《关于设立普通教育职业学校告各区政府书》指出，教育改革将“保证每个人得到社会平等的真正基础，即每个人都有权享受的全面教育，使他们容易学习和担当与他们的爱好和能力相适应的职业”。瓦扬认为，通过这样的教育改革能够确立公社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任务。

为保证普及义务教育的实施，巴黎各市区对本区的适龄儿童都进行了调查和统计，动员家长送子女上学。第三区区政府还发出了学校免费供应学生学习用品的通知。有的区还为贫苦儿童提供膳食和衣物。公社还办起了托儿所、幼儿园及孤儿院和寄宿学校。

公社提倡全面教育，并注意发展职业教育。要求青少年学习一切有益的科学知识，并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5月6日，公社在第十五区开办了一种新型职业学校，除对学生进行职业训练外，还讲授一般文化科学知识。

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思想品德教育。在巴黎市区有关教育的文件和报刊上，强调了革命的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培养儿童尊重劳动者和热爱劳动的情感，提出好公民应该热爱祖国，为祖国劳动，善于将自己的利益和祖国利益结合起来，必要时能为国捐躯。公社还组织少年儿童参加保卫公社的实际斗争。

解决教师待遇问题。在法国，特别是1848年革命失败后，法国

教师的地位极低，待遇很差，女教师的薪金更少。不少教师为了生活，不得不兼职。巴黎公社把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和改善教师生活待遇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首先由于教育世俗化政策的实施，使教师从神职人员的监视和压迫下解放出来，成了学校和社会的主人。5月21日，公社通过了一项关于提高教师年薪的决定，其中规定助理教师的最低年薪为1500法郎，教师的最低年薪为2000法郎，男女教师同工同酬。教师薪金比第二帝国时期提高1—2倍。这些措施激发了教师的革命热情，他们努力工作，积极贯彻公社的教育政策，迅速改变了旧学校的面貌。许多教师在后来保卫公社的斗争中表现了惊人的勇敢精神。巴黎公社在严重的战争环境中，在短短的72天中，对教育改革做出了重大努力，提出了许多富有革命意义的措施。它提出的学校与教会分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使人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使学校真正为劳动人民服务，这从根本上改革了教育的性质。巴黎公社提出的许多教育改革措施，对今天的教育发展似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2. 英国教育

英国是最早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并于18世纪中期最早开始了产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促进了英国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给教育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和新的要求，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也都以发展教育来充实自己的社会改革方案。到19世纪，各级各类学校均有较大发展，新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改革实验亦百花齐放，异彩纷呈。

(1) 英国的教育体制

传统的英国教育的领导权一直不在国家手中，而是由罗马教廷属下的英国天主教会所操纵。1534年，英国脱离罗马教皇而自立教派，称为英国国教，教会又受制于国教教会。产业革命前国家对教育不管不问，把教育看作是一种慈善事业，教会和私人办初等教育，是一个突出特点。

产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发展，要求工人接受一定水平的教育，以成为合格的劳动力。这一实际需要促使英国于19世纪初开始实行国家直接管理学校的措施。教育管理权由教会手中转到国家手中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首先是广大劳动群众为争取受教育权进行了斗争，要求国家为人民开办学校，迫使政府于1802年颁布一项学校法案，规定企业主应负责对工厂学徒进行读、写、算方面的教育。但这道法令并未实行。直到30年代，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才逐渐引起政府对学校的重视。与此同时，在国会里也展开了关于国家办不办教育的争论，一些议员还提出了具体的议案。1806年，议员怀特布雷提出教区学校议案，建议国家在每一教区设立学校和管理学校。这是国会首次以国家名义讨论国民教育问题，但当时未有实施。1833年，财政部长阿尔索普提出教育补助金法案，由国会通过。议案决定每年从国库中拨款2万英镑作为对初等学校的建筑补助金。以后该项拨款逐年稳步增长。这是英国从只把教育看作宗教教

派活动或民间活动，向教育国家化的转折点，也是国家直接把握教育领导权的开端。起初，国会仍把补助金的管理与分配权交给国教派和非国教派团体处理。1839年，英国政府首次设置了“枢密院教育委员会”，直接掌握、监督补助金的分配。1856年，枢密院教育委员会改组为“教育局”，成为政府领导全国初等教育的机构。关于中等教育问题，则由不定期临时组成的各种委员会进行调查和处理。到1899年，为彻底解决中等教育领导权问题，废除教育局，建立了直属议会的“教育委员会”，解决了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领导权问题，初步实现了英国教育领导体制的国家化。1902年，又颁布巴尔福教育法案，规定在各郡和郡级市设立地方教育局，负责地方教育的教育经费、行政领导和教育监督。这一法案的颁布结束了英国教育管理上长期混乱的状态，使英国形成了国会、教育委员会和地方教育局相结合、并以地方教育局为主体的教育行政领导体制。

(2) 国家开始重视初等教育及初等教育的发展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普及初等教育的主张未能实现，工业革命使解决普及初等教育的问题更为迫切。这一时期初等教育得到了很大发展。19世纪初 苏格兰基督教知识普及协会就设有学校 290 所，学生 16000 人。

1834年，英国政府颁布“工厂法”，规定9—13岁的童工每天劳动8小时或不超过9小时，每天应在工作时间内接受2小时的义务教育。1844年又对“工厂法”作了补充规定，童工必须交上学证明。1846年“工厂法”又进一步明确规定“工厂教育是强制性的，并且是劳动条件之一”，即14岁以下儿童没有接受初等教育，不准到工厂做工。实际上，不少工厂主并不认真遵守这一法令。但无论如何，“工厂法”规定童工必须受教育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另外，“工厂法”的实施也为英国政府颁布“初等教育法”奠定了基础。

工业革命的完成和欧美各国经济的发展使英国政府意识到初等教育对于国家的重要性，1870年英国国会正式颁布“初等教育法”，其主要内容是：

国家继续拨款补助教育，并在缺少学校的地区设置公立学校。

全国划分学区，由经过选举产生的“学务委员会”来负责监督本学区的教育工作。

各学区有权实施5—12岁儿童的强迫教育。

承认以前各派教会所兴办或管理的学校为国家教育机关。

学校里的普通教学与宗教分离。凡接受公款补助的公立学校，一律不得强迫学生上特定的宗教教义课程。

“初等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英国国民教育制度正式形成。从此，在英国实施初等教育和强迫教育成为国家的专责。

19世纪上半期，由宗教团体和慈善机构办初等教育的情况更为普遍。他们自筹资金办学，使劳动人民子女接受一些初步的文化知识教育。由于缺乏师资，当时出现了一种相互教学制学校，又称导生制学校。

导生制学校是英国牧师倍尔和教师兰喀斯特两人所创造的，故又称倍尔—兰喀斯特制。方式是：让年龄较大、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充当教

师的助手，教师先对他们施教，然后由他们去教其他学生。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师资不足的问题，学生数量大大增加。倍尔——兰喀斯特在英国风行一时，但持续时间不长，因为这种方式不能给学生以系统的知识，不能使学生对所学的知识有较深的理解。

由工厂设立童工学校在 19 世纪初成为紧迫的任务。由于工厂法的颁布和宪章运动的兴起，为童工争取教育机会成为工人运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工厂学校比较广泛地设置起来，但良好的工厂学校不多，大部分学校师资不良，学科简单，设备缺乏。

19 世纪初，英国开始出现学前教育机构，发起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他在新拉纳克进行教育实验时，为工人阶级建立了第一所幼儿园和托儿所。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工厂也举办幼儿学校，并于 1824 年成立了幼儿学校协会，举办幼儿教育师资培训班。这个协会的活动坚持近 20 年。后来幼儿学校被纳入英国学制体系。

英国是一个实行私人办学的国家。1870 年“初等教育法”颁布后才有了公立学校。该法还规定，私人举办的学校经政府核准并受政府视察者，方为认可学校，否则虽允许其存在，却不予补助，称为私立学校。这样，英国形成了公、私学校并存的制度，开始了初等教育发展的新阶段。

(3) 普通中学改革和职业技术教育

直到 19 世纪前半期，英国中等学校的基本类型还是公学和文法学校。这些学校的共同特点是以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学为主，形式主义和脱离现实生活的倾向非常严重。产业革命以后，这类中等学校不能满足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弱点充分显露出来。这种情况引起了教育界的关注和批评。1861 年，英国议会组织“公学调查委员会”，对当时著名的九大公学进行调查，提出了改革学校管理的建议，要求增设数学、历史、地理、近代外语及自然学科等课程。

1864 年，英国议会又组织了以丹顿为首的“中学调查委员会”，用 4 年时间，对除公学以外的 1000 所中等学校进行调查，并提出了报告书，指出中等学校不足，水平不齐，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等问题，提出了多开办中等学校和增加学校种类的建议，明确提出按社会阶层的不同开设三种类型的中学，分别面向大有产阶级子弟、中产阶级子弟和中下层平民子弟，教学目的和培养目的也各不相同。这是一份露骨的不平等的教育计划，当时议会未予通过。但它对后来英国中学形式的发展仍有不小的影响。

从 19 世纪中叶起，出现了寄宿女子中学和实科性中等学校。这类学校重视数学、物理、自然、历史、地理、语文和现代外国语的教学，课程设置与实际生活比较接近，所以发展很快。

1872 年以后，为鼓励学校对自然科学学科的重视，政府规定凡能开设三年自然科学课程的学校，给予特别的补助。这一规定促进了实科学学校、技术学校和普通中学中理科班级的发展。这时，不仅有产阶级子弟可以上中学，也鼓励一般劳动人民子女进入中学学习，以满足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在此期间，英国的科学技术教育进展很快，到 1886 年有关科学技术学校的学生人数达 18 万多人。

(4) 师范教育

英国的师范教育发展较晚，直到 19 世纪中叶才初具规模。这与英国初等教育发展较迟有关。

19 世纪初产生的倍尔——兰喀斯特制带有培训小学教师的因素，被认为是英国师范教育的雏型。1806 年，“兰喀斯特协会”曾提供“培养青少年基金”，训练了近 400 名 16—18 岁的青年，派他们到西印度群岛和非洲等殖民地学校去充任教师。

1839 年，枢密院教育委员会首任主席凯—沙图华兹派人到欧洲其他国家参观师范教育，裴斯泰洛齐创办师范教育的经验倍受重视。1840 年他以个人名义创办巴特西师范学校，1844 年该校交由国会管辖。

1840 年，枢密院教育委员会发布文件，规定从国库的教育补助金中支付取得合格证书的教师的薪金。到 1851 年，英国已培养出第一批由师范学校毕业的新教师。

“见习生制度”也是培训师资的一种方法，它类似“导生制”。方法是从初等学校中选 13 岁左右的少年作见习生，以校长带徒弟的方式加以培养，充任校长助手，跟随校长见习学校事务和教学。放学后，校长还要为其讲授一个半小时的各科讲义。5 年期满后可作为助理教员，也可考入师范学校继续学习。1857 年以后，这种个别培训见习生的制度发展为集体培训制度。到 1866 年，这种集训已在全国各地举办。

继巴特西师范学校之后，英国还举办了专门培训师资的训练学院，学习 2 年，另有 1 年的教育实习。1879 年以后，一些大学也承担了培训师资的任务，英国师范教育得到了很大发展。

(5) 高等教育改革和“新大学运动”

工业革命所引起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要求大学研究和讲授实用的课程，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当时，加强自然科学教学成为一种强大的潮流冲击着古典主义教育。在这种背景下，高等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新大学运动”开始兴起。高等教育的改革采取了以下措施：

在教学的内容方面，主要是反对古典主义，增加自然科学知识，面向生产。1838 年，皇家学院决定设置土木工艺学和机械工艺学课程；1844 年又设立科学综合部。在教学改革中，科学技术成果被迅速引入大学的课堂。

对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进行了改革。1852 年皇家委员会对两校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对两校极为不满。国会于 1854 年通过《牛津大学法案》，1856 年通过《剑桥大学法案》，着手对两校进行整顿。整顿后积弊逐渐清除，有了较大发展。如学生通过竞争考试取得奖学金；不再限于国教徒才能入学；贫寒优秀生有了入学机会；实业界慷慨解囊，学校资金增加；教授参加大学管理，学校的官僚习气减轻；学生面向的职业领域拓宽，更符合社会需要。改革后，两校的规模扩大，学生增加了 4 倍，教授增加了 3 倍。

创办了理工大学。为了适应社会生产的需要，使本国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使科学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英国开始发展理工大学。如曼彻斯特欧文学院、纽卡什尔理学院、约克郡理学院等。这些大学都

把自然科学列入教学计划，特别重视数学、物理学、机械学和天文学。在教学和研究方面确立了学术自由的原则，鼓励学生进行独立研究，充分发挥学生的才能和能力。

在 19 世纪英国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兴起了所谓“新大学运动”。1826 年，首先在伦敦建立了具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精神的“伦敦新学院”，开设语文、数学、植物学、伦理道德科学、英国法、历史、经济等科目，尤其重视医学。1829 年在伦敦建立“国王学院”，除开设古典语文、宗教和道德课程外，也开设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商业、现代外语等。1836 年经王室批准，上述两学院合并为伦敦大学，1878 年开始招收女生。

新大学运动推动了地方大学的诞生与发展。19 世纪下半期，在一些工业繁荣、文化发达的城市成立了新大学学院，例如，曼彻斯特、南安普敦、纽卡斯尔、里兹、布里斯托尔、谢菲尔德、伯明翰、诺丁汉、利物浦、雷丁和埃克塞特等城市。这些新大学一般都是私立大学，不问教派、不论男女均可入学。在教学内容方面，都很重视科学、数学和商业。

(6) 斯宾塞的教育思想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 年）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思想家，他生于英格兰德比郡的一个农村。父亲、祖父和叔父都是教师。他 7 岁入本村小学，10 岁到叔父办的中学学习，13 岁时因健康原因辍学，从此结束了他的“正规教育”，他的学识主要靠自学所得。17 岁时他曾作过 3 个月的小学教师，从而产生了对教育的兴趣。从 1842 年起，他开始为英国一些杂志撰稿，并开始深入研究哲学、生物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他从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教育问题，因此他的教育论著有很强的理论性。他发表了《智育》、《德育》、《体育》和《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等教育论文。

斯宾塞能适应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资产阶级的要求，倡导、论证了学校的科学教育，推动了实科教育的发展。19 世纪中期，英国的学校教育严重脱离工农业生产、科技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急需改革。斯宾塞《教育论》一书的出版，从理论上阐明了教育改革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斯宾塞的教育思想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论证了改革旧教育的必要性。斯宾塞在《智育》一文中指出，各个时代的教育制度应随同它们共存的各个时代的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旧教育的一套，从它的迷信的教条、严酷的纪律、繁琐的禁令、虚伪的禁欲主义以及对人为措施的信仰各方面，都同当时的社会制度接近；同样地，我们现代的培养方法在与上述相反的措施中，就同我们比较开明的宗教政治制度相适应”。他还敏感地看到，在生产过程迅速科学化、自然科学为现代生产和生活所必须的历史条件下，英国的公学和文法学校已失去其现实价值。他大声疾呼要使教育从古典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要使科学进入学校课程之中，科学教育应成为新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广泛建立实科中学。

创立了以科学知识为中心的课程体系。课程体系是斯宾塞教育思

想的中心内容，他也以课程论专家在教育史上著称。斯宾塞推崇科学知识的价值，并预言未来“最有价值和最美的科学，就要统治一切”。他认为知识的价值是由社会需要和教育目的决定的。他批评当时英国古典中学课程的非实用性、装饰性知识被放在第一位，与生产直接有关的知识却被忽略了。

课程是整个学校教育的中心内容，教学是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斯宾塞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完满生活做准备”。他针对当时社会需要，提出最有价值的知识就是科学，为生活做准备的知识价值最高。在斯宾塞看来，学习科学是所有人生活的最好准备，对调节人们的行为具有无法估量的最大价值，是比其他一切都重要的学习。科学应当立即进入学校的课程，居于“统治一切”的主导地位。斯宾塞的观点得到教育科学家赫胥黎和法拉第的赞同和支持。

斯宾塞构建了一个以科学知识为中心的课程体系。他认为，生理学、卫生学是直接为保全人自身服务的，应该在课程体系占有重要位置；逻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社会科学（主要指关于金融和商业贸易的知识）都是与生产和贸易相关、为间接保存人自身服务的，也具有很大价值，在学校教育中应当受到重视；此外，他认为，为了抚养和教育后代，必须具备一定的生理卫生知识和心理学、教育学知识；为了履行公民职责，必须学习历史。为了能在未来生活中“完满地”度过闲暇时间，文学和艺术知识也是必要的。

斯宾塞清楚地看到当时英国中学和大学课程轻重颠倒、忽视科学学科的弊端。对于传统的古典人文主义的教学内容来说，斯宾塞的课程体系是一个革命。

教学方法应符合儿童心理发展规律。斯宾塞认为古典的、死记硬背的传统教学方法是违反儿童心理发展规律的。他尖锐地指出：“正确的知识不讲，而把错误的知识，用错误的办法，按照错误的次序灌输给学生。”他充分探讨了教育原则和方法问题，归纳起来，他的看法是：要重视儿童心智发展规律，提倡教学要适应儿童的认识能力；强调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鼓励自我教育；强调学习兴趣。

斯宾塞认为，儿童的心智发展是有一定顺序的，教学方法要符合儿童心智发展的顺序。他提出的具体方法是：从简单到复杂；从易到难；从具体到抽象；从实验到推理；重视实物教学等。斯宾塞是一个正视现实、思想敏锐的教育理论家。他看到了工业革命后生产力和科学的发展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巨大影响，看到了教育与社会发展和人的生活的密切联系，努力把科学内容和方法引入学校教育，反映了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构建的以科学知识为核心的课程体系，极大地推动了近代科学教育的发展。他的《教育论》流传到许多国家。他的教育思想在美国和日本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指出，斯宾塞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不能不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仅就教育思想而言，他主张劳动群众只须从事劳动，不必接受高等教育；反对国立教育制度；反对普及工人教育，则反映了他的阶级局限性和教育观点的片面。

3. 德国教育

在世界近代早期，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德国都远比英、法等国家落后，直到 18 世纪末，德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进入 19 世纪以后，德国的资本主义开始有较大发展，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德国进入了所谓“狂飙突进时期”。在文化教育方面出现了改革和发展的趋向，德国教育也进入一个繁荣时期。在 19 世纪上半叶的教育改革中，德国处于领先地位。

(1) 洪堡教育改革

威廉·冯·洪堡（亦译洪堡德，1767—1835 年），曾就学于法兰克福大学和哥廷根大学，深受新人文主义的影响。他主张对人进行完全的人的教育，促使人的个性充分发展。他反对等级学校，主张人人都应受教育。他主张广泛实行陶冶智力的教育，各级学校都应该把训练学生的一切能力作为自己的任务。洪堡于 1809—1810 年任普鲁士内务部教育厅厅长。在任职的 18 个月中，他领导了德国近代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教育改革，在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学校管理和师资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方针，为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建立了一整套教育制度。这一时期小学、中学和大学所确立的发展方向，坚持一个世纪之久。

洪堡提出的学制改革思想反映在“寇尼斯堡学校计划”和“立图尼安学校计划”之中。他把学制严格区分为国民学校、中等学校和大学三级。各类学校改革的标准是：国民教育以裴斯泰洛齐的标准为主；中学以新人文主义为主；大学以哲学观念为主。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严格加以区别。由于他任教育部长时间很短，其改革计划无法全部实现。他的助手苏佛恩继承了他的事业。

在初等教育方面，洪堡进一步强调实施初等义务教育。他曾派专人前往瑞士裴斯泰洛齐的伊佛东学院参观学习，在小学推广裴斯泰洛齐的教育理论和方法。在他的领导下，德国初等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教学内容更为广泛，除背诵教义问答外，还有读、写、算的初步知识。教学方法也有所改进，注意利用实物进行教学。

在中等教育方面，洪堡及其追随者按照人文主义精神进行了改革。他们把原来的一批文法学校改为大学预科，为学生上大学作准备。这项改革主要在寇尼斯堡实行。按照洪堡的计划，将该邦的 5 种中学改为 2 所初级中学，年限 4 年；3 所高级中学，年限 8 年。高级中学的学生通过考试毕业，可以免试升入大学。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1810 年 7 月普鲁士政府颁布考选教师的法令。在高级中学专门为教师制定了一种合格考试制度，建立了教师个人资料卡。考选教师由“教育代表团”负责执行。代表团的代表由柏林大学、布勒斯劳大学和寇尼斯堡大学三校各派 1 人组成。此后，未经考试合格人员不得充当教师。

1810 年，洪堡主持修改了文科中学的教学计划，减少古典语文的教学时数，把语文列为基础课程，重视地理和历史教学，增加了自然科学的科目，使文科中学的教学内容逐渐接近实际生活。

除了正规学制系统外，洪堡同意为中产阶级的男孩设立一种 6 年制的专门高中，称为“高级市立中学”。学生入学年龄在 15 岁以上，课程大体和高级中学相同，不授希腊文。在 1832 年以前，这类学校的毕业生

可到军队服务一年，并委以下级军官职务。

在高等教育方面，1810年，洪堡在费希特等人的协助下创建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的建立不只是增加1所大学，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大学教育的改革。洪堡强调大学的任务既要向学生传授知识，又要发展科学，成为科学和学术的中心，首次提出了“教学同科学研究相统一”的原则。柏林大学把重点放在科学研究方面，而不是教学和考试，但教学仍然是教授的主要任务。柏林大学认为，在科研方面卓有成就的优秀学者，也总是最好最有能力的教师。在学校管理和科研方面，柏林大学拥有完全的自由。在柏林大学，地方大学中存在的地方主义被一扫而光，打破了非本地学生不能入学的传统，展现了对外“开放”的姿态。

柏林大学建立后，许多大学仿照柏林大学进行了整顿和改革，并新建了一批大学，如布勒斯劳大学、波恩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等。

洪堡的办学思想对后来德国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并影响了欧美国家现代大学的发展。

(2) 德国教育的两度停滞和倒退

1815年拿破仑帝国崩溃后，在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倡议下，欧洲各国的反动势力成立了以俄、奥、普三国为核心的“神圣同盟”，目的是恢复和巩固欧洲大陆的封建统治秩序。同盟成立后，普鲁士政府立即采取了阻挠教育的措施。1817年成立了“精神事物与教育部”，部长阿尔登斯坦公开发表文告表示反对人民接受多方面的教育。当时小学学校的数量虽有增加，但教育内容越来越具有宗教的、民族主义的和君主主义的性质。

1840—1870年，德国政府对中等教育的政策表现出两个特点：强调教条主义的宗教基础知识教育，指责人文主义是非宗教的和反基督教教义的；极力引导学生学习一种主要学科，自然科学的教学受到严重削弱。结果，出现了文科中学向16世纪文法学校倒退的趋势。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国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国民教育事业的摧残。1854年颁布一道关于国民学校和师范学校的法令。法令规定，国民学校和师范学校应该建立在宗教的、效忠于普鲁士君主的基础上。规定小学全部由教会管理，教学内容以宗教为主，其余科目被削减到最低限度，采取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师范学校主要讲授类似学校法令汇编的“学校管理”，教育学、心理学和古典文学课程都被取消。中学教学内容也有很大变动，文科中学取消自然学科，大大增加古典学科的教学；实科中学增加了拉丁文，并加重了神学课的份量。这一法令的实施，使德国学校教育出现了大的倒退和滑坡。1848年以后，德国大学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停滞不前的状态。学生数量减少，思辨哲学和新人文主义哲学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学生和教师的进步活动受到了限制和监督。根据1819年梅特涅提议通过的卡尔斯巴德法令，宣布解散各大学的学生协会，解聘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教授，并对大学实行严格的管制。整个教育领域弥漫着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国家专制主义气息，教育的正常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3) 职业技术教育

职业技术教育在19世纪的德国受到重视。在德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

业国的发展中，职业技术教育发挥了巨大作用。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的有实科学学校、地方工业学校、各种专门学校、工业补习学校和工科大学等。

实科学学校在 19 世纪上半期得到迅速发展。实科学学校是以培训实际工作人才为目标的、与古典文科中学修业年限相同的中等学校。1859 年，普鲁士政府批准了《实科学学校课程编制》，明确规定，要在古典型文科中学之外，另设新型学校来实施水平较高的文化教育。这种新学校毕业生的待遇，除不能升入大学外，与文科中学相同。这种学校被看成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各种科技研究所需人才的正式预备学校。实科学学校分为甲、乙两级。甲级学校修业 9 年，乙级学校修业年限较短。1870 年，首次允许甲级实科学学校通过毕业考试的学生可以升入大学，但限于哲学院，或限于升入大学的某一两个科。1882 年把甲级实科学学校改称高级实科中学，1890 年又决定把高级实科中学改称高级实科学学校，但关于实科学学校学生入大学的资格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

博依特在任普鲁士商工局局长时（1818—1845 年），建议在普鲁士的 25 个行政区各设 1 所地方工业学校，到 1835 年实际上设立了 20 所，学制一般 2 年，毕业生有升入柏林中央工业学校的资格。从 1850 年起，为了适应工业技术水平的需要，对地方工业学校进行了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全国统一的中等工业专门学校，同时增设力学、建筑、化学等方面的科目。改革后的地方工业学校，具备了正规中等教育的水平。1870 年进一步实行改革，主要是增设一些普通科目和改革专业科目，严格入学条件和延长修业年限。但这次改革没有给地方工业学校带来发展的机遇。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产业革命成熟，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工业部门的技术需要更趋专门化，地方工业学校失去了适应能力，约有半数被迫停办，其余则转为实科学学校或专门学校。

19 世纪，德国的专门学校种类很多，主要分为农业渔业、矿山工业、商业交通、家政和军事五大类。修业年限都为 2 年，入学者要具备一定的普通教育基础，还必须有 3—4 年的实际经验。

工业补习学校的教育目标是在初等教育的基础上，再对欲从事商业、工业或其他职业者给予预备教育。补习学校分为普通科、商业科和工业科等。到 1900 年，整个普鲁士共有工业补习学校 1070 所，在校生达 152900 人。

19 世纪 60 年代，德国出现了一些工科大学。它们多是在 19 世纪 20～30 年代所建中等教育机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860 年以后逐渐升格为工业大学。它们不是综合大学中的工学院，而是独立的大学，如柏林工业大学和汉诺威工科大学。学校规定的修业年限（包括一年的预备课程在内）：化学工程学科为 3 年；机械工程学科 4 年；建筑工程学科 5 年；技师科 6 年。

(4) 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

赫尔巴特（1776～1841 年）是德国教育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是现代科学教育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出生于德国奥尔登堡一个法官家庭，母亲极有智慧和教养，为儿子聘一位极有才干的牧师作家庭教师。赫尔巴特从小就受到严格全面的教育，哲学秉赋和思辨才干得以启迪和发展，并受到音乐、古典语言及自然科学的教养。从 1794 年起，赫尔巴特

在耶拿大学读书，师从费希特。1796—1800年他在瑞士当家庭教师，积累了教育工作经验。1799年与裴斯泰洛齐相识，深受其教育思想的影响，产生了改革学校教育的思想，并致力于教育科学事业。他从1805年起任哥廷根大学教授，讲授哲学和教育学；1809年到哥尼斯堡大学任教，并创办了附设于大学的教育讲习所；1833年重返哥廷根大学，进一步完善其教育理论体系。他在大学任教期间，也是他的理论创作的黄金时代。他完成并出版了《普通教育学》（1806年）、《形而上学要论》（1808年）、《实践哲学概论》（1808年）、《哲学概论纲要》（1813年）、《心理学教科书》（1816年）、《科学的心理学》（1824年）、《普通形而上学》（1828年）等著作。其晚年的重要著作有《教育学讲授纲要》（1835年）。赫尔巴特于1841年8月14日因病去世，享年65岁。

赫尔巴特论证了教育理论体系与实践哲学、心理学的关系。他指出：“教育作为一种科学，是以实践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前者指明目的，后者指明途径、手段以及对教育成就的阻碍。”他所说的实践哲学是指伦理学，即哲学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运用。他认为应以伦理学论证教育目的，以心理学论证教育的方法。他主张，教育目的就是要培养拥护普鲁士君主制度的具有“完美德行”的人。为了实现教育心理化，他提出了统觉心理学理论，认为统觉作用就是利用已有的观念吸收新的观念，并构成观念团；观念团越多，越系统化，就越能吸收新的观念和知识。赫尔巴特关于观念及统觉的心理学理论，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臆想，但比之莱布尼兹对于统觉的说明和洛克对于经验的解释，对教育理论更有启迪意义，至今他的关于观念和统觉的基本原理仍是教育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

赫尔巴特提出了教育学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管理、教学和训育。他认为对少年儿童进行必要的管理是实施教育必不可少的条件，教育与管理本身就是密切结合的，管理是教育的一个缰绳，教师必须“坚强而温和地”抓住它。管理的方法包括课业、监督、威胁、惩罚等等。在他的管理理论中有过分强调压制手段和权威作用的倾向。他强调，管理是为了造成一种守秩序的精神，养成守纪律的习惯，为顺利地进行教学和训育提供外部条件，管理本身并不是教育，而只是束缚儿童的意志。

关于教学，他提出在多方面兴趣的基础上制定比较广泛的课程体系，通过不同的学科形成儿童的各种活动观念。他认为，培养多方面兴趣是教学的直接目的；多方面兴趣是人的意识的“内在动力”，是传授新知识、形成新观念的基本条件；多方面兴趣是充分的知识训练的结果。赫尔巴特根据多方面兴趣的理论，建立了他的课程论。他提出了与经验兴趣、思辨兴趣、社交兴趣、社会兴趣、审美兴趣、宗教兴趣等6种兴趣相应的6种课程。他还提出了教学理论，把教学过程分为4个阶段：(1)明了，在观念静态中对教材的探究；(2)联想，在观念动态中对教材的探究；(3)系统，在观念静态中对教材的理解；(4)方法，在观念动态中对教材的理解。在世界教育史上，赫尔巴特首先提出了“教育性教学”的概念，深刻地阐明了教学的定义，论述了教学与教育的关系。他认为，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相反，道德教育（或者品格教育）如果没有教学，就是一种失去了手段的目的。教育性教学要求教师严格按照一定的教育目的来组织教学过程，把培养学生

的思想品德建立在知识教育的基础上。

赫尔巴特强调训育在学校教育工作中的地位，注重古典人文学科和神学对道德教育的作用。他指出：“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训育要对形成学生的道德性格起作用，它应当与儿童管理和知识教学相融合，并要有自己的方法特点，不是强制而是陶冶。教师的人格对学生有重要影响，赫尔巴特的训育论充分体现了他企图使学生形成具有个性并与社会性相结合的道德性格的教育主张。

赫尔巴特是西方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理论总体上反映了19世纪初德国资产阶级兼具保守与进步两重性的特点。他的教育思想的重心是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把儿童培养成顺民，而极少注意培养儿童的创造性。他提出了教育发展人的多方面兴趣、促进能力和谐发展的问題，对自然科学在教育中的作用给予了应有的重视，甚至注意了实科教学的问题，这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封建束缚、发展生产、推动社会进步的欲望和要求。赫尔巴特在教育、教学理论上的许多建树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

赫尔巴特在世时，他的教育学说只在有限的学术范围内流传，影响面不大。比之费希特和黑格尔等同时代人，赫尔巴特自感受到了冷落。他自叹道：“我那可怜的教育学说没能喊出它的声音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教育思想越发闪烁出光芒。19世纪下半叶及20世纪初，在他的弟子们的倡导下，他的教育学说得到广泛传播，在中小学教育实践中被广泛采用，研究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学会纷纷在德国各地成立。19世纪中期以后，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超越德国而走向世界。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和20世纪初，赫尔巴特学派运动的中心由德国转向美国。明治维新20年之后，赫尔巴特教育学说也在日本大为盛行起来。20世纪初年，中国学者从日本间接引进赫尔巴特教育思想，其中有两本很有影响的教育学著作：一本是蒋维乔的《新教育学》，根据日本吉田熊次郎的原著翻译，商务印书馆1909年出版；另一本是张子和编写的《大教育学》，商务印书馆1914年出版。赫尔巴特的教学论对我国教育一直影响很大。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对于近代甚至现代教育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学校教育改革起过支配作用。

(5) 福禄倍尔的教育思想

福禄倍尔(1782—1852年)，出身于德国图林根一个乡村牧师家庭。他出生后9个月母亲去世，幼年时受到继母虐待。他10岁时被舅父送到学校去接受正规教育，15岁中学毕业，以后又学习两年林务。1799年到耶拿大学就读，听过费希特讲课。1805年他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当过家庭教师，两次拜访裴斯泰洛齐，认真研究裴氏教育思想。以后他又到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继续深造。1816年，他以自己亲属的子女为教育对象，创办了一所实验性学校，开始实施自己的教育理想。1834—1836年间，他在瑞士担任柏格多夫孤儿院院长，开始意识到改革儿童早年教育的必要性。1837年，他完全转向学前儿童教育，在德国的勃兰根堡设一所学校，专收3—7岁儿童，1840年命名为“幼儿园”。福禄倍尔是以发

起幼儿园运动而闻名于世的。他以大半生的时间专心于幼儿教育事业，对德国、对世界都有巨大影响。而德国政府在 1851 年竟以宣扬无神论和社会主义的莫须有罪名，下令关闭福禄倍尔的幼儿园，福禄倍尔则多方呼吁，德国民主主义教育家第斯多惠也为之抗议和声援，均无济于事。次年，福禄倍尔满怀愤懑溘然长逝。世人尊他为“幼儿教育之父”，在他的墓碑上刻有他的名言：“来吧，为我们的儿童生活吧！”

福禄倍尔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他深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费希特和黑格尔等人的影响，认为宇宙精神（即神）是万物存在的本源，神主宰一切。从这一观点出发，他确定了三个教育法则：统一的法则、发展的法则和教育适应自然的法则。

福禄倍尔在《人的教育》中认为，自然界和人是统一的，即统一于神。儿童和成人一样都是神的精神的体现者。由此推出教育的目的“是引导人增长自觉，达到纯洁无瑕，能有意识地 and 自由地表达神的统一的内在法则，并采用适当的教育方法和工具，使其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智慧的人”。福禄倍尔认为，统一的法则是全部生活和教育的出发点。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不断发展的。发展的法则是存在的基本规律。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帮助儿童实现他自己的发展。教育工作者应该创造条件，使儿童能把自己内部所蕴藏着的神的来源表现出来，发展起来。福禄倍尔接受了裴斯泰洛齐关于教育适应自然原则的解释。他把这一原则理解为教育适应潜藏在人身中的力量和能力的自我发展，而这种力量和才能的发展是“神的本能”的自我发展。

福禄倍尔的上述理论观点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理论倾向是错误的，但发展儿童的力量和能力这一具体内容是正确的。他强调教育要追随儿童的本能，重视发展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自动性，也是有积极意义的。福禄倍尔提出了关于幼儿园教育的思想。福禄倍尔指出幼儿园的任务是：通过活动和游戏的方式，培养学前儿童，发展他们的体格，锻炼他们的外部感官，使他们认识人和自然，使儿童在游戏、娱乐和天真活泼的活动中，去做好升入小学的准备。他认为幼儿教育方法的基本原理是自我活动。自我活动是一切生命的最基本特性。福禄倍尔提出了几种具体的教育方法，如实物教学原则、顺应自然的原则和游戏教学原则等。关于幼儿园的训练方式，他提出唱歌、动作、姿式及建造等几个方面，激发幼儿的想象和思考，训练手脑并用的能力。他提出了以活动和游戏为主要内容的课程体系，具体内容包括：游戏与歌谣；使用恩物（福禄倍尔对其创制的幼儿园玩具的称谓）的游戏活动；应用恩物原则所进行的手工活动；在游戏室内或户外的运动游戏；园艺与饲养；通过散步观察自然界的活动等。福禄倍尔认为，幼儿时期儿童认识的任务主要是对事物外部特征的观察。

福禄倍尔承袭了卢梭和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并在他自己实践和实验的基础上创立了幼儿园及其教育体系，开创了幼儿教育师资培训班。他的幼儿园模式及教育理论在 19 世纪下半叶风靡欧美各国，对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教育理论对一般学校教育也有普遍意义。他的教育思想展现着时代精神，也刻有德国特殊历史环境的

烙印和局限性，例如神秘主义和形式主义等等。

(6) 第斯多惠的教育思想

第斯多惠(1790—1866年)，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1790年10月29日出生于威斯特伐利亚省锡根市的一个法官家庭。他从小爱好自然，1808年中学毕业后入赫尔朋大学学习，1809年转入杜平根大学，1811年毕业，18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他1813—1818年任法兰克福一所师范学校教师，其间研读了裴斯泰洛齐著作，进行教育改革实验；1820年担任默尔斯城师范学校校长，兼教数学和法语；1827年创办《莱茵教育杂志》，他一生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400多篇；1832年被聘为柏林师范学校校长。1832—1841年，第斯多惠创立4个教育研究团体，反对沙文主义教育，宣传民主教育思想，1847年被反动政府免去柏林师范学校校长职务，但教师仍选他担任全德教师联合会主席。他于1850年被迫退休后仍坚持进步的教育活动，除继续主编《莱茵教育杂志》外，从1851年起他又主编《教育年鉴》。1857年他写了《教育的理想和可能性》，总结了自己多年来为捍卫新教育原则而进行的斗争。1865年，德国许多教师为第斯多惠祝贺75岁寿辰，他在答词中提出：“人民的教育，在最广义上说乃是人民的解放”，这充分表达了他的教育理想。

第斯多惠提倡“全人类教育”的思想。1835年，他在《德国教师教育指南》一书中指出：“德国的教育要求未来的专门教育要建立社会人类教育的基础上”；“德国教育学首先要求人的教育，然后才是公民和民族成员的教育”。1854年，他在反对普鲁士关于师范教育和国民学校规程时，又重申：“教育者乃一般人类的教育，所以要使个人为完全之人。”他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反对封建等级教育和普鲁士狭隘的民族主义教育，要求培养一般的人，而不是追随政府的所谓“真正的普鲁士人”，主张把热爱祖国和热爱全人类结合起来。他认为“全人类教育”的内容应当是全面的，要用世界范围的普通教育知识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为了实现“全人类教育”的理想，培养“一般的人”，第斯多惠提出了“自然适应性原则”和“文化适应性原则”。他认为，儿童生来就具有一定的素质和天然发展的倾向，要使教育取得良好的效果，就必须“适应自然地进行教学”，即教师要严格按照人的天性及其发展规律来进行教育，要适应儿童的年龄特征和个别差异，要研究和认识儿童的心理特点，把心理学作为“教育科学的基础”。

第斯多惠提出的“文化适应性原则”是指“在教育中必须注意一个人所出生或将来生活所在的地点和时间的条件，一句话，要注意就其广义和包罗万象的意义来说的全部现代文化，特别是学生祖国的文化”。教学内容除了适于学生的接受能力外，还必须符合现代科学的水平。

上述思想反映了第斯多惠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德国教育的宗教目的及沙文主义倾向的反抗。

《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年版，第365页。

《西洋教育史大纲》下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附录第12页。

转引自吴式颖等编写的《外国教育史简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8页。

第斯多惠对教育发展的重要贡献是他的教学理论。首先，他指出教学论是研究教学规律与规则的科学，它既关系到人类本性发展的规律，也关系到教学过程本身的规律。其次，在他的教学论中始终贯彻了适应自然与适应文化的要求。第三，坚持教学的形式目的与实质目的的统一。他在《德国教师教育指南》一书中详细阐述了他的教学理论，并提出了33条具体的教学原则与规则，对学生、教材、社会文化条件和教师在教学中所处的地位和要求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第斯多惠把学生看作教学的主体，认为学生的身心发展条件是制定教学原则的主要依据。他把教材视为教学的客体，教材应给学生以基础知识和知识的基本概念，要把教材划分为阶段并按步骤教授，选择教法要切合学科性质，教材内容必须体现现代科学水平等。关于具体教学方法，第斯多惠强调要把能促使学生自动性得到发展的教学方法放在首要的、突出的地位。

第斯多惠非常重视教师的作用。他认为教师的使命是教育别人，引导学生走正确的道路，激发他们对真善美的渴求，使他们的素质和能力得到最好的发展，使其成为能自由思考并有能力参加时代进步运动的青年。他要求教师必须具有进步的政治态度，坚持教育的进步方向，以满腔热情培养具有自由思想而积极接近进步运动的新一代。他说：“教师的迫切任务在于通过他负责培养的那些人而促进人类发展”，“只有自由的和独立的人才能为自由与独立而教育旁人”。他提出，教师要在广泛意义上把自己教育好。正如没有人能把自己没有的东西给予别人一样，谁要是自己没有发展和教育好，他就不可能发展和教育别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教育和培养，就只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教育和影响别人。所以第斯多惠非常强调教师的自我教育和完善。他还要求教师要精力充沛地进行教学。他认为，“只有精神才能感染精神”，“只有坚决的、精力充沛的、有坚定性格、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和用什么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意志的人，才能教育出坚决的、精力充沛和性格坚强的人来”。他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鼓励、唤醒、鼓舞。他还要求教师要饶有兴趣地进行教学。他认为，引人入胜的教学会使学生获得对真善美的爱好，并集中注意力地、心甘情愿地去研究他所学的学科。怎样使学生对教学感兴趣？借助讲述形式和风格的多样性；教师的生动活泼和对儿童教育的“自然的热爱”；教师的整个人格。他特别指出，一个真正的教育者应该知道：通过你是什么样的人要比通过你知道什么可以获得更大的成效。他还提出，教师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自己的知识水平。

第斯多惠是19世纪中叶德国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他始终站在进步力量一边，同教育领域中的宗教主义、封建主义进行顽强的斗争，他毕生致力于改革旧教育、改革社会及教育不平等状况，对近代德国学校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师范教育和教师培养方面，第斯多惠做出了卓越贡献，被称为“德国教师的教师”。第斯多惠在教育和教学理论方面，力图揭示出切实可行的、反映实际要求的带有规律性的原理和原则，并做出了具体而明确的结论。德国人民誉第斯多惠为“坚

决走进步道路的古典教育的代表”。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还颁发了“第斯多惠奖章”，用以表彰和奖励功勋教师。

三、美国教育

美国是北美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它原为印第安人聚居地。15世纪末，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都开始向北美移民，到1733年英国在这里建立了13个殖民地。经过1775年的北美独立战争和1861年爆发的南北战争，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得以确立和巩固，美国的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也得以确立和发展，并形成了美国的特色。

1. 南北战争以前的美国教育

从制定1787年宪法到南北战争爆发以前的半个多世纪中，美国教育逐步发展起来，特别是1814年与英国争夺加拿大殖民地取得胜利后，美国迅速走上了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道路，对促进教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 公立学校运动

公立学校运动是指广泛建立由公共税收维持、公共行政机关监督、向所有儿童免费开放的学校制度的运动。从19世纪20年代起，公立学校运动在美国迅速发展起来，经过40多年的演进，扩展到中、高等教育范畴，促进了美国公共教育阶梯的形成。一些美国人自称这一时期的教育为“教育觉醒时代”。

公立学校运动的动力首先来自工业革命对教育的要求。从18世纪末期开始，美国开始了产业革命，各种发明相继问世。产业革命对教育的巨大影响是产生了需要以就业为目的的中等学校，训练孩子适应他们要干的工作。从1830年到南北战争以前，城市的兴起和产业工人数量的急剧增加，要求推进公立学校教育。劳工大军由移民和转业农民来补充，他们无力把子女送进费用昂贵的私立学校，要求实施免费普及教育。工厂制度使许多16岁以下的儿童得以入厂劳动，童工教育也成为严重的问题。

19世纪上半叶，工人运动提出争取教育权的要求，也是对公立学校运动的一种推动力。当时曾提出“受教育应是每个公民的权利”的口号。1824年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美国建立“新和谐村”的实验在美国工人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欧文的重要思想之一是实施初等义务教育。1825年伊利诺斯州首次制定教育法，该法在序言中提出：公民的智力是社会的财富和国家的力量，因此国家有义务办理公共教育来增进全体公民的知识与发展他们的智力。这就为资产阶级提供了要求建立公立学校的认识基础。事实上，人人到公立学校就学，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特别是对于一个移民众多的国家来说，更需要通过教育逐渐形成统一的民族性。

1843年，美国教育家、马萨诸塞州教育厅长贺拉斯·曼从德国考察教育回来，建议由州政府来负责建立公立学校，以区别于原来由教会办的慈善性质的小学。这是美国公立学校的开始。公立学校的建立不仅奠定了美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基础，也成为美国普及义务教育的开端。

公立学校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确立地方税收制度，建立以州为主的

领导体制。公立学校运动还包括学校内部的教学改革以及师资的培养和选用。公立初等学校的大量开办，师资成为重要问题。1839年在马萨诸塞州开办了美国第一所州立师范学校。1853年在伊利诺斯州创办了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

确立地方教育税收制度的过程也是新教育观念确立的过程。首先，免费教育是专门为穷人的教育这一思想受到冲击。过去，从慈善观念出发，用公款使穷人的孩子接受最低教育，而有钱人子弟则接受另外形式和内容的教育。虽然都受教育，实质上是不平等的。许多具有民主思想的人士认为，这是违背教育平等原则的。他们主张人人都应当进入统一的免费的学校接受同样的教育。因此，学校的经费也应由每个公民共同负担，用征集教育税的办法来解决。地方税收制度的建立尽管遇到许多障碍，但到南北战争时期，多数州都确立了地方税收制度。

建立以州为主的领导体制，就是由统管全州的教育机构来指导各县市镇的教育领导机构，分配和管理州教育经费，收集和交换教育情报，统一立法，形成全州统一的公立学校系统，改变各自为政的状况，提高教学质量，实现真正的教育民主。因此，建立州教育领导机构成为公立学校运动的重要目标。1837年马萨诸塞州首先建立州教育委员会。随后，许多州都相继建立了州教育委员会。

19世纪上半期的公立学校运动加强了资产阶级世俗政权对教育的控制力，加速了普及初等教育的进程。到1859年，仅马萨诸塞一州就有公立学校4000多所，成为初等教育的主体。通过这场运动，美国式公立免费教育思想深入人心，引发了19世纪后期公立中学和州立大学的发展，为美国统一的公共教育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这一运动当时主要限于美国北部及西部的初等教育范围，与实现真正的教育机会均等和世俗化理想尚有很大差距，并且根本没有涉及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教育问题。

(2) 中等教育

文实中学的发展。1800年以前，美国有100多所文实中学；到1830年增至950所；1850年迅速达到6000多所，在中等教育领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

文实学校最早是美国科学家和政治家富兰克林倡导的，1751年在费城开始创办。它的出现标志着美国中等教育一个重大运动的开端，是美国社会实际需要和国际上实科中等教育思潮影响的结果。美国原有的拉丁文法学校教授的课程纯粹是古典的，是专为升入学院作准备的，已不能适应当时美国工商业发展的新要求。为了就业，有关的工业、商业知识更受到人们的重视。当时的响亮口号是“训练学生投入生活”。文实学校能够提供多方面的教育，因此很适合当时的社会潮流。当时由于公立小学的增加，急需增加小学师资，许多文实中学承担了培养小学师资的任务，这也是它一度兴旺的直接原因。

文实中学把培养青少年就业本领作为重要目标之一，还在中等教育领域首开男女同校之风。文实中学在美国教育史上成为古典中学向实科中学过渡的桥梁。它之所以成为一种过渡性的教育机构，因为这种学校是私立的，至多是半公立的，要收学费，它不能给予更多的人接受中等

教育的机会。另外，当时为升学作准备的古典科目仍占上风。到南北战争之后，文实学校逐渐被公立中学所取代。

公立中学的产生。公立中学的出现是这一时期美国中等教育史上的又一重要事件。第一所公立中学于 1821 年 5 月在波士顿正式开办。这种学校的教育对象是“没有愿望也没有条件获得古典教育的人”，学校为“准备成为商人和机械工人的青年提供较之任何公立学校的教育更好的教育条件”；学制三年；不设任何宗教课程，也不设拉丁语和希腊语等科目。由于这些特点，公立中学又被称为美国的实科中学。

1827 年 1 月，马萨诸塞州颁布学校法，条文中虽然没有使用“中学”一词，但内容大多涉及中等教育，因此又被称为“中学法”。该法影响很大，被美国教育史家看作“美国中学的实际起源”。宾夕法尼亚、康涅狄格、俄亥俄、新泽西等各州也都颁布了类似的法令。

公立中学的发展初期并不顺利。在一些地区，许多人满足于初等教育水平或文实中学把公立中学看成是“多余的学校”，是额外的负担。当时一些思想保守的人反对公立学校运动，成为公立中学发展的严重障碍。即使在先进的马萨诸塞州，30 年当中只建立十几所中学。在南北战争之前，公立中学的发展一直落后于文实中学。但到 19 世纪后期，终于出现了公立中学大发展的形势。

(3) 高等教育

美国早期的高等教育机构几乎都与基督教各宗派有联系。1800 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高等教育机构向横广发展，要求公立，主张课程搞选修制，要求举办工农技术教育。

19 世纪早期，美国教育家就开始寻求改进高等教育的办法，对高等教育的所属权存在着严重争议，是应该掌握在联邦和各州手里，还是应该归于各个宗派，莫衷一是。一些自由主义者主张联邦开办国立大学，但是美国的国立大学始终没有开办起来，只建立了一些州立大学。第一所州立大学是弗吉尼亚大学。到 1860 年，美国已有州立大学 17 所，初步形成了从初等到高等的公立学校体系。但是，这时私立的或教会的学院或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中仍占有绝对的优势。

19 世纪的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着工业革命和民主自由思想的冲击，德国式的现代大学成为美国大学的样板。在此期间，高等院校规模扩大，数量增加，到 1855 年，全国高等院校约有 300 所。值得指出的是，美国这时的高等院校向女生开放，体现了男女平等的原则。

关于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是否办研究生院、教授的地位及学术管理，也有各种见解。1818 年，杰弗逊在关于弗吉尼亚大学校址、课程计划和政策的报告中提出的高等教育目标是：“造就国家繁荣和个人幸福是赖的政治家、立法家、法官；阐述政府的原则和结构、阐述规定各国交往的法律、阐述为我们自己政府市政上制定的法律、阐述健全的立法精神；……调和和增进农业、制造业、商业的兴趣，并且借助很有见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给公共工业一个自由范围；发展我们青年人的推理能力，丰富他们的心灵，养成他们的道德，给他们灌输美国和秩序的箴言；用数学和物理科学启迪他们，增进技艺，论叙健康、生存、人类生活舒适等问题；总的说，形成青年反思和正确行动的习惯，使他

们对于别人是美德的榜样，在自身是幸福的榜样。”弗吉尼亚大学在课程中增加了现代语文、数学和自然哲学等学科的比重，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种课程。

杰弗逊的大学理想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广泛注意。它的目标充满民主共和主义精神和功利性，这些目标强调高等教育要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明确而具体的作用，甚至主要着眼于世俗的社会政治生活，而很少宗教色彩。因此，这是美国高等教育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

这一时期哈佛大学也进行了课程改革，在部分系内实行选科制和按能力分班的措施。后来许多大学都开设了与古典课程并行的现代语文及现代科学课程。

19世纪美国出现了出国留学热，近万名青年远涉重洋而就学德国。50年代后许多学者返回美国，大力宣扬和效仿德国，发展美国大学教育，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在南北战争以前，工程技术教育也已开始被人们重视。1824年开办了第一所独立的技术学校——伦塞勒多科技术学校。这所学校在19世纪为美国培养了许多第一流的技师。工程和技术作为独立学科出现在课程中，引起了一些老牌文理学院的重视，许多学院也开始举办独立的工程系或学院。1845年，协和学院成立土木工程系。1847年，哈佛学院成立劳伦斯科学学校。1855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创办采矿、技艺及制造业系。这一时期美国技术教育运动出现了高涨的势头。1865年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建立对技术教育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世纪下半叶，美国技术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这类高等院校使应用科学和机械技艺在学院课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使美国的高等教育摆脱了纯古典的和形式主义的传统。许多院校还非常重视农业科学教育，这是很宝贵的经验。

2. 南北战争以后的美国教育

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实际上是美国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战后美国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使美国由农业国变为发达的工业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也迅速发展起来，最终形成了具有美国特点的教育制度。

(1) 学校教育制度的确立和发展

美国在教育上一一直实行地方分权制，没有形成国家统一的领导权限。在殖民地时代，教育行政领导权属于各殖民地地方当局（即独立后的州），在州政府的领导和监督下，成立州教育委员会，作为一个州的教育决策机关，依据州教育法来确定本州的教育政策，监督本州的教育实施。1812年，纽约州开始设置“州教育督察长”，为一州的主要学校教育专员，负责监督并全面领导公、私立学校的教育。

在州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下，分设学区，作为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学区划分有一个发展过程。最早实行的是乡学区制，6户以上的乡村就可以组成一个学区，选出3人为学区董事，负责管理学校、聘任教师、选用

教材、征收教育税金和议定学校规则等，还要召集家长商讨重要问题。乡学区范围过小，人力财力都遇到许多困难。1853年，从马萨诸塞州开始采用镇学区制，以后又发展为县制学区，设县教育委员会和县教育局长，负责整个学区的教育行政、经费及学校教育的领导和监督。它是仅次于州的教育行政单位。由于10万以上人口的工业城市不断增加，1870年以后又产生了市制学区，直接受州教育行政机关统辖。

南北战争以前，美国根本没有中央一级的教育领导机构，宪法明确规定联邦政府无权干涉各州教育。战争后有人提出设立中央教育部的议案，被否决。后来设立了教育总署，附属于内政部，1870年改称教育局。这一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对各州并无实际的行政领导权，它主要是一个教育情报咨询机构。美国宪法第十条修正案规定：“凡本宪法未授予合众国或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或人民保留。”由此引伸出美国教育是属于州的权力。这也是美国教育实行州分权制的法律依据。美国宪法不规定教育问题，中央不对全国教育实行领导，这在世界各国都是少见的。美国在教育领导上一直实行地方分权的形式，在全世界也是最典型的。

义务就学法。南北战争以前，只有马萨诸塞(1852年)和纽约(1853年)两州颁布了义务就学法。1865年以后，各州都陆续制定义务就学法，实施普及义务教育。

义务就学法是各州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的教育法规，学期年限、实施方法也不尽相同。各州的义务教育一般截止到入中学以前，义务教育年限不完全相同，多数为8年。义务就学法的实施是非常艰难的。尽管如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7—15岁儿童的75%已经上学。这一时期，美国教育家哈里士(1835—1909年)提出了建立统一的教育系统的主张，即从小学一年级直到学院，这对在美国形成“教育阶梯”是极大的推动。小学则是这个“教育阶梯”的第一层。到1900年，8年制的分级学校是美国小学的基本类型。

公立中学合法地位的确定。美国“中学”是在19世纪20年代出现的，到60年代，全国共有中学300所。把中学纳入公立教育的行列非常艰难。在南北战争后的最初几年，扩充公立中学遭到纳税人和宗教集团的强烈反对。70年代关于公立中学引起许多诉讼。1874年的卡拉马祖案影响面很广，最后，裁决肯定了教育委员会征税办公立中学的合法权利，确定了中学在公立教育系统中的法律地位，地方教育委员会获得了按需开办中学的自由。州立法机关也通过法律允许地方教育委员会办中学，要求人口稠密的地区一定办中学，并给这样做的学区以帮助。1873年缅因州通过了中学法，1875年威斯康星州制定了类似的法律，并拨款援助中学。中学原为3年制，后来改为4年制，与小学相衔接构成了“8—4制”，成为美国“教育阶梯”的中间阶梯。南北战争以后，美国受到西欧学前教育的影响，也开始重视托儿所和幼儿园教育，一些教育研究机构加强了对幼儿心智发展的研究。1860年，美国妇女伊丽莎白·皮波迪在波士顿开办一所使用英语的幼儿园，一般认为它是美国第一所幼儿园。1873年，圣路易斯州首次把幼儿园教育作为公立学校教育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美国公立幼儿园教育的开始。此后各州纷纷效仿。幼儿教育构成了美国教育的第一阶梯。

(2) 高等教育

南北战争以后，美国高等教育出现了向纵深发展的趋势，修业年限增加，教育质量提高，许多高校兴办研究生院，大学开始兴起。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追求实用原则，从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出发，广泛兴办农工学院；二是注重学术水平的提高，努力发展专重学术研究的大学。

农工学院的突起。美国国会于 1862 年和 1890 年两度通过议员毛雷尔提出的教育议案，旨在资助开办农工学院（亦称赠地学院）。法案规定：由联邦政府按各州参加国会议员名额的多寡拨给土地，举办农工学院。各州每有国会议员 1 人，联邦政府拨给公共土地 3 万英亩，并将出卖这些土地的收益作为开办农工学院的基金。议案经总统批准，成为法律。

农工学院一般修业 4 年，培养工农业发展急需的专业人才。在内战期间就有一批农工学院诞生，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就在这时建立。按照议案规定，利用联邦政府拨地独立设置农工学院的有 28 个州；宾夕法尼亚、密执安和马里兰等州则把联邦所拨土地转给已设置的农业学校；伊利诺斯州则成立工业大学；有 15 个州在州立大学内增设农工学院。到 19 世纪末，全国农工学院发展到 69 所，有的农工学院后来发展成为美国的一流大学。

农工学院开设工业、农业等专业科目，注重联系实际，鼓励学生在寒暑假参加农业生产，为农民举办讲习班。另外，富有实用价值的家政专业也受到重视。农工学院的毕业生受到各生产部门的普遍欢迎。

1890 年，国会再次通过毛雷尔法案，规定联邦第一年补助各学院 15000 元，以后逐年增加 1000 元，直到每年补助 25000 元为止。法案还规定南部 17 州需革除歧视黑人的积习，否则须另为黑人设置水平相同的农工学院，不然就中止补助。这一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农工学院的发展。

农工学院的发展也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有的州将拨地廉价出售，没有利用拨地去建立农工学院。按各州议员多少拨地，进一步加大了各州之间的贫富差距。另外，专为黑人设立学院，人力财力都有困难。新学院标榜面向工农，本应免费或廉价，事实上学费不断增多，家长难于负担。教师缺乏实际专业知识，也是办学中的大问题。这种情况到 19 世纪末大有改变。农工学院的开办和发展在美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和课程设置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促使美国高等教育与欧洲高等教育传统分离，从而形成美国特色。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创立。1876 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创立。它是受德国启发和适应美国学术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新学府，它代表着面向学术建设的高等学校的成长方向。它的诞生开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新局面。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首任校长是吉尔曼。他毕业于耶鲁大学，在哈佛大学读过研究生，考察过欧洲诸国教育，担任过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校长，1875 年被聘为新开设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他上任前专程到德国考察，学习他们创校和管理学校的经验。吉尔曼标榜人才主义，认为无高明学者不会办成高水平的学府，曾从德国邀请著名教授 6

人。他还标榜培养天才。这所大学的确人才荟萃，许多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1926年的一项调查披露，在1000名美国杰出的科学家中有243人毕业于该校。美国总统威尔逊和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都曾在该校就读研究生。吉尔曼任校长25年，苦心经营，使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美国高等院校行列中后来居上。

由于权威学者济济，霍普金斯大学设置了许多授予学位的科系，引进了许多水平高深的新科目，自然科学倍受崇尚，古典学科和社会学科也得到了相应发展，并建立了选修制。它开设的课程不重复其他学院已有的东西，而是适应美国在专门学问领域的需要。该校的重要特点是把经费主要用于教学科研，校舍很简朴。一位参观者谈他的观感时说，该校“对于科研，不惜巨万；对于外表，分文不舍”。该大学是美国南北战争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生教育革新的代表，被人们称为真正与“大学”名称相称的大学，并使大学成为“研究生院”的同义语。它的哲学科为其他高等院校提供了合格的师资。许多院校都模仿它进行了改革。19世纪末在美国开办的霍普金斯式新大学还有克拉克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一些老牌学院，也纷纷进行改革，办成了大学。它们在办学原则上强调“学与教的自由”，认为学校是自由从事科学研究的场所；在教学方法上强调专业训练和专题研究；在组织结构上，依照德国设文理研究生院，设哲学博士学位。霍普金斯大学开创了一代学术新风，使美国高等教育出现了一派新景象。

实行选修制。学院本科生课程采用选修制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革新。修什么课程由个人自由决定，而不由课程设计者决定，可以培养自主精神；选修制可以适应个人的能力和爱好，使学生对课业更努力，学得更主动。哈佛大学是这种制度的发祥地。选修教学计划分为以下几种：第一，自由选修制，其课程全部选修，所选学科不受限制；第二，课程的一半必修，一半选修；第三，“主修辅修”制，即学生从3年级开始选择一个学业领域作“主修”，另一个作“辅修”；第四，采用“分组制”，把课程按科学、哲学、历史等“分组”，要求学生按这样的“分组”来选修课业，可选一组，亦可选一组以上。在哈佛大学，学生挑选学科不受任何限制。

这种选修制在普通中学也有所推广。它有积极的一面，但也出现了一些学生选课“舍难求易”的倾向。

近代美国的教育体系，基本上源于英国，而不同于英国；仿行德、法，但又不拘于德、法。美国在自己的工业化过程中，走出了一条依据国情、讲求实效、学习先进、创新改革的“美国式”教育改革道路。

(3) 黑人教育

南北战争以前，美国黑人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南北战争使400万黑人获得解放，成为自由民。南北战争以后，黑人公民的教育问题成为美国南部地区以及全国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黑人受教育权利的问题曾展开一场激烈的斗争。

对于黑人和白人是否同上平民学校，争论很大，有人公然反对通过教育提高黑人素质。种族主义者坚决反对黑人接受教育。1847年，马萨诸塞州高级法院明确裁决，认为给黑人开办“分离但平等”的学校是合

法的。这给学校种族隔离开了绿灯。1865年3月，美国国会成立难民、自由民及被弃土地局，统称自由民局。在自由民局主持下，加强了黑人学校教育的管理。1865—1867年间，联邦政府给南部教育投资500万美元，但由于自由民局的行政管理权掌握在北方白人手中，其初期工作有很大的盲目性，联邦参与南部教育，未有取得地方和私人的支持，收效甚微。另外，在南部教育方面，慈善机构提供了相当的经费，主要用于建立公立平民学校、培训黑人教师和加强工业教育方面。

尽管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了“分离但平等”的原则，实际上黑人教育比白人差得多。黑人学校学期短，经费少。1900年，南部学生平均在校期限不满100天，只为新英格兰的1/2，并且只有1/3学龄儿童入学。1900年按每个儿童平均计算的年度开支情况如下：弗吉尼亚州为9.7美元，北卡罗来纳州只有4.34美元，而马萨诸塞州则高达37.76美元。为争取黑白种族合一的学校，有过种种努力，但都失败了。“分离但平等”的原则，分离是事实，平等只不过是一个口号。

黑人教育领袖布克·华盛顿（1856—1915年），曾在亚拉巴马州特斯基吉市开办特斯基吉专科学校，并任校长。他领导了特斯基吉运动。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一运动在提高美国黑人的技艺，增进黑人就业机会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黑人牧师沃克对黑人教育也做出了积极努力。1903年他出席全国教育协会，提出了满足南部黑人教育的3点计划：第一，建立更好的公立学校系统；第二，扩大对群众的手艺和职业训练；第三，建立高级师范学校及培养教师、领袖人物和专业人员的学院。华盛顿和沃克认为，只要有了农村正规的公立学校，有了生命财产的保障，南部黑人就很容易成为这个区域经济复兴的重要力量。

3. 贺拉斯·曼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

贺拉斯·曼（1796—1859年），19世纪上半叶美国著名的教育家，是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被誉为美国“公立教育之父”。

(1) 生平

贺拉斯·曼生于马萨诸塞州富兰克林的一个农民家庭，13岁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他20岁时入布朗大学，学习法律，成绩优异。1819年从布朗大学毕业后，留校作辅导教师两年。1823年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开始从事律师工作。1827—1837年，担任马萨诸塞州议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积极从事社会改革和教育工作。担任议员期间，他赞成修建铁路，建立疯人院，改革债务人法和其他各种人道主义改革。他还极力促成设立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该委员会由8人组成，由一个常任秘书负责日常工作。从1837年起，他被任命为州教育委员会秘书，在任12年，使本州公共教育制度的发展走在其他各州的前列。他还创办了《公立学校》杂志，亲自担任编辑。在他的领导和支持下，1839年7月在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建立了美国第一所州立师范学校，以后又开设了第二所和第三所州立师范学校。1843年5月，贺拉斯·曼自费到欧洲考察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和德国的学校教育情况，回国后热情宣传和介绍欧洲各国的先进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

1848年，贺拉斯·曼辞去州教育委员会秘书职务，重新回到政界，当选为美国国会参议院议员。他从属辉格党（美国共和党前身），代表资产阶级工业家的利益，反对奴隶制，主张给工人更好的报酬，主张取消童工和改善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等。

他于1853年出任俄亥俄州安提阿学院院长，直到逝世。这是一所基督教派新办的学院。他在任期间采取了许多激进的改革措施，取消阶级、宗派和肤色之分，实行男女同校，黑人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让学生参与行政管理等。

贺拉斯·曼的主要著作是12篇关于教育的《年度报告书》，还有《教育演讲集》、《论年轻人》、《妇女的权利和义务》等，他还为《平民学校杂志》和《美国教育杂志》写了许多文章。

贺拉斯·曼是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并获哈佛大学名誉学位，是1900年被选定列入纽约大学美国伟人纪念堂的第一位教育家。

(2) 主要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

贺拉斯·曼积极倡导公立学校运动，强调普及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一个共和国里，愚昧无知是一种犯罪，要使每一个儿童受到免费教育，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改革。他认为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是直接的。他把教育与社会改革紧密连在一起，要求美国人注意给儿童正确的良好的教育。他在一次巡回演讲中，耐心解释州政府为什么必须干预家长抚育儿童的权利。他说，这些儿童不久就将是公民，而一个人，不管是好是坏，社会是无法不接受的。社会当然希望它的成员是好公民，而不是“酒鬼、吵闹者、诽谤者、毒杀者、施私刑者”。这就必须使儿童都接受教育。关于教育的重大作用，他在1842年度报告书中说，“教育不仅是道德修复器和理智力量放大器，而且是使物质丰富的最多产的母体。……它（教育）不仅是最为诚实和高尚的，而且是最为可靠的积聚财产的手段”。他指出，教育比金钱更能致富，开办一所学校等于关闭一所监狱。

贺拉斯·曼在任州教育委员会秘书的12年中，每年提交一份年度报告书。在这些报告书中，他详细阐述了美国公共教育问题。他主张实施普及的、免费的和世俗的国民教育，提倡大力发展由公众管理和支持的公立学校，改进校舍和设备条件，学校应有图书馆、博物馆，教室采光应符合要求，空气要流通。他还指出，要在良好的知识和道德环境中招收和训练儿童。他特别强调不同社会出身的儿童应该都上一样的学校，要建立一个免费的学校系统。

贺拉斯·曼非常强调智育和德育的重要性。他“把智育当作除去贫穷而赢得富裕的手段”。他说贫穷既是公众灾害，也是私人灾害。他认为避免贫穷的手段是教育。普及教育“能够抵挡资本的支配地位与劳工的奴役状态这种趋势”，“教育是促使人们现状平等化的得力工具，是社会机器的平衡轮”。他认为智力是财富的条件。他说：“就创造财富而言，从而，就人民富足和国家富足而言，智力是主要的条件”。人民

关于德育的重要性，他说，“德育是社会存在的首要必备条件。人们无克制的情欲不仅是杀人的，而且是自杀的；一个没有良心的社会会立即自行灭亡”。

贺拉斯·曼深知人民的支持对发展教育的重要性。他说，“教育不得到整个人民的同意是永远办不到的”，而对人民，只能是开导，不能强制。他任州教育委员会秘书期间，每年都到州内各地考察教育，出席教育大会，发表讲话，说服人们把自己学区的平民学校恢复起来。他满腔热情地为普及教育奔走呼号，他不断告诉人们，州教育委员会要使教育普及化，要使已有的改革工作经常化。

贺拉斯·曼非常重视师范教育。针对当时公立学校教师数量缺乏和教学质量低劣的情况，他强调师资培训的迫切性，并且认为良好的师资条件是改进公立学校的重要手段。他指出，没有好的教师就肯定没有好的学校，必须创办师范学校，以便培养受过良好训练的教师。他亲自创办了3所师范学校。他认为，既然儿童不分男女都有均等受教育的机会，因此也应吸收女子参加教师行列。他主张教育工作者应经常开会，交流教育教学经验和见解。他还主张，在办学方面政府不应吝惜资金，为求教育之完备，不应吝惜经费。在他任州教育委员会秘书的12年中，马萨诸塞州公立教育拨款增加1倍多；公立学校男教师的薪金提高了62%，女教师人数增加54%，其薪金平均提高51%；新开办中学50所；入学率从人口的绝对和相对增长两方面都扩大了，学年平均延长了一个月。他还在马萨诸塞州建立了图书馆。

在贺拉斯·曼的领导和影响下，马萨诸塞州在普及初等教育方面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并为全国的公立教育定下了基调。邻近的一些州也都加强了平民学校的恢复工作，加强了州的教育行政工作领导，纷纷设立州教育委员会和秘书，或称“州教育专员”，或“州学校督察长”。各州在师资训练、学校物质设备以及课程、教科书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极大的加强和改进。贺拉斯·曼的报告书和演讲的思想在各地得到延用甚至升华。可以说，在19世纪中叶，美国公立教育的发展和贺拉斯·曼的名字是分不开的，他树立了一个里程碑。他是美国第一次教育大改革的推动者，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尊敬。

贺拉斯·曼是个社会改良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所处的具体的国内外环境，使他采取了坚决维护美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社会秩序的立场以及对广大人民真诚同情的立场。他是个教育的行动家，对教育的诸多理论问题尚缺乏深刻的思考。

4. 亨利·巴纳德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

亨利·巴纳德（1811—1900年），美国公立学校运动中的又一著名教育家，他以贺拉斯·曼为榜样，致力于19世纪的美国普及教育事业，以“第一流教育家”饮誉全美国。

(1) 生平

巴纳德 1811 年 1 月生于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1830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在校的最后两年兼任学校图书馆管理员，借此机会博览群书，接触了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增长了各方面的知识和见解，养成了搜集资料的爱好。

大学毕业后，巴纳德在宾夕法尼亚州威尔斯博罗的一所中学当教师。1835 年他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到法院工作，并于当年出访欧洲各国。他深入了解欧洲各地的教育制度和社会状况，受到了裴斯泰洛齐、福禄倍尔、费伦伯格等人的影响，对欧洲教育家们的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国后他放弃了律师职业，开始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

巴纳德从 1837 年当选为州辉格党议员，到 1854 年因病退休，一直从事州一级的教育行政领导工作。1838—1842 年担任康涅狄格州教育委员会秘书，1839 年建立该州第一个教师训练班。1843—1849 年应邀担任罗得岛州教育委员会秘书。1850—1854 年任康涅狄格州新不列颠的州立师范学校校长，并兼任州的公立学校督学。1854 年曾代表美国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国际教育代表大会。1855 年他倡导成立美国教育促进会，并任第一任主席。后来他又担任过威斯康星大学校长（1858—1861 年）和马里兰州圣约翰学院院长（1866—1867 年）。1867 年被任命为美国联邦教育部第一任部长，一直到 1870 年。此后他重新投入编辑出版《美国教育杂志》的事业。到 1900 年他去世之际，该杂志前后出版 30 多年，共计 31 册。杂志的文章大都出自巴纳德的手笔。为这项工作，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他的价值 5 万美元的全部财产。为了一心一意办杂志，他谢绝了许多大学负责人要他去工作的邀请。他还编辑了许多教育专题文集发往全国各地。报告和文集的侧重点是教育行政管理、教育经费、教育立法以及学校教学等问题，对美国公共教育的建立和完善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巴纳德主编和出版的教育刊物，能从美国当时的教育改革实际出发，促使人们开阔眼界，借鉴欧洲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能把国内各州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的教育情况加以汇总和比较，扬长避短，统一思想。刊物的内容也很丰富具体，大量的资料成为后人研究美国教育和欧洲教育思想及教育史的重要原始素材。它的重要价值在当时欧美各国教育界就已被充分肯定。巴纳德以担任重要的教育行政领导职务和编辑著名的教育杂志而闻名于世。他献身于教育资料的编辑出版事业，为此他耗尽大量资财，以致于他去世时已经一贫如洗。他是受人敬仰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教育家。

(2) 推进公立学校运动的实践活动

康涅狄格州的教育事业在 18 世纪是很兴旺的，但到 19 世纪 20 年代出现滑坡，主要原因是教育经费不足和学区过小，不利于公共教育的发展。1838 年巴纳德起草了关于建立“州公立小学委员会”的议案，并获得议会通过。巴纳德辞去议会工作，担任了该委员会的第一任秘书。上任后他创办了《康涅狄格州公立小学杂志》，并用年度报告和到各地广泛游说等办法，宣传普及教育的思想和改善公立学校的计划。通过他的努力，议会通过了几个教育改革议案，并修订了过去的法令。他在一些学区组织教师讲习会，建立图书馆，设立夜间学校，以及改善学校设备

条件等，公立学校的状况出现好转的势头。

巴纳德发展教育的努力遭到了保守势力的抵抗。州长克利夫兰运用他个人在议员中的影响推翻了 1838 年建立公立小学委员会的法案，巴纳德也被免职。对此，贺拉斯·曼非常愤怒和痛心。他说这是“一个罪恶的时刻”，“由于这一打击，整个康涅狄格州的教育运动，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开始恢复生机的躯体瘫痪了”。他对巴纳德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关于亨利·巴纳德先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我们想找一个更合适的人，我们至少要等到下一代，……这位负责人以无限的热忱着手履行他的职责，他把时间、才能和资财都贡献出来以履行其职责。”

1843 年应罗得岛州州长邀请，巴纳德来到罗州专做视察学校、编写报告等督导性工作。1845 年他就任罗州公立学校委员会第一任秘书后，立即创办杂志，不断宣传普及教育的思想和刊登教育论文，举行教师和家长座谈会。还在州内建立了许多图书馆，假期组织教师到各地进行示范教学，学校的设备条件也得到了改善。罗州的公共教育事业跃入全国先进行列，巴纳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他因劳累过度而病倒，不得不于 1849 年辞职。

1851 年巴纳德被请回康涅狄格州担任教育领导职务，他采取了一系列发展普及教育的措施，如重新修订学校规程，限制学区权限，调整教育经费的分配比例，征收教育税和扩大州统一领导教育的职能等。

他一边从事教育实践工作，一边搜集教育资料，写出了长篇报告《康涅狄格州公立小学 1838 年前的立法史》。1855 年，他再次因病去职，以后再未回到直接领导州公共教育的岗位。

(3) 关于普及公共教育的思想

巴纳德认为普及教育非常重要，它是一个国家繁荣兴旺的基础。“一个国家的财富是它的有才智的人”。所以，应该给每一个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每个学区至少建 1 所公立免费学校。

他认为兴办公立免费学校是保证普及教育实施的最好办法，公立学校要对所有儿童开放，由公众纳税和管理，州当局也应给予资助。他强调要改善公立免费学校的物质条件。他要求增加教育税和合理分配经费。

巴纳德重视提高师资质量。他反复强调学校的关键是教师，教育的关键是教师，课程的关键还是教师。他强调必须建立师范学校，使之成为州公立学校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还提出师范学校应当附设“模范学校”作为学生的实习场所。巴纳德还认为提高公立学校教师的物质待遇是保证教师队伍的稳定和提高教师素质的重要条件。

亨利·巴纳德和贺拉斯·曼是同一时代的教育家。实际上他们是承袭了自华盛顿、杰佛逊以来一些美国政治家和知识界人士的公共教育观以及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他们着眼于美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百折不挠地为建立美国式的教育制度而努力奋斗。他们的教育思想

转引自《外国教育通史》第 3 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09 页。

转引自《外国教育史简编》，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0 页。

中也孕含着实用主义的因素。无论如何，他们对美国教育事业的推动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四、俄国教育

1. 19 世纪前半期俄国学制的演变

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俄国是个后起者，它是个长期被封建农奴制所统治的国家。19 世纪初，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增长，在国内外各种进步力量的推动下，沙皇政府允诺实行朝政和教育改革。1802 年成立国民教育部，除教会学校以外，原来分属于各机构的所有学校均由教育部统辖。1803 年颁布了《国民教育暂行条例》；1804 年颁布《大学规程》和《大学所属各级学校章程》。这些章程明显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某些教育法案和拿破仑教育改革的影响。各级学校都不收学费，招收学生也不受信仰、身份和社会地位的限制。章程的颁布与实施形成了俄国的统一学制。它是包括教区学校、县立学校、文科中学和大学在内的初、中、高级相互衔接的全国统一的学校教育制度。

(1) 教区学校

全国分为 6 大学区，各大学区内的最低级学校是教区学校，设在城乡的教区中，学制 1 年，每周上课 3 天，每天 3 小时，目的是使学生升入县立学校。这类学校由地方出资兴办，教授儿童基本的生活和自然知识，训练简单的读写算技能和进行宗教教育，开设《人与公民的义务》课，其中一部分儿童可以升入县立学校。

(2) 县立学校

县立学校设在各省城或县城，每县至少 1 所，修业期限 2 年，目的是为学生升中学作准备，同时对那些无任何特权的自由阶层的子弟授以“适合他们身份的和职业上必需的知识”。教学科目与教区学校相连续并有所扩展，除继续学习神学课和《人与公民的义务》外，还学习俄语语法、世界地理和俄国地理、世界历史和俄国历史、算术、初等几何、物理、自然及与当地经济有关的工艺知识等 15 门课程，每周上课大约 28 课时。这些科目只由 2 名教师承担。县立学校教师的工资由国家提供，其他费用由地方负担。

(3) 文科中学（省立学校）

文科中学设在各省会城市，修业 4 年，目的是为学生升大学作准备；对那些“希望成为一个品质高尚的人”授以必须的科学知识。开设的课程有：拉丁语、德语、法语、地理、历史、普通统计学和俄国统计、哲学初级教程（形而上学、逻辑学、道德箴言）、文艺初级教程（语文学、诗歌理论、美学）、数学（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学、自然（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商业理论、工艺学和图画等 20 门课程。强调课程与实际生活的联系，学校要备有实验室、各种教具设备。每周开课 30 节，学校教师定额 8 名，另有 1 名专职图画教师。县立学校的资金由国家提供，免费招收各种身份的学生入学。

(4) 大学

大学是国家教育制度的最高一级，招收具有中学文化知识水平的人入学。大学的目的是培养担负国家各种职务的官吏和教师，招生没有社会地位的限制。大学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大学校务会议，下设大学董事会和学校委员会。每所大学不仅有一定的自治权，如结社、出版、集会的自由和自行选举校长、系主任、教授等的权利（选举结果要经教育部批准），而且有管理本学区内各级普通学校的行政权。

俄国教育在领导体制上采取了法国的学区制，全国分为莫斯科、彼得堡、卡赞、哈尔科夫、维里诺和德尔伯 6 个学区，上下级学校是一种隶属关系，上级学校领导下级学校。

俄国 19 世纪初的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这时建立的教育制度已带有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某些特征，它规定了各级学校的相互衔接性，没有限制居民受教育的权利，大学享有某些自治权，教学计划中扩大了实科知识的范围等。但是这个教育制度实质上还是为封建贵族服务的。为贵族和官吏子弟设立的中学，经费完全由国家负担，条件非常优越，学生毕业后可升入大学；而为一般居民开设的县立学校，特别是教区学校，经费完全由居民负担，学习期限短，教学科目多，学生毕业后，无法进入中学，政府甚至公开声明不得招收农民子弟入中学。

从 1805 年起，特别是 1812 年俄国反拿破仑战争取得胜利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01—1825 年在位）加强了封建农奴制统治，效仿“神圣同盟”各国的做法，把宗教事务与教育的管理机构统一起来，成立“宗教事务与国民教育部”，加强了东正教会对学校的控制，突出了教育的等级性，禁止进步思想的传播。镇压了 1825 年 12 月党人起义后，其倒行逆施更加变本加厉，沙皇政府日益背弃 1804 年改革提出的各项带有民主性质的原则，削弱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加强宗教教育的内容。特别是 1828 年颁布的《大学所属各级学校章程》，明确规定各级学校为某一特定等级服务，如教区学校只招收“最低等级的”子女，毕业生不能升入县立中学；县立学校只招收商人、手工业者、小有产者及平民子女，毕业生不能升入大学。1828 年规程还允许体罚学生，并对各级学校规定了一套严密的监视制度。1835 年沙皇政府又颁布了新的大学章程，大学中的自治权几乎全部被取消，根本改变了 1804 年教育改革的进步性质，并确立了双轨的学校制度，民主和注重实际的中学正式改变为特权阶级的、古典主义的中学，中等和高等教育系统成了贵族等上层阶级子弟独享的学校。

2.19 世纪中期公共教育运动与学校教育改革

(1) 公共教育运动

19 世纪中期的公共教育运动是在 19 世纪中叶革命形势高涨、沙皇政府酝酿进行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的条件下兴起的。当时围绕农奴制的废存问题，俄国出现了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广泛的社会运动。社会舆论表现出人们对于改变俄国教育落后状况的迫切要求。

教育改革是当时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民主主义者和其他进步思想家就教育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批判了俄国教育制度的封建等级性和不民主的教育教学方法，要求尊重儿童人格，发展公民教

育和女子教育，实现普遍教育；要求建立广泛的国民学校网络和实行高等学校自治。许多教育刊物和教育研究团体纷纷诞生，例如《教育杂志》、《俄国教育公报》、《教师》等刊物的创刊；彼得堡、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城市组织了教育讨论会，在彼得堡成立了教育学会。

从 1859 年起，在彼得堡、基辅、莫斯科和喀山等地开始出现为成人学习文化而组织的星期日学校。一些地方自治机构试图设立小学。著名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就在自己的故乡亚斯那亚·波良那，为农民子弟办了一所学校，还帮邻村筹办了几所学校。

讨论教育的文章不仅发表在教育杂志上，而且发表在文学艺术或政治性刊物上。著名外科医学家尼·伊·皮洛戈夫所写的《人生问题》，就是在《海洋集》（1856 年）上发表的，这充分说明公共教育运动声势之大。一般认为《人生问题》是公共教育运动中来自俄国公众的第一篇重要教育论文。这篇文章抨击了尼古拉一世政府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提出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真正的人”和公民，而不是培养农奴主、官吏、商人、士兵和奴隶。他认为普通教育应当成为专业教育的基础。这与沙皇政府的等级教育制度显然是对立的。这篇文章涉及的问题切中时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评论，对于推动社会舆论重视公共教育运动和教育改革起了重要作用。60 年代公共教育运动中发表的教育论文，大多数是分析和议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而乌申斯基则详细地论述了普及初等教育的必要性。

19 世纪中期的公共教育运动的基本方向是进步的，对俄国 19 世纪 60 年代的学制改革，以及后来俄国教育思想的发展都起了很大作用。

（2）学校教育改革

在强大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教育运动的压力下，沙皇政府不得不对国民教育制度进行某些改革。1860 年颁布了《国民教育部女子学校章程》，1863 年颁布了《大学章程》，1864 年颁布了《初等国民学校章程》、《文科中学和中学预备学校章程》等。

初等教育是 60 年代学制改革的重点。根据国务会议批准的《初等国民学校章程》，初等学校被宣布为无等级学校，可招收各个阶层居民的子弟，不受等级和宗教信仰的限制；授权各地方自治机关，社会团体和私人开办学校；并且允许女子担任教学工作；还建立了领导学校的县教育委员会和省教育委员会。传播宗教观念仍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并且给教士以担任教学工作的优先权。

《文科中学和中学预备学校章程》也宣布文科中学是无等级的学校，招收各阶层的子弟入学。这使中等教育机构从封建的等级学校向资产阶级学校前进了一步。

中学除文科中学外，还增设了实科中学，废止了对学生的体罚，扩大了校务会议的职权。但是，根据文科中学章程的规定，只有讲授两种古代语文的古典中学的毕业生才有权利升入大学，实科中学的毕业生最多只能进入高等专门学校。中小城市可开设 4 年制的不完全中学，相当于正规中学的前 4 年。由于希腊语教师的缺乏，约有 2/3 的古典中学的古典语教学中只教拉丁语，被称为半古典中学。中学教师会议和权限得到了扩大，会议可决定教学和教育方面的各种重要问题，校长无权直接

予以更改。

上述章程颁布后，对教育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到 1871 年，中学增加了 27 所，总数达 123 所，学生 39650 人。总的看学校事业尚有发展，但实科中学数量少，地位低，且劳动者家庭的子女仍难以入学。

俄国的女子中等教育，以斯莫尔尼女子中学的创办为发端。它建于 1764 年，是第一所贵族女子中学，修业 12 年。次年又在此设 1 所招收非贵族出身子女的中学。两校修业内容和年限基本相同。以后又有一些省城也设立这种女子中学。

1860 年《国民教育部女子学校章程》又规定：设立无等级的女子学校，分为 3 年制和 6 年制两种，目的是“对未来家庭中的妻子和母亲给予宗教的、道德的知识的教养”。1864 年，有 6 年制女子中学 29 所，3 年制女子中学 91 所，学生总数是 9000 人左右。1870 年颁布的《女子中学章程》正式确定女子中学为 7 年制，并附设一个第八年级的师范班。女子预备中学为 4 年制。政府不负责女子中学的经费，只给少数女中以财政补助。女子中学是在社会支持下得到较快发展的。

在高等教育方面，1863 年 6 月 18 日通过的大学章程使高等学校又获得了某些自治权：校务会议有权选举正、副校长，任期 4 年；由系务会议选举系主任；教授按竞选的方式选出；给予教研室以较多的机会进行学术研究活动。

19 世纪 60 年代的学校教育改革，一方面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另一方面又带有深刻的保守烙印。因为 19 世纪中期俄国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是自上而下推行的，改革后沙皇专制制度依然存在，贵族利益依然受到保护。正如赫尔岑批评 1863 年大学章程所指出的，“政府做事，象罪孽深重的耶路撒冷的朝参圣地者，前进三步，又后退两步，但毕竟剩下了一步”。这是对这次改革深刻而形象的评价。尽管 60 年代的章程还带有一些保守特征，但在整个沙皇统治时期已是最好的法令了。通过这些章程的实施，俄国各级学校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章程通过后的最初 10 年里，地方自治局大约开办了 1 万所地方学校。有些地方自治局还在自己开办的师范学校里组织了国民教师的培训工作，举行教师代表会议，举办教师讲习班，建立学校图书馆等。还有些地方自治局组织力量为教师编写了教学法参考书。

3. 乌申斯基的教育思想

(1) 生平

康·德·乌申斯基（1823—1870 年），生于车尔尼柯夫省土拉城一个贵族官吏家庭，东正教教徒。在文科中学受完中等教育后，于 1840 年 8 月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1844 年 6 月获硕士学位，作为毕业生中“操行极好、学业优异”的 3 名“最优秀硕士”之一被推荐给国民教育部。1846 年被任命为雅罗斯拉夫法律专科学校代理教授。1849 年因拒绝沙皇政府审查教学大纲而被免职。此后，迫于生计在内政部任职 5 年，担任宗教事务局国外信仰科科长。这一工作使他十分厌烦。从 1852 年起，他开始为《现代人》杂志撰写稿件，并为其他刊物撰写文章，如《读书文库》、《俄国地理协会通讯》等，这使他进一步积累了多方面的知识，

并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

1854—1859年，乌申斯基被任命为加特钦孤儿院的俄语和法律学科的教师及学监。1859—1862年被任命为斯莫尔尼女子学院监督。在此期间，他对学校教学制度和生活管理制度进行了改革。他曾担任《国民教育部公报》编辑，把这个教育刊物办得富有生气，深受欢迎。该刊广泛传播教育与哲学知识、交流国内外教育情况，对文科中学和县立学校教师形成共同的社会信念和教育见解起了推动作用。他的进步活动和教育理论为沙皇政府所不容，1862年夏天被免职。

1862—1867年，乌申斯基到国外考察，主要居住在瑞士。他考察了瑞士、德国、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学校教育，进行了教育理论研究。1867年因患重病回国，1870年病逝于奥德塞。他的主要教育著作有：《儿童世界》（1861年）、《祖国语言》（1864年）、《人是教育的对象》等。

(2) 主要教育思想

对教育学和教育理论建设的见解。他一贯重视教育理论的作用。他的第一篇论文《论教育书籍的益处》专门论述了教育理论建设的必要性和教育学的性质。他断言，教育理论的薄弱无疑将对国民教育制度改革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他认为人的身心发展都是有其内在规律的。教育实践如果缺乏理论指导，就不可能取得积极效果。他认为，无论是教育目的确定、教育内容和方法的选择，还是教学过程和教学组织形式的安排，都要有教育理论作依据，不能只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他反对经验主义的倾向，同时也反对理论脱离实际，强调二者的统一。他认为教育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是一种学艺。他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教育的。

乌申斯基主张区别两种教育学：“一类是广义的教育学，即对教育学者所必须的或有用的知识之汇集，一类是狭义的教育学，即教育规律的汇集。”他认为狭义教育学对教育工作者帮助不大，甚至有害。他认为，教育学应该“是一切学艺中最广泛、最复杂、最崇高和最必要的一种。教育学艺是以科学为依据的”。只有依靠“许多广泛而复杂的科学”所提供的知识建立的广义的教育学，才能给教育工作者以真正的帮助。他非常强调教育学艺的普遍推广。

乌申斯基关于教育学和教育理论的见解，揭示了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教育学的某些本质特征，丰富和发展了俄国教育理论。

乌申斯基对教育的一般原理进行了深刻阐述。他强调，教育的首要问题不是学校的教学科目或体育规则问题，而是人的精神和人生问题，“如果教育学希望从一切方面去教育人，那么，它就必须首先从一切方面去了解人”，因为“人是教育的对象”。

他承认教育在人的生活中有重大意义，但他认为教育的作用是有限的。他指出：“作为一种有意的活动的狭义教育——学校，和负实际责任的教育者和教师们——绝对不是人的唯一的教育者，而无意的教

育：大自然、家庭、社会、人民及其宗教和语言，一句话，自然与历史，就这些广泛概念的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也有同样大的效力，也许是对人有最大效力的教育者。”这表明了他对遗传、环境与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深刻而独特的理解。

乌申斯基反对天赋观念论，但不否定遗传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神经系统特性的差异在人们性格的形成上要起很大的作用，而这种特性往往是父母遗传的。他同时强调环境与教育在人的发展和形成人的真正品质中的决定性意义。他认为，优良的遗传素质只有在良好的生活条件下才能得到发展，由遗传带来的不良胚芽在健康的环境中也可以得到改造，而完善的教

育可以使人类的身体的、智力的和道德的力量得到广泛的发挥。可见他认为，环境和教育对人的个性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论教育的民族性原则。乌申斯基把民族性教育原则作为教育理论体系的基础。在《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祖国语言》等论文中，阐述了教育的民族性问题。他的民族性思想反映了他对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以及教育与民族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他看来，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教育都是在这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且随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而发展。乌申斯基考察了欧美主要民族国家公共教育发展的历史，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民族的公共教育虽然有某些共同点和共同的历史基础，但是都有自己的特点，这是进入近代以后各国按照自己的道路发展的结果。所以，他反对盲目抄袭别国的教育制度，强调教育的民族特点。

他认为，民族性是教育发展的希望之所在，“教育始终只是从这个丰富而纯洁的源泉吸取力量”，“教育诉诸民族性，永远会在人的活跃而强烈的情感上找到回答和帮助”。而民族性教育对于民族的发展，对于本民族的民族性的完善有着重要作用，是“民族发展历史过程中有生命力的工具”。他认为：教育能够帮助自己的国家发展其人民的民族意识，即“对社会的发展，社会的语言、文学、法律，总之，对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有力的良好的影响”。

他提出要建立具有俄国自身特色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体系。这种独创的教育体系应该反映俄国的教育目的，反映他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利益，摆脱其他国家教育理论的不良影响。他特别批判了德国教育学和教育实践中的缺点以及沙皇政府盲目以德国教育体系为模本的作法。

乌申斯基的民族性思想中包含着深刻的人民性思想，并强调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他还特别强调祖国语言的教育和教养的重要性。他认为民族语言是各族人民最伟大的创造，是各个民族特征和生命力的表现。他非常重视俄语教学，他指出：“民族的语言是一个民族远在有史以前就已开始了的全部精神生活的一朵最瑰丽的、永不凋萎的、永远开放着的鲜花……在民族语言明亮而透彻的深处，不但反映着祖国的自然，而

转引自滕大春主编的《外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82 页。

转引自滕大春主编的《外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83 页。

《乌申斯基文选》第 1 卷，第 133 页。

且反映着民族精神生活的全部历史。”

概括起来说，乌申斯基论述的民族性教育有这样一些特征：首先，他强调人民是民族性教育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也是民族教育成功的基本保证，他指出：“国民学校只有为人民自己关心它的发展时，才能广泛地和毫无阻碍地发展起来。”其次，他强调教育应当是人民的，应该由人民自己来管理和领导，任何人都无权干涉。第三，民族性教育应当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标准，造就人民的新生一代。第四，民族性教育应当是男女平等的教育，男女儿童应有统一的教育制度。第五，民族性教育应把本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把本民族语言的学习放在中心地位。第六，培养儿童的爱国主义情感应该在民族性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

乌申斯基强调教育的民族性原则，同时也肯定借鉴外国先进教育经验和教育理论的意义。但是，他把宗教情感也看作民族性的组成部分，并且在民族性思想中还强调了宗法观念，这些是消极的，不正确的。

教学理论。教学理论是乌申斯基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非常丰富，具体贯彻了他的教育学思想和民族性原则，并以心理学作为教学论的主要基础，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俄国古典教学论体系，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乌申斯基论述了教学的目的和内容。他认为教学有两个方面的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形式的目的，它在于发展学生的智力，发展他们的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幻想力和理解力”以及“发展学生获得新知识的愿望”。实现了这一目的，学生在离开学校以后，就可以自己继续学习，不断从书本和生活中获得知识。第二个目的是“实质的目的”，即以必要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去丰富学生的头脑。否则，就不可能具备真正的观察力和理解力。两个目的同样重要，在一定意义上说，第二个目的更加重要。关于课程的内容，乌申斯基强调实科教育应优先于古典课程，主张每门学科都必须充满实际生活知识。他认为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不仅适应现代社会，而且在发展儿童的智力方面比古典学科更有作用。他主张在小学以本族语为基本学科，通过本族语言的教学，不仅使儿童掌握读写技能，还要使其获得关于社会和自然的初步知识，全面发展儿童的智力和体力。他还非常强调劳动教育，认为“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对人的健康是最有益的”。

乌申斯基把教学看成是“教育的主要工具”。他要求教学“不仅要影响知识的增长，而且要影响人的信念”。他把教学是否具有教育性看作教学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

乌申斯基把教学看作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双边活动，是师生双方艰苦而复杂的智力劳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传授知识与技能；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掌握知识与技能。教师的“最主要的职责是养成学生智力劳动的习惯”，“这个职责比传授学科本身更加重要”。

教学是学生由不知到知的过程。乌申斯基指出，学习是劳动，而且是艰苦的劳动。他反对流行的自由、自发式教学，反对把学习变成娱乐和混时间，认为那样“头脑、心灵、德性会堕落下去”，并且认为指望一切学科都使儿童感兴趣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学习过程不是学生自己去摸索，而是在各个步骤中都以教师的语言及教师的其他方式的指导

为重要条件，整个教学过程都是教师的积极指导和学生的积极学习的紧密结合。

他还认为，教师在教学中要使学生既“不要过于紧张”，也不要“过于轻松”；教师是帮助学生克服学习中的困难，进行“辅导性的教学”，即“不是教，而是帮助学”。他还提出：“任何一门学科的教学一定要这样地进行，要使留给学生的劳动量正是他的青春活力所能胜任的。”

乌申斯基的教学理论是以心理学为主要基础的。他以唯物主义的认知论为基础，批判地吸收了各种心理学派别的思想，建立起他自己的心理学理论，阐述了教学中的主要心理现象，如注意、记忆、思维、意志、情感等。

关于教学原则，乌申斯基提出了自觉性和积极性原则、直观性原则、连贯性原则和巩固性原则。他认为，教学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各教学原则应是有机联系和相互促进的关系，并共同影响教学的成败。

乌申斯基还阐述了班级授课制度及校长在教学中的作用等问题。他称校长为“主要教育者”，要求校长直接关心课堂教学，首先是亲自任课。他要求校长和优秀教师出席重要考试，公正、客观、全面地评价学生的知识水平。他还认为，校长在建立学校教学工作的物质基础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乌申斯基不但在教育理论研究方面很有成就，而且对俄国初等教育发展中许多实际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贡献。他编写了《祖国语言》（共分三册）和《儿童世界》两部教科书；对培养教师的工作非常重视，对教师提出很高的要求。他编写的教科书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广为流传，教育了几代俄国儿童。

乌申斯基一生呕心沥血为教育，逝世时年仅 47 岁。他的教育思想达到了俄国古典教育学的顶峰。人们誉他为“俄国教育科学的创始人”、“真正的人民教育家”、“俄国教师的教师”。他在俄国教育界的地位如同普希金在文学界和罗蒙诺索夫在科学界的地位。乌申斯基的教育理论对前苏联及东欧各国教育理论的发展也具有相当的影响。

4.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教育观

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教育思想是俄国 19 世纪中叶教育运动中最激进的一派。它建立在更彻底的唯物主义基础上，对沙皇专制主义的斗争也更为坚决和彻底。革命民主主义者最初（40 年代）的主要代表是平民知识分子别林斯基（1811—1848 年）和赫尔岑（1812—1870 年）。60 年代的代表有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 年）和杜布罗留波夫（1836—1861 年）。车尔尼雪夫斯基集中和发展了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等人的先进思想，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最杰出的代表。

革命民主主义者反映了俄国广大农民的利益和愿望，希望把广泛的农民起义发展成革命，推翻沙皇统治，通过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在当时的俄国是最激进的革命思潮。革命民主主义者也非常关心并积极投入 19 世纪 60 年代的俄国公共教育运动，他们明确提出要彻底废除

农奴制教育制度、建立新的教育制度、教育培养新人。新人应具备的条件是：在智力上要以多方面的知识武装头脑，具有良好的思考力、理解力和判断力；在道德品质方面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劳动，关心人类的未来，为崇高的目标而斗争；身体方面要健康，并能自然和谐地发展。总之，这种新人应该是全面发展的。

(1) 别林斯基和赫尔岑

别林斯基担任过私人教师，担任学校教师的时间只有一年左右。他的教育观点主要反映在他当时发表的 130 多篇文学评论文章以及对各种教科书的批评文章中。赫尔岑则主要是个文学家和革命家。他们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也把斗争矛头对准了沙皇政府的教育政策。他们指控沙皇政府的教育是“迫害灵魂”，揭露当局和教会对进步师生的镇压，要求尊重儿童的自然个性，培养儿童的创造能力，鼓励青年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别林斯基指出：“完善而健全的人是把祖国的命运沉重地放在心上的。”他们要求不分男女，人人都应受到教育。别林斯基强调教育中的俄罗斯人民性原则，主张从小对儿童进行俄罗斯文学和历史方面的教育。

别林斯基和赫尔岑主张实施广泛的人的教育，尤其重视德育和智育，主张大力进行俄国文学、自然科学和实科教育，反对当时贵族家庭中对孩子放任自流的作法，也反对来自欧洲的“自由教育”思想。

(2)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继承和发展了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教育观，提出了造就社会新人和优秀公民的教育理想，主张对男女儿童进行广泛的普通教育，尤其强调学习俄文、俄国文学和自然科学，要求尊重儿童和彻底取消体罚，并对教学方法、教师职责和任务提出了具体见解。他们特别明确提出，真正的教育必须建立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具备一定物质财富的基础上。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政治权力、物质财富以及教育，这三者难以分割地结合在一起。贫困中不能发展自身的智力；智力不发展则不能以自身的作用行使权力；不能行使政治权力就不能解决压迫、贫困、无教育状况。”

革命民主主义者把教育问题与当时的革命斗争相联系，揭示了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之间的依存关系，其教育见解大大超出了当时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眼界，并与一切改良主义或教育万能的主张划清了界限。

五、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

约翰·亨利希·裴斯泰洛齐（1746—1827年），瑞士大教育家。他在艰难坎坷的一生中，从事过牧师、法律及农业多种行当，终对教育事业忠心耿耿，坚持长期的教育实验和理论探索，奠定了现代初等教育的基础，为人类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主要教育著作有：《林哈德和葛笃德》（1781—1787年）、《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孩子们》（1801年）、《与友人论施坦斯经验的信》（1807年）、《论早期教育书简》（1816—1819年）和《天鹅之歌》（1826年）等。

1. 生平和主要教育活动

裴斯泰洛齐 1746 年 1 月出生于瑞士苏黎世。其父是个医生，在他 5 岁时去世。他深受母亲和祖父的影响，他们仁慈宽厚，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祖父是传教士，在职 42 年。裴斯泰洛齐幼年时就经常跟随祖父到教区访贫问苦。劳动人民苦难的现实使他坚定了改造社会的决心，使他后来成为一位伟大忘我的教育家。他回忆说：“从青年时代起，我的心就象一条奔腾的激流那样，孤独而寂寞地向着我唯一的目标前进：消除苦难的根源。”

裴斯泰洛齐 9 岁上小学，后在一所拉丁学校接受中等教育；17 岁上苏黎世大学，预备研究神学，19 岁改习法律，受哲学教授布来丁格的思想影响很大，曾参加苏黎世爱国青年组织。1767 年大学毕业后曾在一个田庄学习种植法，以期帮助农民改善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次年购买一个小田庄，建一所住宅，其田庄命名为“新庄”，企图建成一个模范农场，帮助农民学习农业技术。自此，开始了他 60 多年的教育生涯。

他的教育实验活动经历了如下几个时期。

(1) 新庄 30 年（1768—1798 年）

1769—1774 年，是裴斯泰洛齐经营农场时期。经营结果失败，拍卖了部分农庄财产抵债，但是他的奋斗激情和为民服务的热忱不减。这期间他的独子出世，他摹仿卢梭的名字，给儿子取名雅克。为了尝试卢梭的教育理想，他逐日认真观察儿子的行为和他试验的情况，记了一本“教育三岁儿子的日记”。这是他关于教育儿童的第一次记录。雅克象卢梭的“爱弥儿”一样，直到 12 岁时，仍然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他由此认定卢梭的教育方法有缺陷，便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

1774—1780 年，裴斯泰洛齐在新庄创办孤儿院，实验贫儿工艺教育，他招收几十名孤儿和流浪儿童，多时达 80 人。他创办孤儿院不是为了救济，而是为了教育。他要“在穷困中教育人”，让贫儿们认识贫穷的真面目，从而培养他们的能力来克服贫穷。他说：“常年来我与 50 个乞丐儿童共同生活，在我的穷困生活中，他们分享我的面包，我也如同乞丐一般，我的目的是教乞儿过人的生活。”

裴斯泰洛齐办孤儿院的主导思想是让儿童进行自给自足的劳动，夏季耕田，冬季纺织。农场办有乾酪制造厂和纺织厂，聘有技工，负责教授儿童手工业技术。他亲自教授儿童读书、写字和算术。男孩还要从事

园艺，女孩还要学习烹调和缝纫。经过教育和生产劳动的锻炼，原来营养不良、道德不良、智力迟钝的儿童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他们变得强壮能干、快乐而热诚。裴斯泰洛齐的事业得到了人们的赞扬和社会的赞助。但是，由募捐和裴氏的私人财产长期维持孤儿院是不可能的。1780年孤儿院停办，他的第一次贫儿工艺教育实验也就此结束。

裴斯泰洛齐没有丧失教育可以改造社会的信心。1780年他发表了格言式短文，批评当时形式主义的虚伪的学校教育，倡导教育应重在启发内在能力，提出普通教育应是各种专门教育的基础等思想。

1781—1787年裴斯泰洛齐所著《林哈德和葛笃德》一书陆续出版，全书共4卷，是一部伤感性教育小说，塑造了富有教育理想的“伟大母亲”葛笃德。裴斯泰洛齐把“起居式教育”体现在葛笃德的一言一行中。这种“起居式教育”成为他后来提出的“基本教育”的演练。这部书的问世使裴斯泰洛齐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伯尔尼经济学会给他颁发了奖状和金质奖章，许多知名人士来新庄拜访他，奥国首相和普鲁士王后都对他表示推崇。周围的人也对他刮目相看。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立法议会授予他“法兰西共和国公民”的荣誉称号，这使他成了以自由保卫者而闻名的18个外国人之一。

裴斯泰洛齐在新庄的最后十年里，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极度艰苦。他在教育中的失败，使他逐渐领悟到个人改造社会的尝试是不能成功的，改造社会只能依靠人民的力量。

(2) 在斯坦茨创办孤儿院（1798—1799年）

1798年瑞士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海尔维第共和国。共和国新政府聘裴斯泰洛齐为《民众报》编辑，但他更愿作一名教师。后来斯坦茨城在镇压贵族的反革命暴乱中被烧毁，留下许多孤儿，政府委托裴斯泰洛齐组织孤儿院，并拨款6千法郎。他欣然接受了委托。

1799年1月斯坦茨孤儿院正式开办，收容了5—10岁的儿童80人。儿童的健康和道德状况极差。办学条件极为艰苦，没有设备，没有助手，只有一个仆役，一切都要裴斯泰洛齐亲自动手。他成了这80个儿童的父亲、教师和保姆。他开始了新的教育实验活动。他的教育目的“在使他们过着共同的新生活，有新的力量，在孩子们中唤醒他们兄弟般的情谊，使他们成为热情的、公正的和亲切的人”。他在孤儿院实施的主要教育原则是：实施爱的教育，激发儿童的良心，培养儿童善良的情感和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精神；坚持教育教学直观化原则，从观察入手，以生动、直观的事例和老师本身的榜样作为教育手段；进行劳动教育，使儿童经受劳动训练，从而获得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技能；尊重儿童的个性和人格，发展他们的自主精神，让他们学会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

裴斯泰洛齐力求使孤儿院的教育和生活家庭化。他和孩子们一起吃住，一起劳动，教育他们，鼓励他们，给他们温暖和爱。他的教育实验取得了良好效果。几个月之后，孩子们的健康和道德都明显好转，他们变得活泼聪明。

斯坦茨孤儿院的经费开支由政府负担，因此儿童劳动的时间可以大大减少，有较多的时间实施文化教育。孤儿人数由80人增至100人，最

后达到 169 人。但是 6 个月之后，孤儿院被迫停办，这里成了法国军队的医院，裴斯泰洛齐痛苦地离开了斯坦茨。

(3) 在布格多夫创办小学（1800—1804 年）

1799 年裴斯泰洛齐离开斯坦茨，来到伯尔尼附近的布格多夫。起初在一个鞋匠办的学校任教，后来转入一所“识字学校”。从此他开始探索新的教学法。他所教的学生是 5—8 岁的儿童。不满一年，儿童即能读书、作文、绘画、算术，兴趣颇为广泛。他采用启发式教学，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活动，尊重学生的个性和兴趣爱好。他优异的教育成绩受到社会好评。1800 年，24 岁的赫尔巴特慕名来布格多夫参观裴斯泰洛齐的教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年后他发表文章谈他同裴斯泰洛齐会见的情景，高度赞扬裴斯泰洛齐的教学工作，称他是“高贵的裴斯泰洛齐”。

裴斯泰洛齐的教学成绩，使地方政府给了他在更大范围进行教学实验的机会。1800 年 5 月，他来到布格多夫城一所男童学校任教，同时遇到了赫尔曼·克鲁塞。克鲁塞是一名乡村教师，由于战争的原因，他带着一批学生来到布格多夫，以后成为裴斯泰洛齐的得力助手。

1800 年 10 月 1 日，由政府批准，包括裴斯泰洛齐和克鲁塞两所学校学生在内的新学校在布格多夫成立。裴斯泰洛齐担任了这所学校的领导工作，他有 4 个助手，分别担任读法和算术、历史和地理、音乐和图画及体育的教学工作。该校实行班级教学，裴斯泰洛齐的新教学方法得到了充分实验的机会。

政府批准该校招收公费生 12 名，专门学习教学方法。该校附设有教师训练班，后人称这个教师训练班为欧洲近代最早的师范学校。

裴斯泰洛齐平等地对待学生，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和他们谈笑，带他们到山间玩耍，感受大自然之美。学生们对功课也极感兴趣，自己管理自己，从不用惩罚。裴斯泰洛齐训练道德的方法是“在儿童面前，做给他们看，依你所希望他们的去做，使儿童完全信任你，爱你”。一个农民参观了这所学校之后赞叹地说：“这不是一个学校，简直是一个家庭。”

布格多夫新学校的成就再次赢得众多人士的仰慕，他们纷纷前来参观，有些还制定仿效的试验计划回本地推行。

1804 年，瑞士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布格多夫的试验受到摧残，政府无意继续支持布格多夫的学校；6 月 12 日，裴斯泰洛齐和一些教师只好带着学生去伊佛东办学。

(4) 在伊佛东创办学校（1804—1825 年）

1805 年，在政府指定的一个大堡寨里，裴斯泰洛齐开设了一个很大规模的学院，包括中学和师范学校，简直是一个教育实验中心。最初十年，是它的全盛时代。大量学生从瑞士各地涌来，各国政府也派青年前来学习；教师工作非常勤奋，裴斯泰洛齐的各种教学法都得到广泛实验和应用；欧美各国君臣、王侯、政治家和教育家络绎不绝前来参观。裴斯泰洛齐被誉为“教师的教师”和“人类的教育家”。福禄倍尔两度来校参观考察，对裴斯泰洛齐的为人极为推崇。

伊佛东学院的后期，逐渐出现不祥迹象。首先是学生和教师的增多给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再者，裴斯泰洛齐施行的是“起居式教育”，他个人的能力终究是有限的。学生的增多和逐渐成人化，教师不能再搬用裴斯泰洛齐的初等教学法；另外，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贵族和富裕资产者的子弟，他们的目的是上大学做官，与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宗旨完全不同。更为严重的是教师之间的矛盾和不团结日益严重，加上经济困难，学校终于在 1825 年关闭。

伊佛东学院关闭之后，裴斯泰洛齐绝望地回到了 50 年前他教育活动起步的新庄，完成了《天鹅之歌》和《命运》两部著作，1827 年 2 月 17 日，与世长辞，终年 81 岁。

1846 年裴斯泰洛齐诞生百年纪念日之际，瑞士阿尔高州人民在他墓前立了一块纪念碑，碑文写着：“在新庄，你是穷人的救星；在《林哈德和葛笃德》中，你是人民的导师；在斯坦茨，你是孤儿之父；在布格多夫，你是国民学校的创始人；在伊佛东你是人类的教育家。你是一个完全的人，一个基督徒，一个公民。你一切为人，毫不为己。裴斯泰洛齐之名，万古长存！”

2. 社会观和教育观

裴斯泰洛齐的社会观具有民主主义性质。他希望自己的民族复兴，同情劳动人民，但并不打算反抗奴役者。他深受法国启蒙学派，特别是卢梭的影响，希望改善贫苦人民的生活处境。但是他不了解社会不平等和劳动人民贫困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他认为社会的腐败和道德的堕落是不合理和不平等的教育制度造成的；劳苦大众的贫困和悲惨遭遇，是缺乏教育和文化科学知识的结果。

裴斯泰洛齐对教育的社会作用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他天真地相信，通过启发和教育能够根本改变劳动人民的生活处境。因此，他主张教育应成为全民的财富，应让每个人受到教育。他严厉地批评了当时不平等的国民教育制度。他把这种教育制度比喻为一座大厦，他说：“大厦的上层宽敞明亮、艺术高超，但为少数人居住……中层，居住的人就比上层多得多，但是这里并没有上升的阶梯使他们能够合乎人性地爬到上层去……最后，在下层住着无数的人群，他们和上层的人们一样，有享受阳光和新鲜空气的同等权利。但是，他们不仅是被放在令人作呕的黑暗中、没有光亮的洞穴里，而且蒙住双眼，他们即使仰望大厦的上层，也是不可能的。”他对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深为不满，但是他不了解，要改变这种教育制度，必须变革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消灭社会的等级和阶级差别。

裴斯泰洛齐主张人人受教育，但他并不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受同样的教育。他认为每个等级都应当获得符合他的社会地位的教育，农民的子要准备作农民，手工业的子要准备作手工业者，贵族的子要准备当贵族。这实质上仍然是教育的不平等。这充分表明裴斯泰洛齐尽管同情劳动人民，仍然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

裴斯泰洛齐认为学校是改造社会的最重要杠杆之一。整个教育的中心问题在于形成人的道德：“对人们的积极的爱”能使人在道德方面前进。这种“对人们的积极的爱”是以相信“自然宗教”为前提的。裴斯泰洛齐反对官方的宗教和僧侣。

裴斯泰洛齐认为，人的教育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手段是劳动；劳动不仅能发展体力，而且能发展智力，并且形成人的道德。从事劳动的人能够形成一种信念，相信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意义，而这种信念是把人们联系在友好和巩固的社会关系中的最重要的手段。

裴斯泰洛齐重视人的天性，要求根据人的天性进行教育。他说：“按照人的天性，如果不加约束，任其自然发展，则愚昧、粗心、无知、懈怠、轻佻、妄信、胆怯等将不一而足，更加上无限的贪欲和损人利己的行为，即形成诡诈、狡猾、恶毒、猜疑、强暴、冒险、寻仇、残忍等性格。这是人的天然本性，一旦听其自然地成长，就必然是这样。”他确信，通过合理的教育可以改变人的不良性格。

裴斯泰洛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有道德、有智慧、有劳动能力与身体健康的人，即所谓“完人”或“真正的人性”。他说：“为人在世，可贵者在于发展，在于发展个人天赋的内在力量，使其经过锻炼，使人能尽其才，能在社会上达到他应有的地位。这就是教育的最终目的。”

3. 关于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

裴斯泰洛齐确定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人的天性和形成完善的人，即使人的天赋才能得到充分的和谐的发展。裴斯泰洛齐在《天鹅之歌》中这样写道：“依照自然法则，发展儿童道德、智慧和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发展，又必须顾到他们的完全平衡。”这里的“平衡”即“和谐发展”之意。他还明确谈到初等教育的任务在于“和谐地发展个人的各种能力”。

裴斯泰洛齐的“和谐发展”包括体育劳动教育、德育和智育三个方面。他主张体育跟劳动教育相联系。体育的任务是把所有潜藏在人身上的天赋的生理上的力量全部发展出来。他认为体育是劳动教育的最基本的和初步的阶段。因为没有体力的发展，劳动教育、劳动习惯、技能的培养、训练都谈不到。他把劳动教育看成是培养儿童独立生活能力、改善贫困生活状况的途径。他自信这是一个“伟大的主张”。重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是正确的，但他在实践中以劳作为主，学习为辅，使学生很难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不过，在他所处的社会条件下，能象他所做的那样已很难能可贵了。

裴斯泰洛齐认为道德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关键问题”，也是培养“和谐发展”的“完善的人”的重要方面。他说：“人生在上，是社会的一分子，风俗道德是和他息息相关的。一生的生活，是否幸福、平安、吉祥，则要看他的处世为人是否道德无亏，能否做社会的表率。

转引自滕大春主编的《外国教育通史》第3卷，第186页。

《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第173、206页。

因此修身的教育，也成为他的学校工作的主要部分。”

裴斯泰洛齐认为，道德教育的最简单的要素是儿童对母亲的爱。这种爱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一个人道德力量的实现。儿童对母亲的爱，是因为儿童在家庭中自然地感受到母亲的慈祥、亲切、祥和、抚爱。儿童会把对母亲的信任和爱扩展到父亲和兄弟姐妹，然后再扩展到邻人，以至爱全人类。

他认为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在家庭教育中母亲起着重要作用。他要求学校德育首先要同家庭教育相联系，学校和家庭不能分割开来。他提出：“初步的道德教育，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包含着三个显著的部分：儿童的道德感必须首先从他们富有生气的和纯洁的情感所引起；然后他们必须练习自我控制，并教导他们关心一切公正和善良的东西；最后，他们必须通过思考和比较，自己形成关于他们的地位和环境所应有的道德权利和义务的正确观念。”

在发展儿童道德情感和形成儿童善良行为中，教师的示范具有重要作用。他认为，用个人的示范行为去感化儿童，比用道德说教和恐吓去迫使儿童顺从更有效。他要求教师热爱儿童，关怀儿童，与儿童建立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顺利进行道德教育的必要条件。

裴斯泰洛齐把道德教育归结为爱所有的人，是资产阶级的博爱观，在阶级社会中爱一切人是不可能的。

裴斯泰洛齐非常重视智力教育，认为智育对人的和谐发展有重要作用。他认为人的认识开始于感性，人的认识过程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混乱模糊的感觉印象上升到清晰观念的过程。教学的任务在于消除最初感觉印象的混乱，使各个物体一一区别开来，把相似的或是相互有关的印象在想象中集中起来，弄清楚，把完全弄清楚了的对象上升到明确的观念。教学必须帮助学生通过感性经验去获得一定的知识，并发展他们的智力，特别是要发展儿童的思维能力。他说，必须“集中地提高智力，而不仅是泛泛地增加知识”。但是，智力的发展，不能离开一些知识的积累。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主张在初等学校要向学生教授语文、算术、历史、地理、制图、图画、唱歌等多方面的知识，学习的方法，他认为尽可能多的观察和练习是非常必要的。

综上所述，裴斯泰洛齐的教育目的是适应儿童的自然禀赋，把他们培养成和谐发展的完善的人。这种和谐发展的完人，不但能依靠自己的能力生活得很好，而且还能关心别人，更不能侵犯别人的生活。这正是裴斯泰洛齐教育活动和教育理论的根本出发点。

裴斯泰洛齐根据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和他提出的教育要素理论，研究了小学各科教学法。他的小学各科教学法的实质，是将每一个教学活动依一定的程序分为若干细小的步骤，一步一步递进，使新旧概念成为一个自然联系的系统，使学生能获得扎扎实实的知识和系统的学习。形状、数目和语言是教学的三个基本要素；而这三个要素还有其更简单的要素。小学分科教学正是从这些最简单的要素开始。裴斯泰洛齐的小学各科教学法，几乎囊括了现今小学所有教学科目，奠定了小学各科教学

《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第 171 页。

《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第 202 页。

法的基础。裴斯泰洛齐因此赢得了教育史上小学各科教学法奠基人的称号。裴斯泰洛齐还试图建立一个以心理学规律为基础的平易可行的小学教学法体系，但这种努力未能成功。

4. 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验

裴斯泰洛齐在新庄和斯坦茨执教期间，认真进行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验。

新庄孤儿院是一所劳动学校，办学宗旨不在于救济当时生活无靠的贫儿，而在于对他们进行教育，训练他们的能力，有把握地面对今后的生活。他还提出了孤儿院的另一项任务：要完全依靠儿童通过劳动得来的钱维持孤儿院的生活经费，使孤儿院成为一所自给自足的劳动学校，儿童们学农又学工，既在田里劳动，又在纺纱机和织布机房劳动。劳动之余，裴斯泰洛齐教他们学文化。儿童们生产出的手工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裴斯泰洛齐亲自跟学生一道去市场卖东西。这样，儿童的劳动不仅具有教育意义，而且具有经济意义。

在斯坦茨，裴斯泰洛齐继续进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验。孤儿院里的儿童每天早上6—8点和下午4—8点学习，其余时间劳动。劳动主要是生活服务性的，少数儿童学习纺纱。他“试图使学习与手工劳动相联系，学校与手工工场相联系，使它们合二为一”。但由于条件不具备，加之时间短暂，这一设想没有完全实现。但从总体上看，斯坦茨的实验比新庄的实验还是前进了一步。在这里，他更重视对儿童劳动技能本身的训练，并在劳动中培养儿童勤劳、精细、有计划、重条理等良好品性，而较少注意眼前的经济利益，他们不再仅仅是为挣得生活费而劳动。在斯坦茨孤儿院时期，劳动的生产性已被教育性所取代。儿童边劳动边学习，在从事手工劳动的同时，可以教他们很多东西。而在新庄孤儿院，劳动和学习是完全分开的。

在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原则占有重要地位。他从民主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提高劳动人民的劳动技能和管理能力，是改变其贫困状况的根本途径。裴斯泰洛齐的劳动教育与体育、智育、德育紧密联系，有助于儿童形成良好的品德，并对开发智力有积极作用。他在《林哈德和葛笃德》中说：“对人们的教育，要从严肃认真的专业训练入手，才是脚踏实地的，这比什么书本教材都重要。”他认为这种方法必然能培养新一代。

裴斯泰洛齐在进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验中，教学与劳动相比，以劳动为主，劳动时间较长，教学服从劳动，这就不能保证国民教育的水平。但是，在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许多贫儿根本没有机会接受国民教育，而裴斯泰洛齐以自己的努力为一些儿童创造了学习条件已经够伟大的了。裴氏的劳动教育对象只限于劳动人民子女。他认为，因为他们需要摆脱贫困而需要接受劳动教育，这也是作为资产阶级教育家的一种阶级局限性。

裴斯泰洛齐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教育事业。他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创立的教学法和教育改革实验在19世纪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为世界所瞩目。当时的

瑞士及德国、法国、英国、俄国、西班牙等国纷纷以裴斯泰洛齐的学校与著作为蓝本，设立“裴斯泰洛齐式”的学校，效仿他的教学法，在德国甚至有“普鲁士裴斯泰洛齐学校制度”之称。这一切构成了19世纪“欧洲的裴斯泰洛齐运动”。法国教育大臣、教育家朱利安（1775—1848年）曾选派24名青年到伊佛东跟随裴斯泰洛齐学习1年。1808年，普鲁士政府拨款给17名青年跟随裴氏学习3年。他们回国后创立了模范师范学校，成为普鲁士学校改革的中坚力量。裴斯泰洛齐的教育理论在19世纪初还间接传入美国，对美国教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六、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教育思想

由于法国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以及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在 19 世纪初叶出现了法国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把批判的矛头明确而尖锐地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并提出了未来社会制度的设想。但是，他们不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找不到实现理想社会的正确道路，甚至把实现理想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他们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三位思想家在教育思想方面也提出了许多真理性的见解和天才的预测，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1. 圣西门的教育思想

(1) 生平

克劳德·昂利·圣西门（1760—1825 年），出生于巴黎的一个旧式贵族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并富于幻想。他要求仆人每天用这样的话唤醒他：“起来吧，伯爵，伟大的事业在等待你啊！”据说他的家谱可以追溯到查理大帝，圣西门以此为荣，常说“我是查理大帝的后裔”。他在少年时期正值启蒙思潮兴起，并受教于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的著名代表达兰贝尔，受到了先进思想的影响，从而奠定了改造社会的思想基础。

圣西门在 17 岁时与家庭决裂，并按当时法国贵族的传统到军中服役，任骑兵少尉。1799 年他随法国军队参加了北美独立战争，作战勇敢，连续晋级，但最后被俘。北美独立战争一结束，他就向墨西哥总统提出了开凿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运河的计划。1783 年他回到法国，被提升为上校，次年辞去军职到欧洲各国旅行。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立即返回故乡，热情投身革命，放弃了贵族称号和伯爵头衔。雅各宾派专政时期他坐过牢，以后将革命置之度外，专心追求文化科学知识。当他年近 40 岁之际，还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甚至变卖家当去高等院校听课。他逐渐花掉了全部家产，时常为疾病困扰，妻子也离他而去。

1802 年圣西门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表明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已初具雏型。他提出了一个改造社会、创造人类幸福的计划。围绕改造社会这一主题，他还写了《人类科学概论》、《关于社会组织的理论》、《论实业制度》、《实业家问答》、《新基督教》等著作，表达了他迫切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建立美好新社会的信念。1825 年 4 月《新基督教》的发表，标志着圣西门创建的空想社会主义大厦已经完成，这是他最后的和最成熟的一部著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这部著作才直接表明圣西门是作为工人阶级代言人出现的，才宣告他的努力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圣西门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认为它是从旧制度到新制度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并认为它不是合乎“理性”的社会制度，而是“黑白颠倒的世界的写照”。他看到了法国社会的阶级对立，认为应该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新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圣西门首先明

确提出了国家消亡的思想。他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方案，当然是空想的。他曾写信给拿破仑，劝其放弃称霸欧洲的计划，和自己一道来建设一个以道德、科学、工业为基础的，发展人类之爱的美好社会。拿破仑收信后断言写信的人一定是个疯子。欧洲也曾一时都认为圣西门是个疯子，一个政治疯子。

圣西门曾一度意志消沉，1823年3月曾举枪自杀，虽未毙命却造成右眼失明。此后他又振作起来继续著书立说。1825年5月19日，圣西门在艰难踟蹰中与世长辞，终年65岁。

(2) 主要教育思想

在圣西门改造社会的计划中，包含了丰富的教育思想。他提出了国民教育计划和教育原则，对青少年教育和成人教育都有具体的论述。

圣西门所设计的未来社会是以大工业为基础的。在那里仍然保留企业主、工业家的私有制度，但是一切生产活动都必须服从国家总的经济计划，受国家监督。在这个社会里，“一切人都要劳动”，按能力定报酬，按效率定能力。社会的领导权掌握在学者和实业家手中。国家的主要目的不是对人的统治，而是组织社会生产，谋求社会所有成员的幸福。这种幸福表现为物质生活的“吃得最好，穿得最美，住得最好，能够随意旅行，到处可以得到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上的美好东西”；在精神生活方面，则是“智力得到广泛发展”，“能够欣赏艺术、知道支配自然现象的规律和掌握改造自然的方法”，以及人们之间能够友善相待等。圣西门认为，实现这样的“伟大目标”，教育起着巨大作用。他提出要“由最有才能的学者管理国民教育工作”，要“拟出一项使既得的实证知识能尽快在一切社会阶级和各等级的人士当中传播的国民教育计划”圣西门的国民教育计划包括青少年教育和成人教育两部分。

关于青少年教育，圣西门认为首先要依据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特征制定一个学制计划。他认为，人从出生到成年要经历换牙转变期、情欲旺盛期和成熟期3个身心发展阶段，教育必须与不同的转变期相适应。

在换牙转变期，要注重教养，即“培养习惯，陶冶情感，锻炼一般的预见能力”。他认为儿童在14岁左右达到情欲旺盛期，已有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强烈要求摆脱对父母的依赖，按照自己的选择建立与外界的联系。对这一时期的少年儿童要注重知识教育，特别强调“实证知识”的学习。“实证知识”是指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抽象出来的一般观念或一般规律，即被事实证实了的理论知识，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等。这些自然科学知识对改造自然、发展生产有重大意义。圣西门认为，人到21岁已达到成熟期，身心发展已完全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的个性。这一时期的青年应在高等学校学习，培养独立自主的精神，充分发展智慧和能力。

圣西门主张青少年要全面发展，既要有高尚的情操、善良的品德，又要掌握广博而实用的知识。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圣西门强调理论联系

实际。

关于成人教育，圣西门认为，实业体系下的所有成员都必须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提出了成人教育的三项职责，称之为“三大教职”，即一般教职、道德学教职和实证科学教职。

一般教职，是教导各行各业的实业家学习他们应当特有的政治和实业行为。所谓实业家，包括农民、各种工匠、工厂主、商人、车夫和海员等。这种教职还教导人们了解：应该把管理公有财产的大权交给最卓越的实业家。道德学教职是教导人们如何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认为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努力会感到无上快乐；为寻找个人幸福而伤害社会会感到沉重的精神痛苦。实证科学教职是教给人们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同时也教导人们如何把个人利益同公共利益相结合，把个人利益同他人利益相结合。

圣西门认为，通过以上三方面的教育，人们的实业道德和科技都会得到发展，就能培养出具有真才实学的掌握精神权力的学者和领导世俗权力的实业家。在他们的领导下，整个社会就能走上幸福的道路。

(3) 几项教育原则

圣西门提出了劳动是道德的准则的论断。他认为应该用劳动的准则取代《福音书》上的准则。他提出，劳动是一切美德的源泉，人人应当劳动。从事劳动的人是幸福的人。假如没有游手好闲的人，人类一定能享受到他们所追求的一切幸福。他认为，人的主要工作和义务就是劳动；在新的社会秩序下，每个人只能按照他通过劳动对社会做出的贡献而得到荣誉和尊敬。他要求道德家们鼓励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们去激发社会成员在实证的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争取普遍的幸福；促使学者致力于国民教育工作，每个人获得了知识要尽量为人类造福；使实业家相信与学者和艺术家合作为人类造福时，对自己也有益。

圣西门还提出了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思想。他对知识和人才非常重视并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能力、意志和知识是完成任何一项事业必备的三个条件。他说学者是有预见的人。学者是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他们不畏任何困难和干扰，为了达到促进人类理性进步的目的，可以摒弃陈规，开创新路，勇往直前。他说：“有教养的英国人对学者的敬重胜过对国王的敬重。”他称赞说，在科学园地耕耘的人，是道德最高尚的人，而且也是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们的工作对全人类都有益处。

圣西门认为，社会的普遍利益，无论是物质方面的，还是精神方面的，都应当由能力最有用、最全面和最实际的人士来主持。他主张选举最优秀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实业家来管理国家大事。他提出，“人们的社会地位，将依靠他们的道德、科学或实业方面的优异才能”来决定。

圣西门提出了通过教育提高民族素质的原则。他指出：“提高法兰西民族的优越性的最好的手段，就是在无产阶级中间进行普遍适当的教育，而利用相互学习的方法，可以十分容易地办到这一点。”他认为，一切阶级成员的教育都分成两部分，即教养和教育。教养指培养习惯，

《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1页。

同上书，第287页。

陶冶情感，锻炼一般的预见能力。教育则指社会成员之间为维持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不断获得必要知识的过程。他认为，气质、教育和环境支配着人们一生的行为，改进教养比改进教育更为重要。他特别指出，对无产阶级来说，教养比教育更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

对于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圣西门也提出了中肯的见解。他认为，小学教师的身教活动对儿童的影响最大；到了高一级学校之后，身教影响减弱，而言教活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甚至提出了教师应由学生来担任的思想。

2. 傅立叶的教育思想

(1) 生平

沙利·傅立叶（1772—1837年），出身于法国贝桑松的一个商人家庭，其父曾任当地商业法庭庭长。傅立叶只在家乡接受过中等教育。他学习成绩优秀，兴趣广泛，对数学、文学、音乐和诗歌非常爱好，特别喜欢数学的精确性和艺术的表现力。他因父亲亡故，很早就中断了学业，没有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其大部分知识靠自学获得。他当过店员、推销员和交易所经纪人。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傅立叶的家产被征用，在雅各宾派的平叛中他又被捕入狱。这些经历使他由不关心革命到敌视革命。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每个人对全体和全体对每个人的战争”的制度。他对“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虚伪性有深刻认识。他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中，推论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危机不可避免性。人民大众的疾苦、现实社会的腐败和残酷的阶级斗争，促使傅立叶去寻求改革社会的道路，他要以“法郎吉”为单位组成和谐社会。“法郎吉”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在这里，人们共同劳动和享乐。傅立叶认为变革现存社会制度和实现和谐制度决不能通过暴力革命的道路，只能实行和平改造现存社会的办法。

在傅立叶的思想中包含有关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消灭城乡对立思想的萌芽。他还首次提出了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尺度的思想。关于他的思想体系的产生和形成，他自认为和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也是受了一只苹果的启发。有一次他在巴黎一家餐馆吃饭，结帐时他大吃一惊：巴黎一只苹果的价钱竟高出外省百余倍。由此，他开始怀疑资本主义制度，并进而探索和研究改革这个社会的方案。他幻想通过有钱人的资助实现他的社会改革。他给拿破仑及大银行家写信，登广告，每天中午在家恭候支持者的光临。可是，思想家望眼欲穿，却无一人上门。

傅立叶的主要著作有：《全世界和谐》（1803年）、《四种运动论》（1808年）、《宇宙统一论》（1822年）、《新世界》（1829年）和《论商业》（1845年）等。

(2) 主要教育思想

傅立叶所设计的新社会制度和提出的教育思想都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他把人的情欲分为感觉情欲（视、听、触、味、嗅）、依恋情欲（友

谊、爱情、虚荣心和爱家庭)及分配情欲(竞争、多样化和创造)等。他认为人的各种情欲生来都是健康的,只是由于社会制度不合理,许多情欲无法满足,从而产生罪恶。只有一小批富有者享有丰富的物质生活,感觉情欲得以满足,而广大穷苦人连满足情欲的起码条件都没有。这就造成了情欲的畸型发展。这是最大的不和谐。他理想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和谐制度”。他的教育宗旨也是要实现这种和谐。

傅立叶提出,“协作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这种全面发展,不仅指青年一代应具有健康的体魄、丰富的实用知识、高尚的道德品质,而且要掌握劳动技能,热爱劳动。

傅立叶特别强调生产劳动的重要意义。他把劳动与美德相提并论,劳动和美德都给人类带来幸福和快乐。他说:“一切把人们向着劳动和美德吸引,因为劳动已经变得诱人,美德已经有利可图。”在他看来,在协作制度下,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自由选择并积极参加多种多样的农工业生产劳动,既能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又能满足人们的“创造欲”和“竞赛欲”等多种情欲需求,使劳动从苦事变成乐事。

傅立叶提出整个教育体系应与生产劳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年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全面发展。他还根据自己所理解的儿童年龄特点,拟定了一个儿童参加生产劳动的教育体系。他强调,在协作制度下,科学和劳动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主张把劳动与学习、劳动与科学、劳动与艺术、劳动与娱乐、劳动与休息结合起来。这实际上正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的思想、劳逸结合的思想。实行这样的结合,人的身心就能得到全面发展。傅立叶甚至认为,一个人在成为学者之前,必须先成为农民和工匠。这是他的和谐制度下的教育步骤。马克思恩格斯对傅立叶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些观点是“精华”,“包含着最天才的观测”。

傅立叶还提出,要采用正确的原则和方法进行教学。他认为,文明制度下的教育教学存在不少失误之处,抑制了儿童本性的发展,协作制度下的教育教学必须采用正确的原则和方法。他提出了实践先于理论的思想。他指出,文明制度的教学“把理论摆在实践前面”,这“完全是本末倒置”、“进程的颠倒”。协作教育则相反,从幼儿开始就诱导他们从事劳动,7岁时就成为做过30种不同劳动的熟练的实践家。他还强调学习的多样化。他指出,文明制度下的儿童只限于做一件事,那就是一年到头,从早到晚就是学习知识。有些孩子还被“禁闭”在寄宿学校中,与外界隔绝。这种“囚禁”儿童和单一的学习方法,使儿童对学习感到极为苦恼和反感。所以,他强调教育教学应该多样化。儿童不仅要学习知识,而且要参加各种活动。他提出,在一年中最好的季节里,应该让儿童到花园、森林或草原中去工作,而在下雨天和空闲时间学习。他认为这样的教学方法有利于儿童的发展。傅立叶还提出因材施教的思想。他认为儿童性格千差万别,各有特点,因此教育教学必须采取不同方法,因材施教。他还认为,应该有许多方法供儿童选择,以便使各种性格的儿童都能养成对学习的爱好。

傅立叶重视幼儿教育。他主张在幼儿期间就要进行适当的教育。为

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从摇篮时期起就大胆地发展儿童的天赋。他甚至提出从6个月起就要象对体力一样培养儿童的智力。在教育教养方面，要注意儿童在生理方面各种感觉器官，如视、听、触、嗅、味、动等感官灵敏度和精确度的训练；还要注意对其情感、意志和爱好等心理素质的培养。他还提出要注意儿童时期的爱好，例如摹拟或爱摹仿的癖性等。他非常强调幼儿园的教养员、保育员和护士要开动脑筋，耐心细致地了解儿童，顺其自然，而又不放纵迁就，使儿童得到健康的发展。

3. 欧文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

(1) 生平

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出生于北威尔士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家境贫穷，只读完乡村初级小学，10岁就开始学徒，自谋生计。他自幼好学，勤于思考，看了许多书。在工作十分劳累、每晚睡眠不足5小时的条件下，他仍刻苦学习，充实自己的哲学、文学和经济学知识。他接受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和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唯物主义思想影响。

1791年，欧文应一外国厂主聘请，到曼彻斯特一家纺纱厂当经理。他很快就显露出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商业才干，取得很大成功，厂主给他以优厚待遇，并让他兼管另一个纺纱厂。从这时起，欧文开始闻名于英国的工商界。1800年，他担任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一家大纺织厂的经理，开始了他的社会改革的试验。他的目的是既要有利于社会，又要给股东们带来利润。欧文采取了一系列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措施：他把工人的日劳动工时由十三四个小时减少到十个半小时，提高工人工资，工厂停工期间工资照发，禁用10岁以下童工；兴建工人住宅，修整街道，建立公共食堂；创办模范小学、幼儿园和托儿所等。开始时，他的改革受到上层社会的讥笑，但确实使股东们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人员复杂、堕落分子成群的新拉纳克成为“模范移民区”。这使各方人士对欧文刮目相看，国内外名流显贵纷纷前来参观访问，一时间，慈善家欧文的名字斐声欧洲。但是欧文也深深感到，他所改善的只是工人阶级受奴役的条件，并没有改变工人受奴役的地位。

欧文一生的活动，以他50岁（1820年）为重要分界线。在此之前，他是慈善改革家，闻名于资本家世界；在此之后，他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无产阶级中享有极高的声誉。恩格斯指出：“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名望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他受到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并被逐出了上流社会。

1824年，欧文带领他的4个儿子和一些门徒去了美国，次年在印第安纳州花费3万英镑巨款购了3万英亩土地。在那里他创办了一个共产主义移民区——“新和谐村”，实验他的改革计划。新村实行生产资料

公有和消灭剥削、消灭压迫的原则，实行民主管理，人人参加劳动，所有的人一律平等。新村包括 19 个农场和几个果园，还办有工场和学校、幼儿园。整个教育制度与新纳拉克几乎一样。新村共有 800 多人。遗憾的是移民们对欧文所进行的实验并不理解，不久他们就开始瓜分公共财产，互相仇视，只想个人发财。由于内外资本主义势力的夹击，到 1828 年，这个共产主义孤岛就完全淹没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了。新村瓦解，占欧文全部财产 4/5 的 4 万英镑货币荡然无存。

1829 年，欧文回到英国，仍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并继续进行建立合作工厂和组织劳动公平交换市场的试验，均遭失败。19 世纪 30 年代以后，他逐渐脱离了工人运动，对后来发生的英国宪章运动，他态度冷漠，甚至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尽管如此，他仍不愧为杰出的空想共产主义实践家。他的主要著作有：《新社会观》（1813—1814 年）、《新道德世界书》（1842—1844 年）、《人类意识和实践的革命》（1849 年）等。

(2) 主要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

欧文与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自己的教育观点付诸实践。他以巨大的精力和极大的热情办教育。

他提出了“环境决定人的性格”的思想并创办了“新性格形成所”。欧文认为，人的个性是由天性、环境和教育决定的。他尤其强调后二者的作用。他说，“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决定人的性格”；“儿童经过教育可以养成任何习惯和情感。这些习惯和情感同每人身心两方面的天性倾向和能力，以及他所处的一般环境结合起来就形成一个人的全部性格”总的看来，人的个性是遗传、环境和教育的产物，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认为欧文这一观点带有机械唯物主义的色彩。他指出：“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按照“环境决定人的性格”的思想，欧文在新拉纳克当厂主期间实行了旨在改变人的性格的一系列实验，他创造了各种教育机关，于 1816 年统一命名为“新性格形成所”。其中有幼儿学校，包括托儿所（1—3 岁）和幼儿园（4—6 岁），有为 6—10 岁儿童开办的小学，为 10—17 岁少年工人开办的夜校。养成所还为成人举办讲演、文学消遣和咨询。欧文指出，在这里，人们“从懒惰、肮脏、嗜酒、愚蠢和不道德，变成了非常勤勉、不饮酒、积极、清洁和有道德”。

欧文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工人的性格，必须从幼儿教育开始。1802 年他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儿童学校，包括托儿所和幼儿园。创办学前教育机关是世界教育史上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欧文选集》第 1 卷，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35、143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7 页。

《欧文选集》第 2 卷，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96 页。

欧文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认为“生产财富，教育人们获得真正知识，消灭恶劣的条件并代之以优良的条件，将是一切人在进入理性社会制度时的重大任务”。他要求儿童出生后就开始受优良的体、智、德、行等方面的教育，把他们培养成体、智、德、行全面发展的有理性的人，也就是身体健壮、具有实用知识和仁慈精神、并能利用科学所提供的一切措施参加社会的一种或多种工作及工农业生产劳动的人，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的人。

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欧文强调，人们从出生到成年，都应当用目前所达到的最好的方法对其进行教育和培养。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社会的全体成员按着年龄的大小划分为若干年龄组，让他们受到适合其年龄特征和本性的教育，并从事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活动。

欧文认为儿童的劳动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一般说来，孩子们从童年起就看到了成人的劳动，而在学校里则是获得一些劳动技能。男孩应掌握简单的手工劳动的方法，并从事园艺工作；女孩则是学习裁剪、缝纫和做饭。

马克思非常重视和赞赏欧文关于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思想。他从欧文的教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验里看到了“未来教育的萌芽”。他指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①欧文主张培养知、慈、善、爱、诚的美好道德，并寄希望于教育。他认为，一切教育的全部意义在于个人的利益和幸福应与其他人的利益和幸福密切相联。如果在人们幼小时就采取仁爱、宽大的原则和公平、正义的措施，防止罪恶的出现，并且长期坚持实践，人们就会养成公正、坦率、诚恳和仁慈的品行和习惯。

在欧文创办的共产主义移民区里，依照欧文的原则开办了许多学校。在这些学校中，除了授与学生以科学教材为基础的系统的智力教育外，还要对学生实施具有道德规范精神的道德教育、劳动教育和体育。

欧文重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选择。他批评当时的教学内容不适合儿童的年龄特点，人们不了解儿童的智力和能力的水平和现状。他指出，儿童所受的教育都是根据教者愚蠢的估计来进行的。他说：“目前通行的儿童读物所传授的东西是一些不应当在他们那种年龄教给他们的东西。”^②换言之，必须注意教学内容的筛选，使之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儿童。

关于教学方法，欧文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死记硬背。欧文认为当时用以教育并训练人的方法是死记硬背，理论脱离实际，摧残了儿童的智力。他尖锐地指出：“在许多学校里，老师从来没有教导贫民和劳动阶级的子女去理解读物的内容……在另一些学校里，老师由于愚昧无知，教导儿童一味相信自己所学习的东西而不去追求其中的道理，于是他们也就从来不去正确地思考和推理了。这些确实可悲的教学法必然会使孩子们头脑无法接受平易、朴实和合理的教育。”^③他强调，对每一桩

^①《欧文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0页。

^②《欧文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1页。

^③同上。

事都要在儿童能理解的基础上解释清楚。他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还在于“经验是真知与灼见之母”。他总是教导人们要按照所获得的知识去行事，不能只是空谈。欧文还提出通过开展生动活泼的活动进行教育的方法，例如举行讲演等。

欧文还主张兴办模范学校，选择优秀教师，设置教师培训机关。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应该德高望重，才智过人；老师应学好教学法和教学内容。

欧文一生的创造性活动，始终表现出他是一个空想家。他提出的许多原理都具有天才的推测性质。他的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评价。他所进行的教学与工业基础上的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验被称为“未来教育的萌芽”。欧文第一个论证了和实现了从儿童生活的最初几年起即对他们进行公共教育的思想。他为无产阶级的儿童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学前教育机关。在他的学前教育机关中，注意对儿童进行智育和体育，并且儿童可以受到集体主义精神的教育。欧文还在他的教育机关中废除了宗教。许多国家的先进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例如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和杜勃罗留波夫都对欧文的教育机关给予高度评价。

七、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思想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创立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即马克思主义。他们在创立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过程中，探索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专门的教育论著，但在他们的许多著作和文章中都有关于教育的精辟论断和深刻阐述。由于他们从根本上解决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问题，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观，从理论上解决了一系列长期混乱不堪、是非颠倒的问题，从而引起教育科学领域的重大变革，把教育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近代生产的发展，对教育和人的发展提出了客观要求。近代大工业的本性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给社会教育和人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需要给以科学说明和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19世纪30—40年代，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在教育领域中也展开了斗争，他们努力争取工人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权利。这一斗争迫切需要正确思想的指导。各国工人阶级通过工人运动的组织，组织了一些独立的文化教育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他们还不能正确认识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英国宪章主义者以及社会主义者中的某些人错误地认为工人阶级只要发展教育便可以得到一切。这就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投入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是在批判机会主义教育思想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批判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提出的培养“综合工人”的观点，指出无产阶级需要的是培养新人，即全面发展的人，而不是所谓的“综合工人”。恩格斯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反对青年学习科学知识的谬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清算了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政治观点和教育观点，揭露了他们企图依靠“国家帮助”（指俾斯麦政府）来实现无产阶级教育理想的欺骗性。恩格斯还批判了庸俗政治经济学家杜林杜撰的包罗万象的大杂烩的学校教学计划以及他在美育问题上的虚无主义态度。总之，马克思、恩格斯总是把教育领域的斗争作为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重要方面。他们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反抗剥削阶级教育对劳动者的精神奴役，必须争得工人阶级及其子女的受教育权，必须同种种违反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机会主义教育谬论作斗争。

教育思想史上的优秀成果和合理因素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文化遗产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他们在创立自己的教育学说时吸取了卢梭、爱尔维修、康德、黑格尔、亚当·斯密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教育观点的合理因素。例如，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分工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人自身发展的关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等都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重视。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对儿童实施公共教育、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将全体社会成员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有重要启发，并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来源。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教育理论，内容十分丰富。马克思主义教

育理论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

1. 论教育的社会性和阶级性

马克思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是他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重要理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还指出，我们判断一个变革的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因为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这个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考察教育过程及其性质的理论依据和根本方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考察教育，他们认为，教育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受社会历史发展条件制约的。当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时，教育则受到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支配，教育是具有阶级性的。他们还指出，这是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在阶级社会中，教育必然是阶级的教育，教育的方向、教育的目的、教育制度以及教育内容，都取决于统治阶级，并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统治阶级从来都把教育作为巩固政权的一种手段。

关于教育的阶级性，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教育的资产阶级性质。他以大量的实际材料揭露了资产阶级给予工人子女的教育是十分恶劣的。恩格斯指出：“英国的教育设施和人口数目比起来，少得很不相称。工人阶级可以进的不多的几个日校，只有少数人才能进去，而且这些学校都是很坏的，教师都是已经失去了工作能力的工人或者是做什么工作都不适合的人，他们只是为了生活才来当教师，大多数连自己也没有具备最必要的基本知识，缺乏教师所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英国资产阶级之所以不重视工人教育，是因为工人受教育对资产阶级没有多少好处，而可怕的地方却很多。最根本的是他们害怕工人的觉醒，起来反抗他们的剥削和统治。而教会学校，则充满了宗教精神。宗教更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一种精神武器。“宗教，而且恰好是宗教最无聊的一面（即对异教教义的驳斥）成了最主要的课程，孩子们的脑子里塞满了不能理解的教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页。

《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

条和各种神学上的奥妙东西，从童年时期起就培养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偏执，而一切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发展却被可耻地忽视了”。

资产阶级害怕工人受教育，造成了工人及其子女智力荒废，使他们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所以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应该为争取受教育权而斗争，并且阐明了把工人的工作日限制为 8 小时的重大意义。马克思说，限制工作时间不仅对于恢复构成每个民族骨干的工人阶级的健康和体力是必需的，而且对于保证工人有机会来发展智力、进行社交活动以及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也是必需的。恩格斯指出：“英国工人在他们所处的那种状况下是不会感到幸福的；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个人或整个阶级都不可能象人一样地生活、感觉和思想。显然工人应该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应该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分的状况。”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了资产阶级教育的本质之后，还明确提出了消灭教育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问题。他们指出，资产阶级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因此，共产党人要改变教育作用的性质，使教育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消灭教育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唯一办法，就是无产阶级必须取得政治统治，然后利用手中的政权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重要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对教育的社会作用有深刻的论述。他们认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教育具有传递和再生产科学的社会功能；教育能造就一代深刻了解阶级的未来和人类的未来的工人阶级。

马克思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而教育通过对人的指导和训练，就可以使他掌握一定的知识和生产技能。教育能为社会各类生产部门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马克思还指出：“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很显然，人的劳动能力水平是与他受的教育程度分不开的。

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使人类积累了丰富的科学知识。教育就是科学知识再生产的一种有效形式，同时教育又能把科学知识传授给青年一代。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革命胜利后，要通过教育来培养各种专家，以便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他指出：“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们的政治活动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才，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

2. 论教育在人的个性形成中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7、48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90、195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的素质、环境、教育三种因素相互之间的关系阐明了教育在人的个性形成中的作用。人的遗传素质只是人的能力与才能的发展的物质前提。人的才能、个性的不同，是由于各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分工、不同的劳动形式和教育条件造成的。马克思主义指出，每一个人，生来就处于以前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和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之中，他还处于一个国家和民族长久形成起来的文化传统之中。也就是说，个人生来就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对一个人之成其为现存的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正如前所述，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批判了施蒂纳的“遗传决定论”。施蒂纳宣扬，一部分人成为音乐家，另一部分人成为诗人，再一部分人是教书匠，这完全是由不受人控制的“类”即遗传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以这种观点解释人类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是为剥削阶级压迫劳动人民服务的，目的是为了掩盖资产阶级剥削的实质。马克思认为，人的遗传素质是有区别的，但差别很小。他说：“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他很赞赏亚当·斯密，说亚当·斯密已经清楚地看到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设想的那么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

这样就提出了环境、教育和人的关系问题。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爱尔维修提出了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把人看作纯然爱动的客体。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完全承袭了这一理论，认为人的不良性格是不好的社会环境和不良的教育的结果，只要改变了不合理的环境和教育，就可以改变人的性格。马克思首先高度评价了这一理论的积极意义。因为这一理论否定了“天赋观念”以及宗教强加给人们的“原罪”说，这就在精神方面给人以极大的解放。但是，这一理论把人看作完全消极被动的客体，没有意识到社会实践的作用。这种学说人为地把社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些高出于社会之上的“天才人物”，由他们来施行教育，而另一部分人则是被动地受教育。

马克思主义认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人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造自身。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马克思强调：“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里，他揭示了人受环境的影响与人改造客观环境的辩证关系。他进一步指出：“只有改变了环境，人们才不会是‘旧人’，因此他们一有机会就坚决去改变这种环境。在革命活动中，在改变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

马克思主义承认环境和教育在人的个性形成中的巨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和其他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拉斐尔（1483—1520年，意大利著名画家）也受到他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艺术成就、社会组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

当地的分工以及与当地有交往的世界各国的分工等条件的制约。”显然，拉斐尔的才能的发展与他所接受的良好教育以及当时科学与艺术的成就是分不开的。

“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别。一般认为“环境和教育”中的教育是广义的，狭义的教育则指学校教育或正式教育。学校教育或正式教育的作用在于系统地提供机会和条件，促成儿童和青少年正常地适时地发展和成才。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学校教育成为培养和教育人并提高整个民族素质的手段。学校教育或正式教育的作用是其他社会机构所不能替代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从自然所得到的不是现成的才能或某些智慧、意志和性格的特性，而仅仅是一种素质，这种素质提供了发展这些能力的前提。依靠社会条件和教育，“在谋求自身解放的个人身上至今只作为天资而存在的那种能力，现在被肯定为真正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良好的条件可以促进各种禀赋的发展。他们也预见到社会主义社会环境对人的良好影响，认为在新社会里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教育体系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形成人的新的性格的决定因素。

3. 论人的本质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以往人们谈论人性时，总是把人孤立于历史进程之外，抽象地直观地看待人性。甚至象费尔巴哈这样的唯物主义者也不能跳出这个框框。他把性爱、友谊、舍己为人等加以神化，并看作是人类的共性，即人性。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的唯物主义思想，同时否定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共同性”的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否认人具有区别于动物的人的共同性，但他们强调这种共同性不是人的“类”所决定的，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人的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在于劳动和人的自觉性，而不是费尔巴哈所说的以爱为中心的知识、情感、意志的三位一体。

恩格斯详尽而令人信服地论证过劳动在人的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人类的本质首先表现为人的劳动。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

随着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认识的深化，人的活动就成为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类的特性”，即人能依据自己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去改造客观世界，并且能认识和改造自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4、45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7、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3页。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在阶级社会中，人性就主要表现为阶级性，即人的阶级性是人的社会性的具体表现。马克思谈人的本质时主要是谈人的思想的社会本质，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社会历史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阶级社会必然会走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恩格斯在论道德时指出，超阶级的道德“只有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阶级的对立和超越这种对立的回忆、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换言之，在阶级社会中，道德也只能是阶级的道德。母爱、性爱，在阶级社会中也无不受一定阶级的思想影响和支配。在阶级社会中，离开人的社会经济基础，离开人的社会实践的抽象的人性是没有的。在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还存在着两性差别、血缘差别、民族差别、肤色差别、宗教差别以及文化传统差别等等。但是最本质的还是阶级差别。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学说是科学的。它使我们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摆脱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束缚，从此进入了科学的境界。

4. 论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人的全面发展，实质上是指智力和体力的充分和自由的发展，也包括人的才能和志趣、高尚的品德和审美能力的充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全面发展学说，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机器作用造成的分工使人极度片面发展而提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异化了的。大工业使工人降为机器的附属品。马克思指出：“在劳动过程中，……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就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这就是自我异化。”可见，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未能成其为应有的样子，人的生存和教育是与他真正的人性不相符的。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使人回复到他应有的地位。

从历史上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由于剥削制度的存在，奴隶和农奴没有受到教育的机会，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只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其体力和智力的发展都是片面的、畸型的。而剥削者、统治者，由于完全脱离体力劳动，作为个人的发展也只能是片面的。到了资本主义初期，人的片面发展更为加剧。“工场手工业把一种手工艺分成各种精细的工序，把每种工序分给个别工人，作为终生的职业，从而使他一生束缚于一定的操作和一定的工具之上”，造成工人的发展畸型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不仅劳动者不能得到全面发展，剥削者也不能在智力和体力上得到和谐的发展。恩格斯指出：“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4—9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1页。

观念所奴役，……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近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受专门教育和终身束缚于这一专门技能本身而造成的畸型发展所奴役。”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要使自己得到全面发展，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并且“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是第一次出现了，但是它确实是出现了”。可见，人的全面发展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消灭私有制为条件的。

人的发展，只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绝不可能超越社会所提供的条件。每个时代的人能发展到什么程度直接和这个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文化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有关。另外，个人的发展和他人的发展也是互为条件的。没有集体，个人的发展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联系起来考察，认为社会发展到它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给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必要条件。同时，也只有全面发展的人才能适应高级社会本身的需要。因为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必然消灭私有制和私有制下面那种分工的时候，人的全面发展的障碍才会消失。另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又是消灭私有制的条件。因为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他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

5. 论全面发展的教育

为了使青少年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实施全面发展教育的思想。全面发展教育包括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和综合技术教育。

(1) 智育

智育在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对青少年的智力开发和培育。

智力教育对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有巨大作用。马克思认为科学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31、223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4、32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516页。

生产力，科学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的革命力量。他指出，当代“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要求劳动者必须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只有劳动经验是不能适应现代大工业生产需要的。马克思说：“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知识的物化，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前提是必须用科学知识武装青少年和劳动者。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学校教育的任务就是用科学知识来武装青少年。马克思说：“对儿童和少年工人应当按不同的年龄循序渐进地授以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课程。”马克思除了提出青少年要学习物理、数学、地理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外，特别提到青年要学好外语。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恩格斯也非常强调青年要系统地学习和掌握科学知识。他自己就是刻苦学习的榜样。有人评论说，在人类的一切知识领域，都留下了恩格斯探索的足迹。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启迪学生的智慧，培养儿童的思维能力。他们认为组织儿童参加各种实践活动有助于发展儿童的思维能力。恩格斯特别论证了生产实践活动对发展人的智力的作用。他指出：“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人必须学会改变自然界，劳动者在从事体力劳动的同时，也必须“用脑劳动”，人们正是在“用脑劳动”的过程中使自己的智力得到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鼓励青年一代要顽强刻苦地学习。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马克思是一位科学巨匠，他是在科学大道上永攀高峰而不畏劳苦的人。他为了撰写《资本论》查阅了上千种书籍资料，花20年心血，终于完成了这本巨著。

马克思还指出，人的智力发展受到社会制度的制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农及其子女智力不能得到发展。“童工制”剥夺了劳动人民子女受教育的机会，使他们“智力衰退”。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科学技术的运用，“只是通过使工人从属于资本，只是通过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专业的发展来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器”，所以他们的智力是不能得到发展的。

(2) 德育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的所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2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页。

《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页。

关系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恩格斯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在现代社会里，“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

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观念是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教育时指出，“资产者认为道德教育就是灌输资产阶级的原则”。这些原则主要的就是教人顺从统治阶级的政治和宗教。恩格斯指出历史上出现过三种道德，即封建主义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和无产阶级道德。无产阶级的道德是“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这种道德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优良品德。他们具有为人类的进步而真诚地献出自己力量的精神；他们能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头，推动历史前进。恩格斯归纳了无产阶级所具备的品质是：“自尊心非常强，决不肯对他们阿谀逢迎；眼光非常远大，决不被这些‘民主派’先生们所利用，然而每次发生推翻现政权的运动的时候工人阶级总是拿起武器向着前方，在任何革命运动中这些品质都直接体现着无产阶级的党。”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要培养青年具有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和世界观，坚持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发出的庄严号召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们认为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是不相容的，“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德育的论述，不能不受到当时时代的限制。那时的工人阶级不但处于资本主义压迫之下，而且工人阶级本身还处于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阶段。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向工人阶级进行道德教育的论述主要还偏重在社会实践方面。但是，他们也已经提出了关于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思想和原则。

道德和道德教育问题，是一个古老的、与人类社会共始终的问题。但是对道德的起源和本质、道德的作用和社会职能、教育的原则和方法等问题，人们长期争论不休。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很容易理解下列问题：一定社会的道德是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为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所决定；道德是有历史性和阶级性的；道德同其他社会形态一样，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继承性。

由于阶级斗争的激烈，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往往比较注意道德的阶级性，存在着忽视甚至否定道德继承性的倾向。道德的阶级性和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4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18页。

德的继承性是研究道德理论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坚持道德的继承性，不仅不排斥而且会渗透着道德的阶级性和历史性，给道德的继承性以科学的基础。

(3) 体育

马克思把体育理解为“体育学校和军事训练所传授的那种东西”。恩格斯说：“我提出对男性青年一代实施体育和军事的训练作为向新制度过渡的重要条件。”他认为，无论从掌握军事技术还是发展社会经济来看，都必须对青年进行军事训练。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要“在各年级学生的四肢还很富于弹性和十分灵活的时候，经常而认真地教给他们自由体操和器械操”。这对青年身体的正常发育很有好处。马克思主张青年学生的生活、学习、劳动、休息应该互相调剂，“漫长的学习日”只是白白地增加教师的劳动，浪费儿童的时间，无益于儿童的健康。

(4) 美育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劳动创造了美”。人类的劳动的确创造了各种美好的事物。他们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美是有阶级性的。人们都是从自己所处的阶级立场出发来观察美和评价美的。马克思指出：“由于资产阶级生产必须把财富在一种唯一的物的形式上作为物神结晶起来，金银就成了这种财富的相应的化身。”在珠宝商的眼里，珠宝只是他的商业的价值，而看不到它的美和特质。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人们由于立场的不同，对美的感受是不同的。

马克思还认为文艺作品和音乐具有审美的价值与教育作用。他说，人类“依照美的规律来造形”。作家把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种种美的事物加以概括，塑造出优美生动的艺术形象；同时，“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文艺作品中塑造的优秀人物形象和动人的艺术画面是具有感染力的，这就是美的教育作用。

音乐是一种美，它能陶冶性情；反映人民革命斗争的音乐，催人奋进。马克思充分肯定音乐教育的重大意义，并且认为音乐是有阶级性的。

《国际歌》使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号召无产阶级奋起斗争，鼓舞革命者前仆后继。列宁说，凭着《国际歌》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同志。

(5) 综合技术教育

马克思非常重视综合技术教育，认为它是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教育要使儿童和少年了解生产各个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的最简单的工具的技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3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3页。

同上书，第13卷，第145页。

同上书，第12卷，第742页。

能。”

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必要性在于：现代大工业生产经常发生劳动的变换，劳动力经常发生转移，人们要适应新的生产部门，必须具备综合性技术，即教育必须与社会职业结构、与生产结构相适应。马克思在谈到现代工业生产的变革与教育的关系时指出：“工艺学校和农业学校是这种变革过程在大工业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个要素；职业学校是另一个要素，在这种学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有关工艺和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的教育。如果说，工厂法从资本家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么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

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学说，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基础上的。这一学说强调生产劳动同智育、体育相结合，“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也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没有把德育和美育放在与智育、体育及综合技术教育并重的地位，没有给予系统的阐述，是有其客观原因的。因为在当时工人阶级没有掌握政权的历史条件下，考虑到“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不可能处于支配地位。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的是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而不是实施德育，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不应要求资产阶级向自己的子女灌输资产阶级道德原则，在资产阶级学校里实施无产阶级的道德教育也是不现实的。

马克思恩格斯对美育也涉及很少，原因也在于无产阶级没有掌握政权和生产资料，基本的生活条件都没有保证，也就无法谈到美育。但是，他们已经注意到美育的范畴。

6. 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应当采取的社会措施之一就是“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恩格斯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保证多方面的技术训练和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又说：“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由国家机关公费教育。把教育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看作近代大工业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以英国为重点，考察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形成前后分工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论证了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以前，独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劳动过程是和教育分离的。18世纪工业革命后，机器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科技在生产上得到广泛的应用，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8页。

同上书，第23卷，第53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68页。

展，大机器工业要求人的全面发展，同时也提供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前提。机器大工业生产成为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历史条件。

随着科学技术的新发明，生产过程不断重新组合。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业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而生产的主体又由人变成了机器，生产的发展不再靠人的手工技艺，而是科学的进步和机器体系的不断革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要求一种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了解机器生产的一般科学原理，掌握大工业生产的基本技能，能够适应劳动的变换和职业的更动。这样就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客观需要。但是马克思又认为，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科学知识变成奴役工人的力量。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同社会化大生产矛盾的反映，它又破坏了机器大生产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供的客观基础。只有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全社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才能得到彻底实现。

1847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和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都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纲领性要求提出来，足见这一思想在他们的理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这一要求的提出又与当时使用童工直接有关。童工问题是当时工人运动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

19世纪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使用童工已非常普遍。尽管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各国公布了一些童工法，但“法律所规定的”儿童和少年的工作日仍然太长，一般在8小时至12小时，工厂法规定的教育要求也只是能初步读写，没有提出进一步受教育的要求。

马克思辩证地看待童工问题，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童工带有令人极其厌恶的形式，但原则上年幼一代参加社会生产是合乎规律的、合适的。他说：“现代工业吸引男女孩童来参加伟大的社会生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和合乎规律的趋势，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畸形的。”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童工必须注意两点：第一是限制工作日，第二是新生一代的劳动必须与教育结合起来。这两个目标的实现不可能靠资本家的恩赐，只能依靠工人阶级的斗争。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可能是“一种最必要的抗毒素”，以抵制把工人降低为积累资本的简单工具，抑制那些为贫困所迫的父母变成出卖亲生儿女的奴隶主的那种社会制度的各种趋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会有一定的经济效益。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手段。马克思说：“体力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消毒剂。”

马克思还认为，使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互相调剂，学习的效果会更好。一个从清晨就坐在学校里的儿童，特别是在暑天，不可能同一个从劳动中来的活泼愉快的儿童相比。马克思认为：“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6页。

同上书，第31卷，第538页。

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有了人类，就有了教育。教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的发展问题，它涉及到个人发展与遗传、教育内部与外部环境以及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也是各个时代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以及经济学家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直到 18 世纪，在教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为基础，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广泛领域进行了根本性研究，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达到了以往教育理论所不可企及的高度。

八、中国教育

1. 1840—1862 年间满清王朝的教育

1840 年的中英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者用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加强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在教育上，满清王朝在这个时期依然沿袭封建专制的教育制度，日趋反动和腐朽。与此同时，社会上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觉醒，睁眼向外看世界，主张向西方学习，改革之风渐起。他们对腐朽空疏的封建教育制度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要求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主张学以致用，提倡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1) 腐朽空疏的封建专制主义教育

清代的教育基本上沿袭了明代的教育制度。国子监是设于中央的官学，它既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又是管理全国教育的机关。同时，还设有等级森严的旗学、宗学和觉罗学。旗学是八旗子弟学校的总称；宗学是皇族子弟的学校；觉罗学是专为皇家爱新觉罗氏子孙设立的学校。在地方上，官学设有府、州、县的儒家学校，还设有社学和很多官立书院，民间还有许多义学和私塾。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清朝统治者仍然顽固地推行老一套的封建专制教育制度。在地方学校中，比较有实际作用的是社学和义学。社学是元明清三代的一种地方学校。元代曾劝农立社，以 50 家为社，立学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教师，农闲时使子弟入学；明代于 1375 年创设社学，1504 年再次加以强调，招收 15 岁以下幼童进行教育；清初即令各府、州、县设置社学，每乡一所，直到鸦片战争后依然坚持。义学是中国古时候一种免费的私塾，经费主要来源于地租，多招收穷苦子弟读书。在私学当中，从组织形式上看，有富贵人家选择教师在自己家中设立的“私馆”，有贫寒人家联合举办的“村塾”，也有由教师自己开办的“门馆”；从知识程度上看，大致可以分为启蒙性的“私塾”和专经性的“经馆”两类。但不论哪种学校，都同科举制度相辅而行，都是为了科举成功，求得功名利禄。

科举制度自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 607 年）开始至中英鸦片战争，已历时 1200 多年，自明代以八股取士算起也已 500 多年。清末的科举考试，内容空疏，形式僵化；以“四书”为考试范围，以程朱理学为录取标准，以八股文和小楷为制义格式；只能代圣贤立言，不准有自己的创造精神。因此，科举考试是学校教学的指挥棒，学生死记硬背朱熹的《四书集注》，主要训练写八股文和练习小楷，以致许多考官与学士不识汉唐为何朝、不知贞观为何号、不识中国舆地、不知外国名形、更不知现代科学文化。

清末官学和书院大多名不副实，流于形式。清顺治年间（1644—1661 年），国子监实行“会讲、覆讲、上书、覆背，月三回，周而复始”，对生徒管理严格。但到鸦片战争以后，国子监日趋腐朽，监舍失修，生徒无法住监，只好取消“坐监”制度，允准在寓所修业，遇有释奠、月课、季考方可回监。另外，“考课”流于形式，监生可以用钱捐买。至于府、州、县的儒学和官办书院，“考课”人员只不过是点点名和接受馈赠而已，严复曾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中尖锐地指出：“师无所为教，弟无所为学，而国家乃徒存学校之名，不复能望学校之效。”这是对清末学校徒具虚名的很好写照。

科举制度日趋腐败，自上至下舞弊现象比比皆是。首先为了防止考生背书和猜出考题，考官总是挖空心思编出很多偏题怪题。咸丰年间（1851—1862 年），河南学政俞樾曾因出题谬误被革职。其次，舞弊手法多种多样，严复曾在《救亡决论》中指出，当时舞弊的手法有“关节、顶替、倩枪、联号”等等。所谓“关节”，就是通关节，指考生暗通考官，互相勾结作弊；所谓“顶替”，就是请人冒名代考；所谓“倩枪”，就是请同考的人代做答卷；所谓“联号”，就是考前买通编号者，请他把自己的考号与枪手编联在一起，以便抄袭作弊。再次，更有甚者，经不必念，文不必作，字不必写，采取各种手段，或者干脆出钱买个监生、贡生、甚至举人。清人徐大椿曾写了一篇讽刺时弊的短文《隋园诗话》，对八股取士作了形象深刻的揭露。他说：“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二句破题，便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头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于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在教育内容上也日趋落后和空疏。鸦片战争后，清代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仍然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老调，政府的教育方针政策仍然依据顺治九年（1652 年）的《卧碑文》和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的《圣谕》以及雍正二年（1724 年）的《圣谕广训》，要求“生员不许结党多人和立盟结社”，要求生员遵守“敦孝弟以重人伦”、“黜异端以崇正学”。为了培养“忠臣清官”，依然推行科举考试，学校仍然教习老一套的儒家经典，诸如“四书”、“五经”、“四子书”、“理性大全”等，内容日益空疏，严重脱离现实和实际。学生入学读书，不过是为了求得一个进身作官的资格，毫无学习求知的渴望，有些人常常手捧茶杯、口吟

烟袋、东游西荡、书声无闻。遍布各地的私塾倒是清代学子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地方，但教育内容亦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士子苦读多年，同样也无真才实学。

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清朝政府极端顽固守旧，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政策，实行思想钳制，大兴文字狱，不允许有任何新思想、新言论。这样，极大地限制了师生的思想和学术发展，剥夺了师生思想、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师生只能埋头于儒家经典，推崇义理学、考据学、辞章学、熟练八股，埋头应考，不问国事。

总之，这个时期的文化教育是一方面日益专制和腐朽，一方面又经受着外来文化教育的激烈冲击。在这种形势下，一些知识分子被唤醒，不断增强改革意识，一场巨大的教育变革正在孕育之中。

(2) 龚自珍、魏源等人改革教育的主张

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已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出现了改革派和顽固派的斗争。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认为“变而从夷”；改革派是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则主张改革，认为只有改革才有出路。这一时期的改革派代表人物有龚自珍、林则徐、魏源、黄爵滋、姚莹、包世臣、张穆等。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于1830年就结成“宣南诗社”，坚决反对外国侵略势力，主张禁烟和抵抗，支持改革。在文化教育上，以龚自珍、魏源最有见地，他们对清末教育的腐朽提出了尖锐批评，主张改革教育，学习西方。

龚自珍的教育主张。龚自珍（1792—1841年），又名巩祚，浙江仁和人（今杭州）人，清朝思想家、文学家。他在科场中多次落第，38岁才中进士，官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闲职10多年。因目睹清朝统治者腐朽，对当权者颇多不满，长期受当权者的排挤。后辞官离京南下，客死于丹阳云阳书院。

抨击科举弊端，主张改革八股取士制度。龚自珍是近代抨击科举弊端最严厉的人。他认为八股取士制度已行之年久，弊端丛生，非改革不可。他曾尖锐地指出：“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四书文录士、五百年矣，士录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穷且极。”他是最早提出改革八股取士制度的教育思想家。他认为清代统治已经衰败不堪，科举制度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他反对“率由旧章”的顽固派，提出“奈之何不思更法”的主张。他认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他曾预言，如不更法，“山中之民”将一啸百吟，“天地为之钟鼓”。革命运动将势不可挡。

反对教育脱离实际，主张经世致用之学。他尖锐批评当时教育脱离实际，教育出来的人都是一些无学无识而又狂妄自大的人。他说：“生不荷耒耨，长不习吏事，故书雅记，十窥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与君处，下不与民处。……终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谓夫！”他

龚自珍：《定庵文集·补编·与人笺》。

龚自珍：《定庵文集·乙丙之际著议之七》。

龚自珍：《定庵文集·尊隐》。

龚自珍：《定庵文集·治学》。

主张抛弃考据虫鱼之学和空谈义理心性之学，提倡研究现实问题。他要求学能经世致用，讲求“东西南北之学”，开创出一代新的学风。在学术观点上，主张联系实际，提倡“通经致用”，建议用政治、经济方面的实际问题考查学生。

主张“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十分慨叹清末世衰无人才。他说：“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书法赓诗而已，外此非所问也。”他们不过“乃缚草为形，实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满于朝市”。让这些人当家主事，一旦暴风雨来临，就会在时代的风浪中“化而为泥沙”。龚自珍还认为，不但没有人才，一旦“才士与才民出”，又会遭到封建专制统治的种种压制，使之失去忧愤之心和思虑之心，形成万马齐暗的局面。因此，他出于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热切地渴望打破那种令人窒息的沉闷局面，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魏源的教育主张。魏源（1794—1857年），湖南邵阳县金潭人，清朝思想家、史学家，道光进士，历任东台知县、高邮知州。他热心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主张严禁鸦片，反对外国侵略，要求改革。1853年因迟误驿报被革职，复官后不久隐退佛门。

主张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改革科举取士制度。魏源认为，要抵御外国侵略势力，改革清朝弊政，就要革除社会上的两大弊病：一是“人心之寐”；二是“人才之虚”。所谓“人心之寐”，是指人象睡觉似的昏聩糊涂；所谓“人才之虚”，就是缺乏有真才实学的人。如何去掉“寐患”？他认为必须“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痍、去营窟”；如何去掉“虚患”？就是要“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他希望培养的人才能够“经世致用”，要有务求实际，务求实学的精神；就是说，培养出来的人要有务实和求实的精神，要有实际的本领和能战斗的能力。他在《圣武记叙》中指出：“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就是说，他认为国家贫弱不在于财用不足，主要在于缺乏人材。他还进一步指出：“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虚令，则国柄强。”他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看到人材的重要性，于是他要求能以国家之力，正人心，进人材，“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道”。

在魏源看来，要想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必须改革科举制度。他之所以主张改革科学取士制度，是因为科举只重“楷法帖括”，培养不出有真才实学、能治理人世的人才来。因为专习楷法八股，即便考中，无真才实学，也不可能担任好治国安民的大任。他把八股取士看成弊政，主张改革，代之以研习朝章，讨论国故的实学。

主张向西方学习，要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在近代教育思想发展史上的贡献，还表现在他提出了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主张。他

龚自珍：《定庵文拾遗·明良论二》。

转引自董宝良著《中国教育史纲》（近代之部）第6页。

《定庵文集补编·与人书一》。

《龚自珍全集·己亥杂诗》。

《魏源集》上册，第208、166—167页。

依据林则徐的《四洲志》稿本，增补而成《海国图志》60卷，后又扩为100卷。这是一部中国最早研究世界历史、地理及其他情况的系统著作。他指出，“欲制夷患，必筹夷情”，要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驳斥顽固派反对向西方学习的主张，认为他们把“长技”诬蔑为“奇技淫巧”很不对，他主张“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他认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为了实现这些主张，他建议在广东虎门开办造船厂、火器局，聘请法美两国技师，传授制造新式武器、驾船和演炮等科学技术。在民用方面，他认为“凡有益于民者”都应制造。他坚信，只要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就会学到外国长技，中国就会“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与西方先进国家并驾齐驱。

重视教化和学习，强调身教和因材施教。魏源非常重视教化，并把教化分为教和化。他说：“教以言相感，化以神相感。有教而无化，无以格顽；有化而无教，无以格愚。”他很重视学习，认为“学之通弊”；传授诗书知识，以便克愚启蒙；但医治顽劣，必须施以礼乐，进行精神感化。在施教方法上，他竭力反对强制，主张“顺序渐进”和“潜移默化”。

他十分强调“身教亲于言教”。他认为，人们即令读遍经书，也可能毫无触动，但有时听到师友一句重要的话，受到一件事例的教育，却能为之奋斗终生。

在教学方法上，他主张按照每个学生的自然素质因材施教。他主张“教法因人、因时，原无定适”，根本之点在于“各得其性所近”。

2. 外国侵略势力在华的文化教育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年），西方科学文化便随着传教士的脚步，悄然渗入中华大地。当时意大利耶稣教士利玛窦（1552—1610年）等人就带着贡物诣京进献，自称“陪臣”、“西儒”，并愿“终身为氓”。他们以传播自然科学和技术求得在华传教的权力，逐渐把西方科学介绍到中国。这时西方文化的渗入还不具侵略的性质。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夺取了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特权的同时，还夺取了在华的文化教育特权。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

(1) 利用不平等条约，夺取在中国办教育的特权

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四》。

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

《魏源集上·默觚下·治篇十三》。

《魏源集上·论语孟子类编序》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630页。

自 19 世纪 40 年代到 70 年代中期，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对中国进行文化教育侵略的初期阶段。在这一阶段，文化教育侵略的特点是侵略者凭借炮舰政策，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夺得在中国进行文化教育侵略的特权。中英 1842 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文化教育侵略的条款，但规定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以及最惠国待遇等，为文化教育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1844 年中美《望厦条约》规定：“合众国民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院、礼拜堂及殡葬之处……。”1844 年中法《黄埔条约》规定：“佛（法）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周急院、学房、坟地各项。”同时又明确规定：“倘有中国人将佛（法）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1846 年 2 月，道光皇帝下诏，解除了 100 多年的“教禁”，不许各地方官吏再禁天主教，如滥用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从此，西方各国的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的侵略活动。1858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均有外籍传教士可以到内地自由传教的条款。中英天津条约第 8 款规定：“耶稣圣教及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学习者，一律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毫不得虐待禁阻。”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在中国取得了传教权，可以在中国购买和抢占土地，建造礼拜堂和教会学校，对中国学生进行奴化教育。从此，中国近代教育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封建专制主义教育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

(2) 教会学校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利用不平等条约，不断开办教会学校，将其作为对华教育侵略的据点。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外国侵略势力就处心积虑地开始在中国沿海地区办学。1807 年，英国基督教会派遣马礼逊到中国，他是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1818 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开设了一所英华学堂，目的是宣传基督教。这是外国传教士为中国开办的最早一所教会学校。1839 年，美国基督教徒布朗先在广州、后被迫迁往澳门开办了一所小学，叫马礼逊学堂；1842 年，该校又由澳门迁至香港。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领土上开办的最早的学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首先在五个通商口岸开办教会学校。1844 年，英国传教士爱尔德赛在宁波创办女塾，这是外国人在华设立最早的女子教会学校。1845 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设立崇信义塾，招收学生 30 人。这是之江大学的前身。1849 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徐汇圣依纳爵公学，后改为徐家汇公学。1850 年，美国圣公传教士裨治文夫人格兰德在上海办裨文女塾；同年，美国传教士麦利和夫人斯佩里在福州创办女塾；美国长老会在上海开设了清心书院，英国圣公会在上海开设了英华书院。1853 年，美国公理会在福州开设格致书院；同年，法国天主教在天津开办了法汉学堂、诚正小学和淑贞女子小学。1864 年，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设蒙养学堂，1876 年改为登州文会馆（后发展为齐鲁大学）。总之，外国传教士在华办学越来越多，教会学校迅速增加。据 1877 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的报告，从 1842 年到 1877 年，基督教在华办的学校有 350 所，学生 5975 人。天主教在华办的学校更多，

仅 1852 年在江南地区耶稣会派就办七、八所学校，学生 1260 人。另据统计：“到 1875 年左右，教会学校总数约增加到 800 所，学生 2 万人。”

传教士早期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校一般以小学为主。从鸦片战争到 1860 年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前的 20 年间，传教士们主要是在中国被迫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和香港开办一些规模小、程度低、附设于教堂的初等学校。后来出现少量中学，约占总数的 7%。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女子学校，基督教办的 350 所学校中，有 121 所是女校，约占 34%。学生多为一些穷苦贫儿，学校免收学费。1875 年前后，教会教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外国人在华开办的企事业日益增多，急需人才，教会学校总数增加到 2000 所左右，学生达 4 万以上。天主教仍以小学为主，基督教中学明显增加，大学也逐渐形成。教会办的高等学校都是在 20 世纪初正式成立和发展起来的，如东吴大学（1901 年设于苏州）、震旦大学（1903 年设于上海）、文华大学（1903 年设于武昌）、夏葛医科大学（1905 年设于广州）、协和医学校（1906 年设于北京，1915 年定名为协和医学院）、沪江大学（1908 年设于上海）、华西协合大学（1910 年设于成都）、金陵大学（1910 年设于南京）、之江大学（1911 年设于杭州）、华南女子大学（1914 年设于福州）、湘雅医学院（1914 年设于长沙）、金陵女子大学（1915 年设于南京）、岭南大学（1916 年设于广州）、协和大学（1916 年设于福州）、齐鲁大学（1917 年设于济南）、燕京大学（1919 年设于北京）、华中大学（1929 年设于武昌）等。

教会教育之初，主要目的是传教，培养中国籍的传教助手，进而扩展教会势力。后来，帝国主义在华办学的目的逐渐明确为：教会举办高等学校是培养帝国主义在华的代理人 and 洋奴，从而实现侵略中国的总目标。1890 年，召开基督教传教士第二次全国性大会，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会上强调指出，真正的基督教学校，其作用并不在于单纯地教授宗教，从而受洗入教，而是使受教育者成为社会上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导师和领袖。他甚至说：“在我们的学校内，我们训练中国未来的教师和传教士……使他们成为中国未来的领袖和指挥者，给未来中国施加最强有力的影响。”教会大学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搜集中国的政治、经济情报。教会大学大部分在外国注册立案。立案后的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可以不经考试直接升入注册国的挂钩大学，或颁发挂钩大学的学位。中国政府无权过问教会学校的行政和教学。但到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行政管理上增加了中国方面的人选，校长由中国人充任，但学校的主要活动仍受外国教会指挥。

教会学校重视教学计划的拟定和实施。教学计划充分反映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在制定教学计划上，他们提出了要“在性质上彻底地基督教化，在气氛上彻底地中国化”的主导思想。教会学校的办学原则是：“道德其一，学识其二”。学校的课程“实以经教为基础”，宗教科目和学校宗教生活是教会学校的灵魂，宗教课是学校的主课。在教学内容上，除宗教课之外，还有外语、“四书”、“五经”和数理化等自然科学。他们认为，用宗教和科学来进行教育，就可以超过中国传统教

育，以适应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按照上述教育目的和教学内容培养的结果，早期教会学校培植了一批为侵略者效劳的洋奴和帮凶，如马礼逊的助手梁发及其儿子梁进德，在签订中美《望厦条约》时就为虎作伥，出卖祖国利益。但是，这种学校在办学形式、教育内容、教学方式、教员等方面，都突出了原有封建传统教育的模式，为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向近现代教育制度的过渡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也培养了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人才。例如马礼逊学校毕业的容闳，是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他回国后却真心实意地愿意为改革中国传统教育而献身，并由于他的建议，开创了我国的留学教育。

(3) 兴办慈幼事业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兴办所谓的“慈善”幼儿教育事业同样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中国进行文化教育侵略的一种手段。外国教会在中国兴办的慈幼事业主要是孤儿院，育婴堂等。1855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上海开设了土山湾孤儿院。1864年确定收容6—10岁的孤儿入院。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最早的孤儿院。对于传教士在华兴办慈幼机关的数量现在尚无确切统计。这些教育机关都是帝国主义分子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实行奴化教育的场所。他们的目的是力图从婴幼儿时期就向中国年轻一代灌输宗教意识，扩大教会的势力。由于教会兴办的孤儿院、育婴堂设备条件差，照料不善，营养不良，使婴幼儿大量死亡。这样，往往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据记载，1862年3月，湖南湘潭、衡阳，江西南昌、进贤等地都发生过反对外国教会虐待孤儿院儿童的斗争，群众纷纷起来焚烧或拆毁天主教堂、教会学校和育婴堂，……斗争不断扩大。

(4) 教会学校的联合组织——中华教育会

到19世纪后期，基督教教会学校已形成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并且各教派所办的学校日益趋于联合。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大会。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会上指出，传教士的工作象军队一样，主要不在于招降个别人，而在于征服整个国家。因此，他呼吁尽快扭转过去的“错误”倾向，并指出联合起来的重要性。在这次会议上，根据狄考文的提议，成立了各教派的联合组织——学校教科书委员会。1890年，在第二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代表大会上，决定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从此，中华教育会从单纯编辑出版教科书，扩展为对整个在华基督教教育进行指导的联合组织。值得指出的是：其进行指导的范围不仅局限于教会学校，而是整个“中华教育”。该会章程第二条规定：“本会的目的是促进中国教育的利益和增强从事教育工作者的兄弟般的合作”；其任务除负责编辑出版学校教科书外，还要对中国进行教育调查、举办各种讲习会、交流和推广基督教教育经验等，以便“领导中国产生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使中国教育符合基督教的利益”。1893年，中华教育会在上海举行第一届年会，大会主席、美国传教士潘慎文要求在中国大力推进基督

福开森 1893 年在中华教育会第一届大会上的报告：《我们协会的工作》。

教育，以“打破中国人的傲慢和除去中国人的惰性”；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强调传教士必须充分利用儒家思想，最后以基督教文化战胜中国文化。1896年，潘慎文在第二届年会上发表的演讲进一步指出：“作为基督教教育家的协会，我们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各种方法掌握中国的教育改革运动，使之能符合纯基督教的利益。”为达此目的，他还提议设置一个“教育改革委员会”，拟定和实施中国教育改革运动的计划。中华教育会及其附设的“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参事会”成立之后，教会学校肆意发展，形成一个与中国教育系统相对立的教会教育体系。1935年该会改名为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办有《教育季刊》、《教师丛刊》，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被取消。

3. 太平天国的教育

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4年）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农民革命。它的兴起，一方面是清朝专制统治和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外国列强对中国政治经济侵略的结果。太平天国运动是一次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与这一政治目标相适应的太平天国教育必然具有革命民主的性质。太平天国确立了新的教育方针、政策，改革了教育内容，建立了相应的教育制度，并把教育作为推动革命和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

(1) 反儒的教育方针

太平天国施行了反儒的教育方针，在太平天国的整个革命进程中，开展了一系列批判封建旧教育的活动。太平天国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是拜上帝会的教义。这种教义排斥包括儒、佛、道在内的一切权威偶像，宣布皇帝、孔子都属“邪神”，全在被打倒、被推翻之列，而另外铸造了一个让人崇拜的“皇上帝”。

早在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等人就捣毁了他们任教的私塾里的孔子牌位。洪秀全还在《太平天日》中编造了一个鞭挞孔丘的神话故事。故事说，孔丘因“教人之书多错”，受到皇上帝追究以致责打，最后被送到天上的菜园里劳动。这个故事否定了独尊儒术的封建教育思想。金田起义以后，太平天国实行了激烈的反儒政策，宣布孔孟的经书为“妖书”，应予以焚毁，孔庙应该拆除。定都天京的当年又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邪说”，大力收缴焚毁。后来则把烧书政策改为删书政策，并建立了“删书衙”。

太平天国自始至终采取的反儒方针，旨在解除封建统治阶级束缚劳动人民的思想桎梏，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农民的新国家。但是，太平天国的做法不是对待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就对旧教育制度的大胆否定和批判精神来说，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破天荒的举动，为后人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启示。

(2) “政教合一”的教育体制

太平天国的教育是为革命战争和巩固政权服务的，教育目的是培养能实践“拜上帝会”教义、敢于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者。为了实现这

一培养目标，太平天国不但提出了反封反儒的教育方针，而且改革了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

太平天国在建制上以军为单位，实行军政合一的制度。军设有军帅，军帅以下至两司马为乡官。军帅辖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两司马为基层官吏，下辖伍长、伍卒。在两司马辖区内，每 25 家设一个国库，一个礼拜堂。两司马既是以 25 家为政治、军事、宗教单位的官长，又是礼拜堂教读圣书的教师。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颁布了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内容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在社会组织方面，该纲领规定实行“寓兵于农”的守土乡官制和供给制的国库制度。它具体规定：“凡 25 家中设国库一、礼拜堂一，两司马居之”，并要求 25 家的男女儿童每天都到礼拜堂，由两司马教读经典；“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听讲道理，颂赞祭奠天父皇上帝”；“每七七四十九礼拜日，师帅、旅帅、卒长要轮流到各礼拜堂宣讲圣书，教化民众，进行考察，奖勤罚惰。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礼拜堂既是太平天国举行宗教仪式的主要场所，又是太平天国的主要教育机构。教育对象是全民的，不分男女老幼都要受教育；儿童是“俱日至礼拜堂”“上课”，成年人是“礼拜日至礼拜堂”“听讲”。“两司马”和军队将领是当然的教师，承担教育的职责。这种教育制度，是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与教育相结合的、“军政合一”、“政教合一”的教育体制。

(3) 普遍平等的教育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针对清朝的封建等级制，提出要把教育权分给“天国”里的每一个人，主张实施不分贫富、不分贵贱、不分男女的普遍、平等的社会教育制度。它明确规定，太平天国施教的对象包括所有的群众——男人、女人、儿童、成人。在太平天国辖区内，儿童要每天到礼拜堂听讲圣书，成年男女要在礼拜日到礼拜堂听讲道理，所以，男女老少、贫富尊卑都可以受到平等的教育，从而废除了封建的等级教育制度。对儿童来说，礼拜堂就是他们接受全日制学校教育的地方，类似欧洲中世纪的村落学校；男女成人每礼拜日入学，又类似欧洲的“星期日学校”。不同的是：欧洲“星期日学校”的教育对象是贫民儿童和童工，而这里的教育对象则是成年男女群众。男女老少都要接受教育的规定，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虽然难以实现，但这种教育平等的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太平天国提出了普遍平等的教育思想，实施得又如何呢？由于太平天国存在的时间很短，并一直处于革命斗争的环境中，实施的教育多是形式不固定的临时性的教育，尚无力发展正规学校，计划推行的儿童普及教育及实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均未实现。

首先，太平天国十分重视儿童教育。他们“视童子为至宝”，除了两司马每日向儿童进行教育外，还在天京设有“育才书馆”，任命育才官教育城中子弟。在新占领的一些城市，设立“育才馆”和“义学”，由各地育才官教导之。1854 年，太平军就在上海设立“义学”，请先生 20 余人分教之。“育才馆”主要是接纳官员子弟入学。另外，还有一种“带徒弟”的教育方式，就是很多将领认有“义子”，除将少数送到

“育才馆”之外，一般就是跟随在各级官员前后，听从教导，在实际中学习提高。

太平天国还十分重视女子教育。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认为男女应该平等。《原道醒世训》指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这样，大大提高了女子的社会地位。据英国人呤喇记载：“太平天国尊重妇女地位，认为妇女为男子伴侣，在教育上他们同样受到了同等的注意，……在宗教礼拜中她们也享有适当的位置，许多妇女都是热心的《圣经》宣讲师。”太平天国设有“姊妹馆”，该馆“由正式指定的女官负责，并特别设有机构以教养那些没有亲人照料的青年女子，以及那些丈夫长期出外工作而无亲人供养的已婚妇女”。在太平天国军队中，专门设有女营，对妇女进行军事教育，训练妇女的作战能力。对不能从军的妇女，也进行生产劳动技能的教育。太平天国在政治、军事和文化机构中都设有女官。总之，太平天国的妇女可以从事政治、军事、生产和教育等各种活动，一改过去妇女的卑弱姿态和地位，这是极大的历史性进步。

太平天国也很重视士兵教育。太平军是中国农民优秀儿女组成的武装部队，是一支爱国爱民的军队。这支军队的良好素质与良好的教育训练有直接关系。太平军的教育包括精神训练和术科训练两方面内容。精神训练以政治、宗教教育为主；术科则以操练为主；军纪训练非常严格，所以士兵对群众特别爱护。

还有一种常用的教育形式，就是组织群众集会，对广大群众和太平军战士宣讲“无情道理”和实施军事政治教育。

总之，重视对儿童和劳动人民的教育，尤其将女子教育提到同男子教育的同等地位，是太平天国教育的重大特点。这种普遍平等的教育，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光辉夺目的一页！

(4)以宗教道德为中心的教育内容

太平天国基本上废除了过去以儒家的“五经”“四书”为中心的教育内容，改学太平天国的宗教教义、方针政策以及科学技术、军事、外语等。

太平天国的教育主要是以“拜上帝会”教义为中心的宗教教育。由洪秀全、冯云山制定的《十款天条》是拜上帝会的教义和守则，也是太平天国全国教育的重要内容。《十款天条》的内容是：崇拜皇上帝；不好拜邪神；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孝顺父母；不好杀人害人；不好奸邪淫乱；不好偷窃劫抢；不好讲谎话；不好起贪心。这就是拜上帝会的十戒，平时为会众的行动准则，战时则是军事纪律。因此，太平天国要求人人要传习背诵。《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后，更要求天下官民务必一律遵守，并把是否遵守作为衡量其忠奸的标准，遵守者擢升，不遵守者惩罚。在宗教教育内容方面，除了学习《十款天条》之外，还有《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真命诏旨书》等。《旧遗诏圣书》和《新遗诏圣书》脱胎于基督教的《旧约圣书》和《新约圣

书》，但加入了太平天国的理解和注释；《真命诏旨书》，也称真约，是天王洪秀全在贵县、桂平、永川等地的诏旨和天父、天兄下凡圣旨等。对于这些宗教教义，是每天两司马教读童子的主要内容，这三本书也是太平天国进行宗教教育的主要教材。

为了儿童识字教育和宗教政治教育的需要，太平天国在建国之初就依照封建蒙馆所用课本的体例，编印了《幼学诗》（1851年）、《三字经》（1853年）和《御制千字诏》（1854年）等教材。这些课本吸取了儒家童蒙教材《神童诗》、《三字经》和《千字文》的形式，但阐述的内容主要是富有宗教色彩的农民革命，以政治、宗教、伦理道德教育为主，其中也包含一些文史知识、生活常识，还有一些封建伦理观念。主要是告诫人们要“拜上帝”、“敬耶稣”、“守天条”、“正其身”、“求不愧”等，向他们灌输“天国”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各种道德观念。

太平天国还把政治、经济、道德等方面的内容统一到宗教教育中，采取了宗教与政治、爱国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相结合的教育政策。太平天国革命是在宗教外衣掩护下进行的革命斗争，它是通过宗教教育来动员和组织人民起来打倒代表反动封建势力的“阎罗妖”，包括清朝皇帝及其政府、封建地主、封建迷信和封建思想意识等。他们还教育人民要热爱太平天国，要拥护和崇拜代表太平天国利益的“皇上帝”，用天上的皇上帝来打击地上的皇帝，使人民认识到天下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一律平等，皇帝也不例外。这种宗教教育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教育。

太平天国很重视军事学习和教育。在士兵教育中，除进行宗教的和政治的教育外，还进行普遍的军事教育。为了适应进行军事教育的需要，编写了许多进行军事技术教育的教材，主要有《武略》、《真圣主诏明大小兵法水旱战法》和《兵法四则》等。

自然科学知识也是太平天国教育的重要内容。太平天国的一些领袖也注意到了科学技术的传授，要求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洪秀全就是中国近代努力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洪仁玕在《资政新编》中曾大力提倡学习科学技术，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章“都熟悉地理和机械学，还收藏有许多关于西方文化和科学的附有插图的参考书，他们是经常研读这些学问的”。另外，他们还尽力罗致和培养诸如天文、地理、算学、医学、军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人才。太平天国也很重视向儿童进行各种知识的教育，如《御制千字诏》，仅1104个字，不仅简要介绍了“天国”的发展史，而且还将山川湖海、气象变化、动植物名称、日常用语等编写进去，进行各种知识的教育。在“育才馆”中，许多太平军将领的子弟还学习机械学、地理学等科学技术知识。

为了向西方学习，太平天国的领导人还重视学习和掌握外国语。据英国人呤喇记载：“章王、干王、忠王之子茂林以及其他几位首长，正在学习英文”；忠王儿子茂林仅15岁，“会说简短的英语，如‘再会’、‘您好’之类”。

到了后期（1854年后），经过删改的“四书”、“五经”等儒家经

[英]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9章，第188页。

[英]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9章，第192页。

书也可以学习，也是重要教材之一。

(5) 改革科举取士制度

太平天国选拔人才，主要是在革命实践中进行。建都南京以后，为解决人才的急需，也采用了科举取士的办法，但进行了重大改革。

首先，废除了封建门第出身的限制。根据周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记载：“无论何色人，上至丞相，下至听使，均准予考”；所有应考、录取、任用，都没有种族、贵贱、男女、贫富之分；会试无论布衣、绅士、倡优、隶卒、取中即为状元；乡试中录取无定额，亦不论门第出身，取中即为举人。

其次，对考试内容作了重大改革。在考试内容上，不准出《四书》、《五经》上的题目，而从《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真命诏旨书》以及其他官书中选取。

第三，增设了女科。妇女在旧科举中被排斥在外，但太平天国曾专为妇女应考开设了女科。根据《太平天国》（丛刊）第四册《金陵记事杂咏》记载：“棘闱先设女科场，女状元称傅善祥。”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破天荒之举。

第四，与旧时科举考试时对待应考者的态度不同。过去视应考士子如囚犯，须自己提篮做饭。太平天国却给予很多优待和照顾，在饮食、起居、旅费等方面都照顾得很好，为穷苦大众及其子女应考提供各种方便。

第五，对被录取者的士阶、任职作了变革。太平天国“改秀才为秀士”，“改举人为博士”，“改进士为达士”，“改翰林为国土”等。除元甲仍称状元、榜眼、探花外，二甲称国土、威士，三甲称达士、壮士。对考取后的任职也有新的规定，均给予优待，表明对人才的重视。

另外，太平天国还实行了层层保举和招贤的制度，以选拔和吸收人才。太平军每到一地，都张贴“招贤榜”，凡有一技之长者，都量才录用。招贤的范围很广，既包括文学、科学、武艺、医务等方面的学子，也包括木匠、瓦匠、铁匠、吹鼓手等技艺方面的人才。

(6) 洪仁玕的革命教育思想

洪仁玕（1822—1864年），广东花县人，出生于农民家庭，洪秀全的族弟。曾任乡村塾师，是最早参加洪秀全组织的“拜上帝会”的成员之一。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起义时，他曾两次冒险前往参加，均因受到清军封锁，未参与举事。1852年，他响应太平军暴动失败，转至香港，再到广东东莞县，以行医避难。1853年再到香港。1854年，由港抵上海，屡次去南京受阻，再次返港。他先后在香港停留7年，曾给外国传教士作家庭教师，教习汉字。其间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影响。1859年，他乔装商人，辗转到达天京。他对太平天国无比忠诚、学识渊博、通晓西学、了解外情，深受洪秀全器重。不久被封为干王，总理朝政兼文衡正总裁，掌管太平天国文化教育事业。还曾兼掌过军事、外交等重要职务。1867年7月，天京陷落后，为保护幼天王，转战安徽、浙江、江西和福建等地，后在江西石城被俘，于同年10月英勇就义于南昌。他参政之初向洪秀全进呈的《资政新篇》是继《天

朝田亩制度》之后又一个全面革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纲领性文献。

提倡发展资本主义的文化教育。洪仁玕主张学习西方。他看到当时英、美等西方国家已发展到“技艺精巧、国法宏深”的时代，他认为一些国家强盛富足的原因是“法善”和大兴科技。清朝统治下的旧中国为什么不能在世界上“见称于各邦”，主要是由于采取“拘拘不与人交接的”闭关自守政策。他考察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之后，认识到要想使中国富强，必须向西方学习，“因时制宜，度势行法”。在文化教育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文化教育性质的改革：

首先，他提倡“移风易俗”并“自上化之”。他认为中国“人心蒙昧，习俗所蔽”。他指出，要改变中国“人心蒙昧”的状况，必须“移风易俗”，并且要“自上化之”；要想革除这些陋习，必须“立牧司教导官，亲身教化之”；也只有在上帝对于这些陋习“鄙之忽之，遇则怒之撻之”，才能“民自厌而去之”。

其次，保护儿童，禁溺子女和卖子为奴。他主张制定保护儿童的政策，对于儿童，“不得已难养者，准无子之人抱为己子，不得作奴视之；或交育婴堂；溺者罪之”。他还指出，对于家贫卖子者，要耐心加以开导，不能“不思子孙永为人奴”。他主张富人可以请人雇工，但不得买奴。这些都体现了洪仁玕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爱护儿童、保护儿童的思想。

第三、主张设立“士民公会”，奖励兴办教育事业。

第四，主张兴办福利教育设施，对残疾人和无助者给予教养。他很赞赏美国的福利事业，“其邦之跛盲聋哑，鳏寡孤独，各有书院，教习各技”。他要求效法西方，成立残疾人和无助者的收容机构，进行教养。他号召“有财者自携资斧，无财者善人乐助，请长教以鼓乐书数杂技，不致为废人也”。

第五，重视学习西方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他认为中国的旧教育“不务实学，专事浮文”，处于闭塞落后状态，必须改革；而西方列强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是使其富强的物质基础。他推崇德国、法国的科学技术，主张向他们学习制造火车、轮船、钟表等先进技术。

在教育目的上主张培养“德才兼备”的新人。洪仁玕十分重视教育，目的是要为太平天国的“新天新地新世界”培养“新民”、“新人”。他在《资政新篇》中分析和研究了西方列强之所以强盛的原因，认为要能永保太平天国的江山，根本问题是“必先得贤人”；要得贤人，必须重视教育，培养人才；要想搞好教育，培养人才，必须“因时制宜，度势行法”，做到教法兼行；教法兼行，还要以教为先导，才能得人行法。他在《钦定英杰归真》中认为，必须受到太平天国的教育，受到“天父上帝圣神感化”，“始能认识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他要培养的“新人”，按照他的理想就是“德才兼备”的人才。他从“德才兼备”思想出发，认为文武之士都应“文武兼备”、“文可兼武，韬略载在诗书；武可兼文，干伐化为礼让”；“揆文则足以辅国，奋武则足以诛妖”。培养“德才兼备”、“文武兼通”的人才，是洪仁玕的教育目的观的集中体现，是他最根本的教育指导思想。

重视宗教道德教育、科学技术教育和文学艺术教育。为培养太平

天国所需要的、德才兼备的“新民”、“新人”，洪仁玕主张以宗教道德、科学技术知识和文学艺术作为教育内容，被称为“三宝”教育。他把宗教道德教育视为“上宝”。他认为，进行宗教道德教育可以“格斯邪心，宝其灵魂，化其愚蒙，宝其才德”。在他看来，宗教信仰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区别于万物所特有的道德意识。他重视宗教教育，就是把拜上帝会的教义作为对人才的首要要求。他把宗教与伦理道德结合起来，还特别重视伦理道德教育。他认为，必须时时克服外界对人的诱惑，才能防止变坏；能否有真正的道德修养，主要是看能否悔罪改过而不再重犯错误。对于道德教育的作用，他认为教育与法律两者对人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但道德教育是法律所不能替代的。根据这种认识，他要求为上者“必先教以天条，而后齐以国法”，只有这样，才能使世人知道德懂法律，育人治国。这是他实行新政的重大措施之一。他把学习科学技术知识视为培养“新人”的“中宝”。他在《资政新篇》中指出：“中宝者，以有用之物为宝，如火船、火车、钟鏢（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他认为，学习这些科技知识，“皆有探造化之巧，足以广闻见之精”。他在《钦定士阶条例》中，要求“所有应试士子，必须习练诗书技艺，共识天情奥妙”。他把诗画美术看作培养“新人”的“下宝”，是“三宝”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他认为，“诗画美艳，金玉精奇，非一无可取，第是宝之下者也”。从以上可以看出，洪仁玕吸收、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提出了以道德、知识和文艺的“三宝”教育培养“新人”的主张，对后来的革命斗争和教育改革有重大影响。

主张办新式学校。1860年，我国第一个留美毕业生容闳到天京访察，向洪仁玕提出7项教育改革建议，其中4项是建立新式学校。这4项建议是：设立武备学校；建设海军学校；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设立各种实业学校。这些建议得到干王洪仁玕的赞赏，并愿付诸实施。

洪仁玕总结了太平天国时期的教育思想和经验，提出了培养“新人”的教育目标和以“三宝”教育为中心的教育内容。洪仁玕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4. 洋务教育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中国处于强敌环伺、民族危亡的危险境地。中国紧紧关闭的封建大门已被打开，闭关锁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时代已经结束。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官员开始认真面对中国胜败存亡的现实，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政治集团，开始提倡“自强”、“求富”的“新政运动”，即洋务运动，以维持清朝的封建统治。这是一次带有某些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教育活动是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洋务教育的产生

以“自强”为名的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是购买军火、训练军队、筹设海防、建立军事工业。要办洋务，就必须培养洋务人才，如军事人才

和外语翻译人才等，因此，洋务派主张兴“西学”，提倡“新教育”。洋务派认为，当时“东西各国日益强盛，中土一无所恃”。要想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状况，“造就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和“当务之急”。他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即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础，认真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技能。这是后来清政府兴办学堂所奉行的一贯政策。在这种教育制度下造就的所谓“通才”，就是“思想要旧，本领要新，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子曰诗云，下午声光化电”（鲁迅语）的中西合璧的封建买办人物。兴办洋务的大批人才是中国的科举制和旧式书院培养不出来的。因此，洋务派开始兴办新学堂、派遣留学生和翻译西书等。洋务教育带有明显的封建色彩和买办性，并得到了洋人的支持，但它对清末学制和教学内容的改革有一定促进作用。

(2) 洋务派创办近代专科学校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创办了四类学堂：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技术学堂和综合性学堂。最先创办的是京师同文馆，可以说它是近代第一所新型专科学校，开创于1862年，隶属于总理衙门，设馆目的是培养翻译人才。以后，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相继建立。

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清政府在外交活动中蒙受极大损失，急需培养翻译人员，这是清政府决定建立外语学校的主要原因。京师同文馆一开始就打上了殖民地教育的烙印，实际上是赫德操纵同文馆的财政大权，大部分教师都是外籍人员，教学内容充斥着殖民主义思想和宗教观念，知识水平较低。清政府设立同文馆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皇室贵族子弟，以充任外交人员和掌握外交大权。李鸿章和张之洞等官僚则欲培养汉人聪颖子弟，以培植自己的外交势力，因此，他们还开办了广方言馆等。这也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洋务派看到中国的军备武装远不及西方先进，于是主张“师其所长，夺其所恃”，兴办军事学校（如天津水师学堂）、工业技术学校（如上海机器学堂、天津电报学堂等），以学习“西艺”为主，重点是仿制洋枪、洋炮等洋武器和训练洋操兼学洋兵法。

洋务派办洋学堂30余年，培养出来的学生却很少有真才实学。但从中国教育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它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是对封建传统教育的重大改革。这些学堂传播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以及西方史地、国情的知识，对培养我国早期的科学技术人才有积极作用。京师同文馆等学堂还组织翻译了数百部西书，对开阔国人眼界亦有积极作用。

(3) 留学教育

留学教育是洋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洋务教育的发展，洋务派认识到，要熟悉西方、学习西方，只靠在国内办洋学堂是不够的，还需要派人出去学习。这样，派遣学生出国留学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1870年，容闳向曾国藩建议派遣幼童赴美留学。1871年9月，曾国藩和李鸿章在容闳建议的基础上，奏陈选送聪颖子弟赴国外留学。奏

折获准后，从 1872—1875 年，每年派 12—15 岁幼童 30 名，4 年共 120 人，由容闳带领赴美留学，15 年学成回国。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主要学习军政、船政、步操和制造等，我国著名工程师詹天佑和思想家严复等都是其中成员。

清朝政府害怕留学生被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洗染，1876 年派顽固分子、翰林出身的吴子登出任留学事务所的监督。1881 年他以学生沾染洋气、“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将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为由，几乎将留学生全部召回，只留下 10 人继续学习。

在光绪二年（1876），沈葆楨和李鸿章又请求派遣学生去欧洲留学。于是有 30 名学生被派往法国学习造船或去英国学习驾驶，学期 3 年，期满回国任用。

后期的洋务派首领、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力倡留学。1898 年，他著文陈述留学之必要，并主张奖励留学，特别提倡去日本留学。1896 年，清政府派唐宝锷等 13 名学生赴日本留学，成为中国第一批留日学生。自 1898 年起，清政府明令各省选派青年学生去日本留学，并作为一项固定的国策。

洋务派的留学教育是为了培养洋务人才，维护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但是，培养的大多数留学生都成为爱国的知识分子，是我国近代科技界、企业管理部门、外交部门和军事部门的第一批骨干力量。

5. 戊戌维新时期的教育

近代中国，由于腐朽的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都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形势迫使一些爱国之士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出路问题。他们苦苦思索中国贫弱的原因，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只有改革才能发展自己，而学习西方则是他们认定的必经之途。70 年代中后期，一些要求学习西方、改革现状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积极宣传西学，主张革除社会弊端，以促进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要求摆脱封建势力束缚、改革弊政、救亡图存的呼声愈来愈高。在这种形势下，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演变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政治运动。与政治维新相适应，教育领域里也出现了改革运动。

(1)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教育思想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郑观应、王韬、陈识曾等人。他们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社会发生了“千古奇变”，出现了一种非改革不可的趋势；要进行改革，培养人才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对明清以来的八股取士制度和现行的教育制度极为不满，猛烈抨击传统教育和洋务教育，极力主张废除八股取士制度。郑观应认为，传统教育的致命弱点是“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是一种“空疏无用”的教育，究其原因，在于八股取士制度。他认为八股教育是一种弊政，若不改变，人才就会被完全埋没，国家就会坐以待亡。王韬认为，国家每年花许多钱，结果是“取数千百贸然无知之人，而号之曰士，将来委之以治民，民其

治乎？故我曰取士之法不变，则人才终不出”。

早期改良派认为，洋务教育同传统教育相比，只是“小变而非大变，貌变而非真变”。他们对西学的认识要比洋务派广泛和深刻。他们认为，洋务派只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是太有限了，应该是自然科学、生产技术、社会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都学习，单纯学习技术不能使中国富强。他们还主张保持教育的独立自主权，反对洋务派任用西人。

早期改良派坚持学习西学、注重实学的原则，力主改革封建的无用的传统教育。他们认为，办好学校教育是治国之本，主张多设学校，广植人才，建立系统的各级学校。郑观应提出，把旧有的官学和书院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模式，改成文、武两个系统的大、中、小学校。县为小学，省为中学，京师为大学。在文科系统中，分6科：文学、政事、言语、格致、艺学、杂学等。武科系统则分陆军科和海军科。郑观应还主张每科分成数班，分班管理。在教学内容方面，他们主张扩大西学的比重。但从教育内容的总体而言，郑观应认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早期改良派主张废除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主张考与实际相关的学问，提出了“论其艺、不论其文，量其才而不拘其资格”的质量评价标准，目的是鼓励士子追求有用的学问。早期改良派注重从教育制度、数学内容等方面向西方学习，以改革中国的传统教育，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迈开了重要的一步，是有进步意义的。

(2) 康有为、梁启超和严复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康有为的教育思想。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县人，后人称为南海先生。他是戊戌变法的领导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教育家。康有为把教育作为实现改良主义的首要工具，提出了适合资产阶级要求的一系列教育思想和主张。他论述了教育的作用和任务、学校教育的系统、内容和方法以及女子教育等问题。

康有为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是重视教育的结果。他指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才智之士”；“才智之士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他提出教育的目的是“保国、保种、保教”；这里的“国”是指大清帝国，“种”指“汉满合种”，“教”则指孔孟的儒教。

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提出了近代学校的系统方案，建议把书院改为学堂，每乡设小学，儿童7岁入学，18岁毕业，儿童“不入学者罚其父母”。小学生学习科目有文、史、算学、地理、物理、歌乐等。每乡设中学，分初、高等两种，各2年。所学科目除继续小学各学科外，增授外国语和实用学科。各省府设专门高等学校和大学。大学分为经学、哲学、律学和医学4科。京师则创立规模较大的京师大学堂。他关于学校系统的建议被光绪皇帝所采纳，并作为敕令公布，但由于变法失败，未能付诸实施。

康有为主张对受教育者施以德、智、体、美多方面的教育，尤其强调对封建文化的学习。他反对当时的学校只教词章诗字、不讲求“圣道”

的现象。他认为这样是不能造就“才智之人”的。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其“讲学宗旨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他在这学堂实行了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教育纲领。他关于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过于强调封建道德教育，使他的思想只能囿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圈子。

康有为提倡女子教育。他在《大同书》中抨击了封建礼教、“三从四德”，呼吁男女平等、妇女解放、选拔妇女人才、让妇女参加国家政权等。他主张女子应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受教育权利，提出“小学院”的教师应由女子担任。他抨击了当时学校不培养女子的现象。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在太平世对儿童实行公养公教的思想。所谓公养，就是由政府对怀孕母亲和婴儿幼儿实行供养和抚育，每个妇女怀孕之后，便入“人本院”，进行胎教；婴儿由出生至3岁进入“育婴院”，3—6岁则入“怀幼院”。这相当于现在的托儿所和幼儿园阶段的学前教育。所谓公教，就是由政府设立各级学校，对年满6岁至20岁的青少年实施免费普及教育。这种公养公教思想就是教育平等的思想，即每个社会成员，不分男女，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

康有为还提出了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的主张，认为这是学西学、培养新人的有效途径。他特别提出应派人到德国留学，认为德国“文学最精”，又是君主国家，更适合中国国情。他提出的派遣办法是：各县自选优秀子弟，大县3人，中县2人，小县1人，费用由各县自筹。这些建议和主张，充分表现了一位教育家的社会责任感和远见卓识。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往日本。在国外，他的思想没有多大变化，仍坚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后来反对辛亥革命。1927年病故于青岛。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出身于封建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期开始接受西学影响，18岁时（1891年）师从康有为，就学于万木草堂，深得康师赏识，并深受当时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1898年，他积极参加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受命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极力倡导教育改革。其主要教育著作有《变法通议》、《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论教育当定宗旨》等，多收录于《饮冰室文集》。

梁启超非常重视教育的“开民智”作用。他认为变法的根本在“开民智”、“育人才”，因为变法的基本要求是“兴民权”。他从“智”能生“权”的观点出发，特别强调“开智”的作用，“今日中国之大患，苦于人才之不足”。因此，他把兴学校、开民智看作救亡图存的头等大事。在“开民智”的问题上，他主张既要“开民智”，又要“开绅智”和“开官智”，这样，才能使各阶层人士“都能广其见识，破其愚谬”，才能顺利行新法，开风气。他提出不仅要设一般学堂，还要设官吏学堂，努力造就一大批“成就远大、各有专长、各有根底”的精干分子和“识才兼备”的官吏。他还提出学习是终身的事情，人人要终身受教育，“贵至君主，贱至皮匠莫不皆然”。

梁启超认为教育的宗旨是培养“新民”。他的“新民”标准是：具

有爱国心、公共心、独立性、自治力等。教育的任务，是通过学校教育“养成一种特色的国民”。这种国民能“自克自修”，“翦劣下之根性”，养成“完粹之品格”。培养出这样的“新民”，再由他们去改良社会，国家就能走向独立富强之路。他认为传统教育培养的人只重私德，缺乏公德观念，不具备作为国民的资格。他认为，在“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如不确立正确的教育宗旨和育才目标，中国在世界上是“绝无立足之地”的。针对中国的落后状况，梁启超积极主张变科举、兴学校。他提出了改革科举的具体方案。对于师范教育的作用，他给予了极大重视，认为师范教育是“群学之基”，力倡建立师范学堂，发展师范教育。梁启超坚持“男女平权”的观点，积极提倡兴办女学，并计划在上海设一女子学堂。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反映了他的积极进取、乐观、自信的精神，表现了他发展教育的深谋远虑和远见卓识。他的主张，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起到了改变社会风气的作用。当然，他的理论也有不少自相矛盾之处，其思想还限于唯心主义的社会改良范畴。

严复的教育思想。严复（1853—1921年），福建侯官人，近代中国早期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清代末期教育家。他早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赴英国海军学校留学，1879年回国。严复一生传播西学、培养维新人才、热心从教；历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北京大学校长。他还与人合办过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上海复旦公学等。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他的悲剧是后来参加“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从新派行列退到了旧学营垒。

严复主张教育救国。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大患”在于“愚”、“贫”、“弱”；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愈愚”、“疗贫”、“起弱”；“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他认为，从讲求西学入手，通过教育途径，就能达到“愈愚”、“疗贫”和“起弱”的目的，实现救亡图存之愿望。他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变法主张。“新民德”就是要培养人民守信、奉公、爱国的品质。他重视教育的“开民智”作用，在当时有利于民权思想的宣传。但他的“教育救国”主张，在当时就受到批评，认为不切中国实际，孙中山先生在伦敦和他进行过辩论。

严复批判旧学，宣传西学。他对旧教育进行了尖锐批判，锋芒所向直指八股取士、传统汉学、宋学及词章之学。他认为这些旧学虽有些学问，但这种“学问”多是烦琐的、形式主义的，因而是“无实”和“无用”的。他宣传西学，主要是通过他的译著进行的。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名学》、亚当·斯密的《原富》等著作。这些书直接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也包括了西方国家的治学方法和科学研究方法。

严复制定了一个较为详细的教育制度蓝图。他提出，儿童在十六七岁以前受初等教育，入蒙学堂与小学堂。小学堂的教学目的是“粗通经义史事”，能写“条达妥适之文”；功课以旧学为主，也学习西学读物。16—20岁的青少年接受中等教育，课程以西学为重点，西学科一律以洋文授课。高等教育的内容，主要是西学。高等学堂和专门学堂聘用洋教

习，不用中国教习，班型大、学生多时可聘中国人为助教。

严复的教育思想对改变人们的教育意识，使中国教育从封建传统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走向世界，走向实际，具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他自己也没有坚持到底。

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维新派的教育家们扎扎实实地进行了批判旧学、宣传西学和提倡新学的改革文化教育制度的活动。他们废八股，变科举，广兴学堂；建立译书局和编译局，编译外国教科书和各种书籍；还鼓励自由设立报馆；各学堂选派聪颖子弟出国留学等，大大推动了人民思想的进一步解放。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的崭新思想和办学实践，影响了一代进步青年。他们倾慕西学，追求实学，放眼看世界，使文化教育界出现了活跃的局面。

(3) 京师大学堂的建立与近代中国大学的诞生

京师大学堂的创建是“百日维新”期间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京师大学堂是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清朝末年最为著名的新式大学。关于京师大学堂的设置，早在“百日维新”之前就有创议。最早提出兴办京师大学堂的文献见于1896年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由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稍后总理衙门接到光绪帝的“上谕”，准设京师大学堂，并派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大学事务。

京师大学堂的创建标志着我国近代教育行政组织的萌芽和有别于封建旧教育体制下学校管理模式的出现。根据当时大臣的奏议和《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规定，京师大学堂的地位“为各省之表率”，“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管学大臣的职责非以管理大学堂事务为限，实际上是全国教育行政的最高长官。以后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另设大学堂总监督。学务大臣统辖京外各学，总监督专管大学堂事务。后来，张之洞、张百熙等又奏请设立学部，京师大学堂又隶属于学部名下。到民国初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

近代中国大学的诞生，始于1895年盛宣怀报经清政府批准后在天津办的天津中西学学堂。盛宣怀在奏章中说：“此外国所谓大学也”。这所学堂于1903年改为北洋大学堂，即现在天津大学的前身。

戊戌政变后，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进行教育改革，并逐渐形成了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其标志是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正式颁布了张之洞、张百熙和荣庆共同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个章程把高等教育分为三级，即高等学堂、大学堂和通儒院。这是我国近代最早由中央政府确定的高等教育制度。

九、日本和印度教育

1. 日本教育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19世纪60—70年代的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的重大转折。明治维新以前，神道思想和儒家思想在日本教育领域中占着主导地位。教育机构有幕府直辖学校、藩学和“民众”教育所等。比较有名的幕府直辖学校有昌平坂学问所、和学讲习所、开成所和医学所。昌平坂学问所是日本的儒学研究中心；和学讲习所讲授日本国学；开成所传授西方学术和语言；医学所教授西洋医学。藩学设在大名的领地，教育各藩的武士。“民众”教育所有乡学和寺子屋等，是为大藩的支族及家臣子弟或庶民开设的学校。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教育等级森严，学校数量也少，设备简陋，教学内容也很单调贫乏，不能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

(1) 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形成

“维新”之初，明治政府就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纲领性改革口号，确定了明治政府各项政策和措施的总体方向。1868年3月发布的政府施政纲领——《御誓文》提出“破从来之陋习”和“求知识于世界”两条原则，表明日本决定放弃闭关自守政策和学习西方的决心。以西方教育为榜样，进行教育改革，在日本确立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是明治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明治维新是统治者自上而下发动推行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保留了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和军国主义特征，这对日本新教育制度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

培养忠顺臣民和孝子的教育宗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把学习西方、兴办教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以天皇名义于1879年发布的《教学大旨》和1890年的《教育敕语》确定了日本教育的宗旨。

1874—1888年，日本兴起了自由民权运动，这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运动。社会各阶层，包括教师和学生都投入了斗争的行列。他们提出召开民选的国会，制定宪法，以及减轻地税等。

为了遏制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潮，1879年日本天皇发布《教学大旨》。《大旨》起草者元田永孚（1818—1891年）是天皇的侍讲，一个顽固的儒家。《教学大旨》突出强调日本教育的宗旨在于根据祖宗的训典，形成忠孝仁义的思想品德，完成“臣民”教育的任务；明确提出培养忠孝仁义的道德和探求知识才艺是相并列的教学要务。《教学大旨》明显地反映了日本近代教育在学习吸取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同时，仍坚持把灌输儒家道德作为教育的中心任务。

19世纪80年代末，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受到了镇压，但同时也实行了君主立宪，并于1889年颁布帝国宪法。1890年天皇下达《教育敕语》，它实际上具有法律效力，成为日本近代教育的基本法。它重申日本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天皇的忠顺臣民和父辈的孝子。在道德教育方面还强调了爱国和守法教育。在教学方面，提出要重视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以适应富国强兵的需要。《教育敕语》的基本精神符合日本统治阶级的意志和

利益，一直支配着日本教育；而且作为国民道德规范的最高准则，长期影响日本的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国民的整个精神生活。直到1945年情况才发生了某些变化。

中央集权的领导体制。1871年7月，在日本政府中设立了文部省，主持教育改革，统辖全国教育事业，兼管宗教事务。1872年，日本颁布《学制令》，具体规定了日本的教育领导体制和学校制度。

日本的教育领导体制仿效法国，实行中央集权的大学区制。在文部省的统一管辖下，全国划为8大学区（一年以后又改为7个），每区设大学1所。每个大学区分32个中学区，每个中学区设中学1所；中学区又各分为210个小学区，每区设小学1所，全国共设小学53760所，每600人左右即设1所小学。

80年代后期，日本陆续设立了普通学务局和专门学务局两个机构，加强普及初等教育和发展高等教育的工作。此后，又设立了管理职业教育的实业学务局和宗教局等。日本对教育内容的思想方向非常重视，1883年实行教科书由文部省批准的制度，1886年改由文部大臣直接审定。1903年又确立了小学教科书的“国定制”，绝大部分小学教科书的著作权直属文部省。

学校制度

1872年日本颁布《学制令》，以后又颁布《教育令》，到80年代末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各级教育的《学校令》，最终形成了日本近代的学校制度。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非常重视振兴初等教育，文部省把大力发展小学定为实施《学制令》的首要任务。《学制令》废止寺子屋和乡学，规定开办八年制的小学校，分为初级和高级两段，各4年，儿童6岁入学，接受8年的普及义务教育。1879年发布的《教育令》修正了上述规定，将普及初等教育的年限缩短为4年；1880年又把八年制的初等学校划分为3—3—2年的三段，第一阶段的3年为义务教育。1886年，颁布的《小学校令》，才将初等教育学校确定为8年，分为前4年的寻常小学和后4年的高等小学两段，前4年为义务教育阶段，后4年实行收费。但是在生活水平较低的地区允许设立三年制的简易小学；高等小学的年限也可以分为2、3或4年。这种灵活的规定，有利于初等教育的普及和发展。

初等学校的课程包括修身、国语、作文、算术、几何，还包括初步的物理和史地知识、化学和体操、图画、唱歌等。

日本近代普及教育的速度很快。1873年初等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只有28%，1891年已达50.3%，1907年则提高到97.3%，基本实现了普及4年制初等义务教育的目标。同年，决定将义务教育年限延长为6年。

关于中等学校，《学制令》规定：在8年制初等学校之上设立6年制的中等学校。1881年，文部省决定将中学的6年分为4、2两段；必须具有6年的初等教育基础，才有入中学的资格。1886年的《中学校令》规定，中学学制延长为7年，分为5、2两段。5年制的初级中学称寻常中学，由地方设置和管理，是普通教育学校；2年制的高等中学校是中等教育的第二阶段，属于大学预科性质，全国只设5所，由文部省大臣直接管辖。

中学课程设置的特点是重视科学基础知识和外国语，课程门类较

多，内容颇深。高等中学校为学生入大学作准备，寻常中学的大部分学生毕业后直接就业。在中学实行严格的考试制度，作为保证学习质量的重要措施。高等中学校课程是分科设置的，一般有文、法、理、医、农、商等科目，进行专科教育。1894年，高等中学校改名为高等学校。高等学校入学考试严格，竞争激烈，在培养专门人材方面做出了显著贡献。但学生多为名门望族子弟，通过高等学校的阶梯进入东京大学（即后来的东京帝国大学）等校，成为政界、财界要人。

日本最古老的私立大学是庆应义塾大学，简称庆应大学。它是庆应义塾的一部分。庆应义塾的前身是1858年（安政五年）福泽谕吉在江户（今东京）筑地铁炮洲设立的兰学塾。1868年（庆应四年）塾址迁至芝新钱座，并取得当时日本孝明天皇年号“庆应”为塾名。庆应义塾是日本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私立学校。1873年，仿美国的中等教育制度，义塾定学制为7年，称为正科；另设别科，专门讲授英文。1890年，义塾创办大学部。1898年进行学制改革，实行自幼儿园、小学、中学直至大学部的一贯教育制度。1920年（大正九年）庆应义塾大学部发展为由文学部、经济学部和法学部、医学部组成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取名为庆应义塾大学，并设立了研究院。

明治政府十分重视创办新式大学。1877年（明治十年）创建东京大学。它是著名的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日本近代第一所大学。创办该校是为培养“富国强兵”和发展经济的管理人才。1886年颁布《帝国大学令》，把东京大学改名为帝国大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成立了京都、东北、九州、北海道等几所帝国大学，1897年原第一所帝国大学改名为东京帝国大学。另外，一些有名的高等学校也改组为大学，如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改组成为早稻田大学（1902年）。这样，日本的近代高等教育便初具规模。日本还非常重视向欧美派遣留学生的的工作，学成归来的留学生成为日本科技界的重要力量。

关于师范教育，《学制令》颁布之前，日本只有1所公立的东京师范学校。1874年发展为7所，每个大学区有1所；同年还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80年代初，政府规定师范学校必须与它所在的地区学龄儿童数字的增长相适应，地方必须按这一要求制定具体规划；政府还确立了教师审定制度。这两项措施促进了师范教育的发展和教师水平的提高。1886年颁布的《师范学校令》把师范学校分为寻常和高等两种，前者由地方设立，培养公立小学教师和校长；后者由国家设立，培养寻常师范学校的教师和校长及其他学校的教师和校长。师范学校强调对学生的品德教育，在校期间还要接受军事训练。

关于职业技术教育，1872年颁布的《学制令》规定开办工（机械、矿山）、农、水产、商业等10种实业学校，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初级和中级技术人材。起初，由于文部省无暇顾及，实业学校由政府各部门分别管理；80年代后，逐渐转归文部省管辖。日本注意学习德国的经验，整顿和兴办实业学校。这些学校分为三种类型：实业补习学校、实业学校和实业专科学校。这种实业教育学校在学制中自成体系，体现了日本近代学制的双轨制性质。

日本自1872年颁布《学制令》开始教育改革，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近代学制基本成型，完成了日本教育史上的第一次重大改革，使教

育迅速普及和发达起来。

明治维新是日本社会的一个转折点。明治维新时期所实行的一系列资本主义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到明治时代的中后期，日本以“富国强兵”为根本目标，基本确立了国家主义教育制度。这一制度带有浓厚的封建军国主义色彩。

(2) 福泽谕吉的教育思想

生平。福泽谕吉（1835—1901年），是日本明治维新前后著名的西方近代文明的启蒙者和伟大的教育家。他出身于大阪一个下级武士家庭。其父喜欢收藏中国古书，但在谕吉18个月时就去世了。他跟随母亲、哥哥过着贫寒的生活。他14岁开始读汉书，读过《孟子》、《论语》、《诗经》、《书经》、《左传》、《战国策》、《老子》、《庄子》、《史记》、前后汉书和《元明史略》等。他天资聪颖，学业超群，成为远近闻名的汉学家。

由于他才华出众，在当地遭到忌妒。他性格倔犟，志存高远，于是，背井离乡到江户（即东京）另创天下。起初他拜兰学家绪方洪庵为师，继续研究兰学，成绩显著。1858年，他在江户开设洋学塾，讲授兰学。

谕吉生活的年代正是日本民族危机时期，民族的耻辱使他受到强烈震撼。他渴望民族独立和祖国振兴，26岁时开始学习英文，希望摄取更多的西方文化科学知识。以后他便教授英文。

1860年，谕吉作为随员出访美国，历时50余天，直接了解了西方近代文明，感受极深，视野更为开阔，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他认为日本必须弃旧图新、废除锁国政策，学习西方经验，进行全面改革。1862年他又出访欧美各国，到过法国、英国、荷兰、葡萄牙。他重点考察了各国教育。他主张“输入西洋文明教育”。1867年他再度访问美国，当时正是日本国内倒幕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他拥护明治维新的改革措施，全心转入著述和教育工作，介绍西方文明，倡导学习实学和科学。1868年他把洋学塾改名为庆应义塾，积极培养各类人才。明治33年，日本政府奖励他金币5万，他将这笔巨款全部交给义塾作为办学基金。

谕吉从1858年开始从教，直到1901年逝世，从未离开他心爱的教育工作。维新政府曾动员他弃教从政，委以重任，被他拒绝。他一心以平民身份、渊博的学识来培养青年，为社会服务。

谕吉醉心于西方文明，毕生献身于日本教育事业和传播西方文明的工作。1870年他与森有礼等人组建“明六社”，创办《明六杂志》、《时事新报》等，批评封建思想，倡导文明开化，启发国民的民主科学意识。但80年代后，他的思想开始倒退，日趋保守，最后主张实施尽忠报国的道德教育和军国主义教育。他著书60余种，主要著作有：《西洋事情》、《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福泽谕吉自传》、《新女大学》、《尊王论》等。

主要教育思想。“文明开化”的理论是福泽谕吉教育思想的基础。他的《文明论概略》阐述了这一理论。他认为广义的文明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指“人的身体安乐，道德高尚；或者指衣食富足，品质高贵”。就文明的本质和特点而言，他认为文明是发展的，“智慧的领域日益广阔，自古至今创造发明多得不可胜举，今后的进步仍然是无法估

量的”。文明的发展在于科学技术的推动。文明是衡量社会历史发展的标准。“能促进文明的就是利，就是得，反之，使文明退步就是害，就是失”。福泽谕吉认为，实现文明是人类的理想。他认为文明是人类的物质需要和精神进步，二者缺一不可。他还认为有个人文明和国家文明之分。智德兼备的人堪称文明的个人，但不等于他所处的国家是文明国家，人们应该团结起来谋求国家文明。

福泽谕吉倡导崇实致用的教育思想，这一理论与他的“文明开化”论相结合，构成其全部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他所谓的“实”是指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他在义塾中奉行“以数理为基础，培养独立心”的教育方针。他培养的人，一方面要掌握数、理方面的实学，另一方面要具有日本民族的独立精神，以便赶上西方。他三次出访欧美以后认识到，欧美一些国家称雄于世，民族独立心是重大动力。日本的落后，在于人民的民族独立心、自尊心不强。他把掌握实学知识作为确立民族独立心的手段。谕吉既倡导文明开化，崇实致用，必然向传统儒学宣战，否定儒学。他主张废除封建制度和等级观念，提倡自由平等和科学，通过教育和实学建立文明独立的国家。

福泽谕吉尊崇西方实学，同时又认为必须努力发展本国学校教育。他认为受教育是人人应有的平等权利。他赞同政府的《强制教育令》。

在学校教育中，他主张以“和谐发展”为目标，“学校设立的本旨，是促使能力的发育”。在体育、智育、德育中，体育摆在首位。他一贯主张对儿童的教育要从体育开始。他也重视智育和德育。他认为智育的任务一是学习以实学为主的众多学科，二是发展智力。关于道德教育，他注意有的放矢。他认为，明治维新中后期在日本几次发生德育争论，结果造成学校纪律涣散，学生道德颓废，教师品德低劣。这是学制不健全、放松德育的结果。他指出，“假如学校能实施德育，使学生都能因为羡慕教师的品德而入学的話，那么学校教育就会象私学、私塾一样具有力量”。他认为体育是智育和德育的基础，“智和体恰似身体的两个方面，分别支配着身体的一方，因而，没有孰轻孰重之别。”可见，他对德、智、体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精神。

他坚持严肃的治学精神，以身示范，教育和影响他的学生。他能做到兵慌马乱无所惧，炮声隆隆从不惊。他对庆应义塾精心管理，整顿塾风，制定塾规，要求塾生品行端正。义塾还规定了作息时间、课程表、卫生值日制度、食堂制度和课外活动制度等。由于他的良好管理，庆应义塾发展很快。1873年义塾仿照美国的中等教育制度，改学制为7年，称为正科；又设立专门讲授英语的别科。1890年创办大学部；1895年形成自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的系统学制。后来，又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今天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

福泽谕吉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看作是教育的三个组成部分。明治政府把重点放在发展学校教育方面，对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重视不足。谕吉看到了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对人成长的重要影响。他认为，社会影响恰似人周围的空气，会流动到学校，时时处处对学生发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关于家庭教育，他强调的是家庭习惯的影响。他说：“习惯比一般的教育更具有影响力，因此，每一个家庭就是一所习惯学校，父母就是教师，它远比学校式的讲授更具有力量，效果也相

当明显”。所以，家庭应具有良好的家风，父母应以身作则。谕吉作为家长，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福泽谕吉还主张破除陈旧习俗，积极提倡尊重女性，主张给女子以合适的教育和实行男女平等。

福泽谕吉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为日本近代教育制度的确立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活跃在日本各条战线，在明治维新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当然他所处的时代和日本的国内外环境，使他的思想必然存在着许多矛盾，晚年思想保守，对日本统治者推行的军国主义缺乏正确的认识，曾为日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胜利而欢呼。谕吉也是国家主义思想的典型代表，对此学者们褒贬不一。

(3) 森有礼的教育思想

生平。森有礼（1847—1889年），是日本明治初期的政治家、教育家。他是明治政府的第一任文部大臣、日本近代教育制度的奠基者。他所制定的日本学制一直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于1847年8月出生在鹿儿岛一个下级武士家庭，青少年时期就学于藩学造士馆和开成所（藩的洋学校）。1865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攻读数理化等学科，以后又转往美国学习。列强争雄的国际环境开阔了森有礼的眼界，也使他的报国之心日渐强烈。他极为推崇美国的政治制度，近代英美式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逐步形成了改革日本的设想。

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以后，森有礼怀着强烈的爱国之心从美国回到日本；同年7月，就任征士外国官权判事，次年被任命为政府的制度调查员。他24岁时出任驻美国公使，后又历任驻华、驻英公使。在美国期间他还担任日本在美国的学生监督。他特别关心日本教育，编辑出版了《日本的教育》一书。

1873年，森有礼与福泽谕吉等人创办“明六社”和《明六杂志》，传播西方思想文化，推动日本的近代化。1875年他开办商法讲习所（后改为高等商业学校），倡导实业教育。

1885年，伊藤博文内阁成立，他出任第一届文部大臣，全心致力于日本教育改革和国家主义教育制度的建立。他在任期间发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对日本教育事业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幸的是，1889年（明治22年）2月11日，森有礼应邀参加公布宪法的纪念活动，在离开官邸时，被一个宗教狂徒暗杀，次日身亡，年仅43岁。

主要教育思想。森有礼的教育思想属于国家主义。明治维新以前，他是个基督教徒，注重宗教教育。1880年以后，他接受了德国首相俾斯麦的国家主义思想。他认为德国的强大在于德国奉行国家主义思想，日本要改革落后状态，应该效仿德国。后来，森有礼把国家主义思想运用于教育，强调培养国家观念和忠君爱国的道德品质；主张为了国家富强和维护国家政体而办教育；应该以国家办学为重，并根据国家经济理论来办学。他认为国家是神圣的，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应该想到它，尊重它。他说：“国家这个概念虽然是无形的东西，但要把它如同佛和神一样予以尊重。人们不论在工作时或学习科学时，都要以国家的事情支配

和鼓舞自己的思想，除此之外，别无良策。” 1884年他所写的《对教育令的意见》，展现了他对学校体系的设想，尔后制定的一系列学校令使他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得以实施。

实业教育在森有礼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担任文部大臣以后，对实业教育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认为这是“富国强兵”的唯一途径。他明确指出，教育培养的人才“不能只空谈事物之道理，或只重视品德，而不充实社会知识，也不能只会读书、写文章、而毫无实际能力”。他要求培养的人才应该具备“与外国竞争”的能力。

森有礼就任文部大臣期间，积极促进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其标志是《帝国大学令》的发布。根据1886年颁布的《帝国大学令》，东京大学更名为帝国大学，要求东京帝国大学为国家推动学术发展和培养国家需要的有知识的领导者。森有礼深受德国大学的影响，主张学术自由，但他不赞同绝对的自由，“凡涉及到学术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放在最前面”。这表明他的学术自由是以国家主义为前提条件的。

森有礼尤其重视师范教育，注意改进师范教育。他认为师范教育是连接高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纽带。他指出：“国家教育振兴的第一要件，在得良好之教师，不由教师而由人民之自觉，欲使国运昌隆，终难实现。”

在他组织制定和颁布的《师范学校令》中规定：师范学校的目的是培养具有“顺良”、“信爱”和“威重”三气质的教员。他要求师范生穿军装，接受军训，过集体生活。《师范学校令》规定：不允许师范生按照个人兴趣选择专业、学科，必须根据国家的需要按规定学习；师范生享受助学金，但毕业后必须到指定的教学岗位去工作。许多来自中、下层农村家庭的学生毕业后都回到农村学校教书。

森有礼在任期间还颁布了《中学校令》、《小学校令》和《学位令》。《学位令》规定学位分为博士、大博士两个等级。博士有法学博士、医学博士、工学博士、文学博士和理学博士5种。他还制定了教科书检验制度、师范教育大纲等。他亲自到全国各地巡视教育，并建立了督学官制度。他的主要著作有：《宗教自由是人生所天赋的》和《日本教育问题》。

森有礼制定和实施的教育法令和制度对日本现代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教育思想在日本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他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忠君爱国的臣民，主张将军事体操引入师范学校中去，按照军事化的模式实施学校体育。这些，都为日本推行军国主义教育埋下了隐患。

2. 印度教育

印度的近代史是被英国征服而殖民地化的历史，也是印度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史。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一般以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为起点。印度的近代教育即殖民地时期的教育，也从此开

永井道雄：《近代化与教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页。

转引自《各国教育谈》，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9页。

始。

印度的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19世纪以前，在印度封建制度日趋解体和逐渐被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印度教育存在着多种形式，表现为一种过渡性的特征。到19世纪中叶，英国把印度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这一时期的印度教育除了保留其固有特征外，还带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

(1) 殖民地初期的教育

在殖民地初期，虽然西方传教士和东印度公司官员开始成为实施教育的主要力量，但是印度固有的教育制度仍占主要地位。

印度的教育长期以来一直分为初级教育和高级教育两段。初级学校主要由伊斯兰教、印度教等教派来兴办，国家提供资助。这类学校多设在寺庙。初级学校也有私人开办的。到19世纪初，一些比较发达地区（如马德拉斯、孟买、孟加拉等地区）大的乡村都没有初级学校，但儿童入学率很低。由于学校收费，穷人子弟不能上学。有些学校还受到种姓的限制。

17—18世纪的印度仍注重东方古典语文与宗教哲学的学习，对于欧洲各国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日益兴起的工业革命似乎无动于衷，更没有意识到它们可能给印度教育带来的影响和后果。初级学校仍主要教授读、写和普通的实用计算，讲授宗教神话和传说。有些学校教授梵语或本地语，有些学校则用波斯语或阿拉伯语教学，也有极少数学校教授英语。学校纪律森严，对有过失的学生严厉惩罚。教师水平很低，薪金微薄。

高级学校分为两类，一类称“维代拉亚”，用梵语授课；另一类称“迈达萨”，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授课。“维代拉亚”这类学校在教师家里办学，有些则设在捐款所建的房舍里，开设语法、古典文学、逻辑、哲学、法律及宗教经典等课程。“迈达萨”是伊斯兰教传统的高等学校，主要提供阿拉伯语或波斯语教育。

殖民地初期，欧洲传教士开办的学校，逐步改变着印度教育的结构。科钦学校是西欧人在印度创办的第一所学校，奠基人是葡萄牙传教士圣弗朗西斯·查威尔。后来，荷兰人、法国人、丹麦人及英国人也陆续在英国开办学校，其初始的目的是教育自己的子女和宣传宗教，扩展自己的势力。基督教义为主要课程。1789年英国人创办加尔各达印度学院和“迈达萨”学院；1791年在贝拿勒斯创办了梵文学院，培养法律专门人才。19世纪初年以后，为配合英殖民主义者对印度的全面征服，英国传教士大量涌入，争先恐后地开办教会学校。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也开始对印度教育表示关注。1814年6月，东印度公司首次宣布要给印度支付10万卢比的教育经费。1823年成立“最高教育委员会”。到19世纪20—30年代，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宗教团体和教会学校在印度迅速扩展，将西方近代学校的学科设置、教材乃至工作方式和制度传入了印度，促进了印度传统教育制度的改革。但是，外国教会学校的教育条件并不令人满意，他们并不关心印度人民的普遍教育。

在殖民地初期，印度新兴资产阶级开始探索和推行西方教育方式。从18世纪末年开始，用印度文字出版的报刊书籍逐渐增多。19世纪初，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罗姆·摩罕·罗易（1772—1833年）率先开

始宣传对印度的封建旧习进行改革，并主张普及现代教育。他赞赏西方科学和教学方法，但又试图把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结合起来。1817年他创办了第一所现代类型的学校——“印度学院”。一些热心教育的人士也开始陆续开办学校。1828年，在孟买创办了印度西部第一所为印度人设立的现代类型学校——“艾耳芬斯顿学院”，教授现代知识和英语。30—40年代一些文化团体开办的学校，提倡用本地语教学，提倡妇女教育和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这些教育活动反映了印度新兴资产阶级的成长和要求。

(2) 英国殖民教育在印度的确立

19世纪中叶，印度完全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当局开始在印度推行现代教育制度。早在1813年，东印度公司章程就规定了有关殖民地教育的条款。1833年，东印度公司的新章程法案决定为传教士在印度传教提供方便，增加教育拨款。拨款主要用于发展中学和高等学校，以培养殖民当局所需要的官吏、工商企业中的职员和医务人员等。这个法案对印度近代教育的发展有重要影响。1835年，印度总督本廷克签署一项协议，提出“英国政府的伟大目标应该是在印度居民中提倡欧洲的文学和科学，拨给教育的所有款项只能用于英语教育”。英国殖民当局采取了一系列保证英语教育为人们所接受并能迅速发展的措施。

印度总督府参事、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麦考莱(1800—1859年)，是对印度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他担任过孟加拉公共教育协会主席。他在1835年所写的《印度教育纪实》中对印度教育提出了一系列主张。麦考莱竭力宣扬西方文明和教育制度的先进性；主张在印度传播英国文化，排斥印度传统文化、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的传播。他认为英国文化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文化，竭力主张在印度推广西方教育和用英语教学，甚至停办原来学习东方文化的学校，以便集中经费开办英语学校和发展西方教育制度。麦考莱的教育思想为英国殖民教育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加速了印度教育殖民地化的进程。

随后，哈丁第一勋爵颁布了文官考试制度，规定优先录取英语知识优秀者为公务人员；使英语教育成为印度人谋求高级职位的唯一手段。

1854年，英国国务大臣查尔斯·伍德提出一个教育新方案，称为“急件”，主要内容是：在印度各省设立公共教育部；三个管区城市（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和孟买）各创办一所大学；设置补助金，对符合条件条件的教育机构给予财政补助；建立上下衔接的学校制度；英语为教学语言。这个文告对印度教育发展提供了蓝图，也为印度教育殖民地化和西方化奠定了基础。

根据《教育急件》的规定，仿照伦敦大学的模式，1857年印度创办了加尔各答大学、孟买大学和马德拉斯大学；1882年和1887年又创办了旁遮普大学和阿拉哈巴德大学。但这时的大学主要是一种考试机构。它们对自己所属学院规定课程、组织考试和授予学位，教学则由学院进行。这种学院隶属于大学的制度被称为附属学院制，是印度高等教育的主要类型，延续至今。

1854年后成立的各省教育部推动了印度中等教育的发展。教育部除了自己创办中学外，还大力促进私人办学。1871年印度仅有中学133所，

到 1882 年增至 209 所。另外，在 50 年代还先后开办了几所技术学校和 3 所医学校，初级学校也有较大增长。

总之，1854 年以后，印度教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由于殖民主义者对印度文化教育的轻视，印度原有的学校受到严重打击，本国文化教育传统受到严重摧残。整个印度教育被英国殖民当局所控制。

(3) 英国殖民教育的强化和印度反殖民教育的发展

为了巩固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英国政府在全印度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殖民教育措施，以培养亲英上层分子。但对 1854 年的《教育急件》，印度政府并未认真付诸实施。1882 年以威廉·亨特为首的教育委员会成立，这是英国直接在印度建立的第一个教育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任务是调查印度初等教育状况，并提出建议。委员会强调初等教育主要是公共教育，应对学生今后的生活有所帮助；初等教育课程应包括农业、财会、医学急救等内容，并用本地语和印度语进行教学；为提高初等教育水平，应开办师范学校，培养合格师资。委员会对中等教育也提出一些建议：政府应通过补助拨款扩大中等教育；中学课程分为甲乙两种（甲种课程为升入高等学校作准备，乙种课程则是职业的和实用的学科）。对于高等教育，委员会强调应视各地情况，由政府资助开办一些多种课程的学院；为提高学生的品德，应编写宣传宗教原则的书籍；印度人作高等学校教师必须受过欧洲大学的教育等。

这个“亨特委员会”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度初等学校的发展和中等教育的改进。但是，它是代表英国殖民当局意志的一个教育机构，它的政策建议是为英国殖民统治服务的，使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教育制度得以进一步强化。

随着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加强和印度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度人民和资产阶级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也不断发展。这一斗争也反映在教育方面。在 19 世纪 80 年代前后，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瓦苏德夫·巴尔万特·帕德克领导了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在斗争的初期，帕德克就创办了一所学校，并在青年中进行反英宣传教育。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不仅提出了独立发展印度政治和经济的的要求，而且要求扩大接受欧洲式教育的机会，反对种族歧视。有些左翼人物还提出了独立发展印度教育的要求。也有一些人士不希望根本触动英国殖民统治的基础，而只是通过扩大教育来改善印度人民的处境。他们也创办了一些学校，提出要培养真正的印度爱国主义者。

在孟加拉，印度教徒开展了包括改革教育在内的改革运动。他们希望印度青年能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倡议兴办学校。有些教派组织坚决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并试图把反英宣传和普及教育结合起来。他们希望通过摆脱殖民教育来达到推翻殖民统治的目的。1867 年伊斯兰教徒穆罕默德·卡斯米创办的宗教学院，就不学习英语，对就学人员也没有任何宗教和财产的限制。

1885 年印度国民大会党成立。这是一个代表上层资产阶级和具有民族主义情感的地主利益的政党。该党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给予了揭露和批判，他们要求发展印度民族资本主义和增加参政机会。因此，国大党也要求推广印度的现代教育。到 19 世纪末年，英国殖民者为了维护

垄断资本的利益，加重了对印度人民的剥削，加上连年的病疫和灾情，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不堪，学生大量失学，学校数量也大大减少，要求发展民族教育的呼声更加高涨。这种形势迫使英国殖民当局不得不采取一些改进教育的新措施。但从总体来看，印度的初等教育到 20 世纪初还是极其落后的，男孩的入学率只有 2.38%，女孩入学率只有 2.07%。1913 年，殖民政府颁布了关于印度教育政策的法令，被迫对殖民地初等教育发展承担义务。

在英国统治印度的初期阶段，印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传统文化遭到破坏，英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有序发展受到阻碍；同时，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传入印度，对印度社会、教育和宗教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给予印度古老的陈规陋习以巨大冲击，为印度近代民族解放运动和现代文明建设奠定了基础。

十、世界语言文字的发展及研究

1. 各种语言文字的发展

(1) 英语词汇量的扩大和地区性变体

英语是世界上通行最广的语言之一，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早在 17 世纪，英语就开始向北美扩展。18 世纪，英语的使用在印度、澳洲、新西兰各地逐渐扩大。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往给英语带来许多新词汇。特别是 19 世纪产业革命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创造了不少新词，而英语本身又具有开放性，使得英语词汇持续增长。突出的是大量出现短语动词，即用一个简易的动词加上副词或介词组成短语，来代替一个较艰深的动词。例如，以 put off 代替 postpone，以 keep on 代替 continue，以 put up with 代替 tolerate 等。然而，这并不是简单的代替，而是同时并存和互相补充。

据统计，古英语的词汇只有 5 万—6 万个，而收入《现代英语大辞典》的词条多达 65 万—75 万。近代西方最大的词典《牛津英语词典》收取 1150 年以后曾见于英国文献的词 414000 个，每词有引语为证，按年代列明词的意义和形态的演变，共计有 1827000 条。值得一提的是，这部词典早在 1857 年就有人倡议编纂，约在 1884 年真正着手工作，1928 年成书，共 12 卷，又补编 1 卷。此书出版后成为英语民族的骄傲，各国也相继仿效，编排出版了类似的词典。

由于英语的使用范围极为广泛，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地区性变体。甚至有的语言学家已不再把伦敦或英国上层人士的英语作为唯一的标准英语，而只把它看作地区英语之一。除英国英语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英语。美国在 18 世纪建国之后，本土语言仍以英语为宗，美国学者最初称它为“在美国的英语”，现在通称为“美国英语”。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在语音上有相当明显的差别。在现代，由于美国大众传播媒介迅速发展，美国英语反过来对英国英语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加拿大英语、澳洲、新西兰英语和南非英语也都各有自己地区性的语汇和语法。印度英语、东南亚英语、加勒比地区英语和非洲某些新兴国家的英语，在语音和词汇方面也都有自己的特点。

(2) 法语的变化

法语也是重要的国际语言，除法国外，世界上还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以法语作为官方语言，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使用人口超过 1 亿。早在 17、18 世纪，欧洲很多国家的宫廷和上层社会还以使用法语为时尚。18 世纪启蒙运动兴起，百科全书派为了表达科学研究中出现的新事物和新概念，创新了不少技术词语，对来自农村和工场的方言俗语也予以吸收。19 世纪浪漫主义等流派的作家，大量吸收生动活泼的语言，增强了法语的表达能力。另外，向其他语言借词或借用词缀也是法语丰富词汇量的重要途径之一。大部分借词来自拉丁语、希腊语和英语。19 世纪在法国曾有过英语热。各种英语借词出现在法国报刊、广告和科技著作中。有些英语借词甚至连读音都不加改变地进入法语，以致有了“英

式法语”之称，这引起了纯语主义者的忧虑。但是，也有人认为，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同语言的相互影响是正常的。

(3) 德语的发展和贡献

德语也是世界上影响范围较广的语言之一，全世界使用德语的人口约 1.1 亿，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

现代德语标准音到 19 世纪末才形成。德语对世界文化有过明显的贡献。早在 16 世纪，马丁·路德所译《圣经·新约》对现代德语共同语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他的启发下，用北欧诸语言译出的《新约》都在本国发挥了语言的规范作用。19 世纪的德国哲学提供了启迪人们心智的概念和术语，至今涉及到哲学问题往往还要采用德文原词以明本义。由于德国的医学和化学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促使其他国家这些学科的科学工作者必须学习和掌握德语。

(4) 一些国家标准语的形成和语言变化

19 世纪是一些国家标准语形成的时期。其中有挪威语、阿非利堪斯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摩尔达维亚语、俄语、乌克兰语、斯洛伐克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芬兰语及马达加斯加语等。

挪威语经历过漫长的变化。现代挪威书面语有两种不同的规范：布克莫尔语和新挪威语。布克莫尔语的前身叫里克斯莫尔语，新挪威语的前身称兰斯莫尔语。在历史上，公元 1380—1814 年为丹麦—挪威联盟时期，里克斯莫尔语就是这个时期在书面丹麦语的强烈影响下形成的一种丹—挪混合语。1814 年挪威摆脱丹麦的统治，国民强烈要求把里克斯莫尔语挪威化。著名作家易卜生（1828—1906 年）等对语言改革给予有力支持，里克斯莫尔语经历 3 次拼写法改革，更多地体现了挪威民族语言的特点。兰斯莫尔语是挪威语言学家奥森（1813—1896 年）于 19 世纪中叶所拟，其目的是为维护挪威本族语的传统。他以挪威口语方言为基础，编出了语法和词典，1885 年终于取得官方承认，被称为新挪威语。

阿非利堪斯语又称南非荷兰语。在欧洲移民到达南非的 200 年间，这种语言只有口语，到 19 世纪中叶逐渐形成了标准书面语。

1870 年意大利成为统一的王国后，意大利语便成为全国的标准语。近代罗马尼亚语是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使用的语言。1860 年以前罗马尼亚语采用基里尔字母，后改用拉丁字母，有 5 个加变音符号的特殊字母。摩尔达维亚语是原苏联境内唯一的罗曼语，其标准语开始于 16—17 世纪，形成于 19 世纪后半叶。其文字 19 世纪以前以基里尔字母为基础，20 世纪以来使用俄文字母，并有了规范语法和正字法。

17—19 世纪初，随着俄罗斯民族的形成，俄语发展为民族语言。从诗人普希金（1799—1837 年）时代起为现代俄罗斯标准语开始时期。除普希金外，莱蒙托夫（1814—1841 年）、果戈理（1809—1852 年）、屠格涅夫（1818—1883 年）、托尔斯泰（1828—1910 年）和契诃夫（1860—1904 年）等著名作家也为俄罗斯标准语规范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在各个历史时期，俄语也借助外来词汇扩大了词汇量，科技领域的外来词更多，在 18 世纪初多借自德语，19 世纪多借自法语，20 世纪中叶以后多

借自英语，尤其是美国英语。

在乌克兰语形成标准语的过程中，作家科特里亚列夫斯基（1769—1838年）和谢甫琴科（1814—1861年）等人的创作为现代规范的乌克兰语奠定了基础。

19世纪40年代，斯洛伐克语规划者、文学家什图尔（1815—1856年）把斯洛伐克语中部方言加以规范化，称“什图尔斯洛伐克语”，1815年被宗教界和文化界多数人士认可为共同书面语。1863年，在马丁城建立的斯洛伐克联谊会决定加以推广，此后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什图尔斯洛伐克语被各阶层公认为全民族的标准语。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斯洛文尼亚语，这两种语言都是南斯拉夫的官方语言。19世纪中叶，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两地的改革者签订协议，定名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或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这一语言的奠基人是武克·卡拉季奇（1787—1864年）。斯洛文尼亚标准语的形成早于前者。19世纪初叶，在以卢布尔雅那市为中心的中央方言基础上，形成了统一的现代斯洛文尼亚标准语。马其顿标准语是于19世纪初在西部方言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芬兰语书面语始于16世纪，1809年成为官方语言之一。1835年，杰出的民歌古诗搜集家和研究家兰罗特（1802—1884年）将民间传说、神话和歌谣编成了一部民族史诗《卡勒瓦拉》（亦译《英雄国》）。这一作品的问世标志着波兰语成为一种标准语言。

马达加斯加语和非洲大陆的语言没有亲属关系，属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它是马达加斯加岛国的官方语言，自1820年以来，在梅里纳方言的基础上形成标准语。

在19世纪，冰岛语、丹麦语、波兰语和希伯来语也都经历了重要变化。冰岛语是冰岛的官方语言。有的语言学家称它为欧洲“最保守的”语言之一。它曾吸收过丹麦语、凯尔特语、拉丁语和罗曼语的一些词语。但19世纪以后，由于纯语主义运动的开展，许多外来词反倒让位给冰岛语词。科学和工程术语也用冰岛语成分构成。语法的变化和词性的区别均保留着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即古诺尔斯语）的特点。约从1700年以后为晚期近代丹麦语发展阶段。它从意大利、荷兰、德国、英国、美国吸收了大量有关文化和科技的词汇。1889年第一部丹麦语拼写法问世。

19世纪也是波兰人民为纯洁和丰富本民族语言而奋斗的年代。密茨凯维奇（1798—1855年）和显克维奇（1846—1916年）等文学家对近代波兰文学语言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希伯来语是以色列的通用语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希伯来语及其文化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并且在世界许多地区，它一直是把宗教和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的犹太意识的深刻根源之一。在公元200年左右，希伯来语口语逐渐消失。它作为犹太人口语的地位被阿拉米语、阿拉伯语和一些欧洲语言所取代。中世纪和18世纪之间，希伯来语除了引进某些依地语成分外，变化不大。但1882年初，犹太人在后来成为以色列人留地的地方重新定居，复活一种共同语成为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希伯来语口语得以新生。俄国犹太青年埃利泽·本耶胡达为复活希伯来语奔走呼号，并在各种场合带头说希伯来语。到19世纪后期，希伯来语便成为一种以书面语言为基础的口头语言，词汇量也在不断增加。

19世纪，越南、朝鲜和日本都提出了文字改革问题。1885年，越南南方首先成为法国殖民地，中小学开始教学拼音文字。朝鲜使用汉字约有一千七、八百年之久。在朝鲜文化发展过程中，要求更完备的文字，后来出现了“谚文”。1894年后，汉字和谚文混合体成为政府公文用的法定文字。日本的文字由汉字和假名两套符号组成，并混合使用。相传汉字于公元4—5世纪由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成为古代日本的官方文字。后来日本人发明了假名（为音节符号），与汉字混合使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有意识地进行文字改革，推广标准音。1866年日本的文改运动者提出废除汉字，1872年提出改用罗马字。

(5) 国际语音协会和国际音标的制定

国际语音协会是语音工作者的一个国际组织，会址在伦敦，其宗旨是促进语音学研究，并将其成果运用于语言教学及文字制定或改革，鼓励研究罕用语言的现代读音，并改进标音法。现有会员涵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800多人，以美国人和英国人居多。

协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86年初。当时法国语音学家帕西和本国一批英语教师组织了一个“语音教师协会”，出版会刊《语音教师》。帕西任协会主席和会刊主编。同年6月后，丹麦的叶斯泊森、德国的费尧特、英国的斯维特和瑞典的龙德尔等学者相继入会，协会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组织。1888年1月，协会成立了第一届国际理事会，其中有法国、英国、德国、奥地利、比利时、挪威、瑞典、丹麦、冰岛、芬兰、美国和加拿大的代表。1889年，协会决定改名为“当代语言教师语音协会”，以法语为会内正式语言，会刊亦以法语命名，1897年协会再次易名为“国际语音协会”（简称API）。

国际语音协会的一大功绩是创制和提倡使用一套国际音标。鉴于当时语言注音方案紊乱，妨碍研究工作和教学，为了统一记录语音的符号，国际语音协会从1886年到1888年，经过两年的磋商和研究，制定出一套国际语音字母方案。这个方案由英国的斯维特倡议，由法国的帕西和英国的琼斯等人完成，1888年刊登在该协会的刊物《语音教师》上。这是历史上第一个国际音标表。这套音标经过多次修订，不但广泛应用于语音学专著，而且越来越普遍地适用于语言课本和词典。

由于这个国际音标表是英、法两国学者创定的，主要适用于标注印欧语言、非洲语言和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它问世后在欧洲语言学界比较通行。美国人多数仍用他们自己研究美洲印第安语的符号，汉语各方言中的有些语音，本表也无法包括。但无论如何，这些音标和一些附加符号基本上满足了描写世界各语言中语音的要求。

(6) 世界语的创立

世界语是一种国际辅助语，由波兰医生柴门霍夫（1859—1917年）创制。柴门霍夫是犹太人，生于俄国统治下的波兰，对民族压迫之苦深有感受。他认为民族之间语言不通是造成民族隔阂和仇恨的原因之一，并立志创立一种各民族通用的语言，以促进各族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柴门霍夫在中学毕业时就写出了一种国际语方案，但他父亲坚持让他到外地学医，并且在他离家后烧了他的国际语手稿。但他不改初衷，重新

设计了一套方案，并于 1887 年以 Esperanto（意为怀着希望的人）为笔名发表了他的国际语新方案。以后人们即以 Esperanto 为语言名。1905 年举行了第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确定柴门霍夫所著《世界语的基础》一书为该语言的准则。世界语因而得以维持其统一性和稳定性，成为功能健全的语言。许多世界名著都译成了世界语。柴门霍夫本人翻译了《圣经·旧约》和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等书；后来还出现了一批直接用世界语写成的作品。

2. 语言研究

(1) 语言研究概况

研究语言的科学称为语言学。语言学的名称始于 19 世纪中叶，它强调语言研究的新方法以区别于传统语文学方法。语文学者主要关心语言书面文献以及与文学、文化有关的语言和历史发展。语言学家更着重研究口头语言，分析它在某个特定时期所起的作用。语言学者研究世界上的一切语言，而限于几种文学语言。从语文学发展到语言学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西方，17 世纪的法国学者写出了《理性语法》，把语法和逻辑联系起来。19 世纪的学者发展了历史比较研究法，构拟了印欧语系诸语言的谱系。印欧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吸引了 19 世纪欧洲语言学家的最大注意力，并取得了辉煌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语音历史演变的规律方面。

19 世纪欧洲语言学家把世界上的语言分成孤立、粘着、屈折三种类型，并且认为这是语言进化的三个阶段。汉语被认为是孤立语的典型，至于它是代表语言发展的低级阶段还是高级阶段，众说不一。

19 世纪为语言学家们展现了广阔的天地，他们利用当时的条件，大力开展历史比较语言研究，同时，语言类型研究、民族语言心理研究、方言研究和语音研究等领域也有很大进展，并涌现出一些有影响的语言学家。

这一时期，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亦有重大发展，周秦音研究、隋唐音研究、古训研究、文字研究都有突出的进展。1899 年以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甲骨文研究。随着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和外交官写了一些关于汉语语法、音韵和方言方面的书。在其影响下，中国人也开始研究语法。1898 年马建忠所写的《马氏文通》出版，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书。

(2) 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新语法学派

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变化。研究这类语言变化规律的学科称作历史语言学。历史语言学中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对不同语言或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发展阶段作比较分析。运用这种比较方法研究语言历史演变的学科称作历史比较语言学。

历史比较语言学起源于 18、19 世纪的欧洲，重点研究印欧语系诸语言的语音系统。1786 年英国语言学家琼斯在对梵语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梵语同拉丁语和希腊语之间存在着有系统的对应关系。例如就词首辅音而言，“三”在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中都是 t，即 trayas、treis，

tr s; “父亲”一词首辅音都是 p, 即 pitar, pater, pater. 这种系统的对应现象非常普遍, 绝非偶然因素。琼斯认为, 要解释这种现象, 只有认为它们共同源于现在也许已经消亡了的某种语言。后来丹麦学者拉斯克、德国学者博普、格林等在更多的语言中发现了类似的对应现象, 并推测出它们的共同起源——原始印欧语的表现形式。

在上述学者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19 世纪 70 年代德国莱比锡大学的一批学者把当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总结, 正式为历史比较语言学提出系统的理论原则和研究方法。他们是布鲁格曼、奥斯特霍夫、德尔布吕克、莱斯金、保罗等。他们的新见解引起老一辈语言学家库尔蒂乌斯等人的不满, 并被讥讽为“青年语法学派”。他们因此而得名并欣然接受了这个名称, 在语言学界, 现一般称“新语法学派”。他们提出的最重要原则是语音规律无例外论。语言学界起初对这一原则普遍持怀疑态度, 但后来终于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并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中占主导地位达半个多世纪之久。新语法学派还注意到了语音演变的心理因素。这个学派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影响很大。丹麦的汤姆逊和维尔纳、俄国的福尔图纳托夫都自称属于这一派。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最大成就是对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尤其是在印欧语系的系谱分类方面获得了相当确凿的证据。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工具, 它不仅可以用于印欧语系的语言, 也可以用于其他语言。这一科学方法在 20 世纪以后为中国语言学家及瑞典汉学家采用, 初步确认了汉语和有关语言的亲缘关系。

(3) 外语教学研究和翻译理论

外语教学在促进文化交流和语言发展中有重要作用。外语教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 在近代更有发展。西欧把外语教学区分为古典语言与现代语言教学两种, 前者指古希腊语和拉丁语, 后者指西欧的主要民族语言, 如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17、18 世纪西欧的外语教学以古典语言为主; 19 世纪以后现代语言教学逐渐取代了古典语言教学。古典语言教学主要采取语法—翻译法, 强调以熟记语法规则和单词为手段, 通过逐字逐句的翻译来训练阅读和写作的能力。1880 年欧洲兴起了外语教学改革运动, 许多语言学家都认为古典语言教学法难以适应现代语言教学的需要, 提出改革。1887 年国际语音协会提出 6 项原则: 主张外语教学应从日常生活口语开始; 要让学生熟悉语音、常用的句子和习语; 语法教学要用归纳法; 要让学生用外语思维; 写作训练要先模仿后创作; 笔头翻译应在提高阶段进行。随之体现这些原则的直接教学法产生并付诸实践。国际交往的频繁使外语教学日益显得重要。

外语教学为翻译活动提供了条件。翻译这种语言活动, 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进行, 它又影响到文化和语言的发展。在欧洲, 翻译实践有长远的历史。翻译《圣经》为许多国家的语言奠定了基础。欧洲古代和近代许多名作多次被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 许多东方文学作品也都译成了欧洲的语言文字。实践产生理论。随着翻译实践的发展, 各种各样的翻译理论应运而生, 主要的两种理论观点是翻译可能论和翻译不可能论。其实, 百分之百的可能和百分之百的不可能都是不可能的。此外, 翻译

理论中还有直译和意译的争论。

中国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历史悠久。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有识之士痛感学习西方之必要，外语教学和翻译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867年官办的译书机构翻译馆筹办，它附设于上海江南制造局，前后近40年，共译出图书一百七、八十种，直译和意译是中国翻译家争论的主要问题。

(4) 数理语言学

数理语言学是应用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来研究语言现象的一门新兴语言学学科，它使语言学与现代数学、计算机科学、控制论以及人工智能等学科联系密切。1847年，俄国数学家布利亚科夫斯基认为可以用概率论来进行语法、词源及语言历史比较的研究。1894年，瑞士语言学索绪尔提出，可以用数学公式有规律地表达语言中的量和量之间的关系。他又把语言学和几何学系统和只有复杂项的代数相比。1904年，波兰语言学家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提出，语言学将根据数学的模式更多地扩展量的概念，并将发展新的演绎思维的方法。

数理语言学是语言学发展实践中提出的客观要求。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数理语言学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它是20世纪的重要科学成果，而上述科学家和学者所提出的理论为这一新兴学科的建立开拓了思路。

(5) 著名语言学家

洪堡特（一译洪堡，1767—1835年），德国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政治家和语言学家。在语言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研究过巴斯克语、美洲语言、埃及语言、梵语、汉语和日语等，是比较语言学创始人之一。主要语言学著作有《论爪哇岛的卡维语》，其前言部分被认为开辟了语言学研究的新道路。

洪堡对民族语言和民族心理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语言有“外部形式”和“内部形式”之分。外部形式指语音，无民族区别；内部形式是语义和语法结构，因民族而异。他指出，“语言不是一个实体或已完成的事物，而是行动”，是人的心灵不断地用声音来表达思想。民族语言具有本民族的精神特征，用特殊方式来实现本民族关于语言的理想。

语言是人的一种能力。他认为，人会说话是人不可缺少的心智能力。这种能力使语言能适应环境，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不管你怎样分析语言，总有一些东西分析不出来。

洪堡把世界语言分为屈折语、粘着语和综合语三种，不包括汉语。他认为梵语每一个词都结构紧密，是最发达的语言；汉语虽然在单词方面没有语法形式，却给人以深刻的庄严感。洪堡的语言学理论对后人很有影响。他的学生斯坦塔尔和心理学家冯特深受他的理论启发；近年来致力于欧洲语言学研究的魏斯贝格尔等组成“新洪堡特派”；美国的萨丕尔和沃尔夫也与洪堡的思路一脉相承。

格林（1785—1863年），德国语言学家和民俗学家。他曾任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的图书馆馆长、耶拿大学教授和普鲁士科学院院士。格林

所著《德语语法》（4卷）是一部历史语法，后人称为日耳曼语言的基本教程。他还写成了《德语史》，并与其弟合作编纂了《德语词典》。

在1822年的《德语语法》修订版中，格林提出了印欧诸语言语音演变的规则，后人称之为“格林定律”。他自己并不认为这就是定律，相反，他倒认为“音变是一般趋势，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如此”。他所确立下来的规则来源于拉斯克的基本思想和素材，他增加了许多例子予以充实，并写出了清楚的公式。他所提出的“定律”基本正确，后来维尔纳又进行了补充和发挥。

博普（1791—1867年），德国语言学家，普鲁士科学院院士。他早年攻读和研究梵语。他的第一篇论文是《梵语动词变位同希腊、拉丁、波斯、日耳曼等语言动词变位的比较》（1816年）。他研究了这些语言的亲缘关系，认为古代欧洲诸语言与印度的梵语同出一源，只是原始语言的形态在梵语中保持得更好。后来他把比较范围从动词变位扩大到名词、代词变格，并注明各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编成了他一生的主要著作《梵语、古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哥特语和德语的比较语法》，1833—1839年分卷出版。以后又增添了古斯拉夫语、凯尔特语和亚美尼亚语。他还著有《梵语语法》（1827年）和《梵语词汇表》（1830年）等书。他与拉斯克及格林一样，都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创始人。

施莱歇尔（1821—1868年），德国语言学家，是19世纪中期在历史比较语言学领域影响最大的人物。他熟悉多种语言，如斯拉夫语、立陶宛语、捷克语等。他最重要的著作是《印度日耳曼诸语言比较语法纲要》（1861—1862年），这一著作作为后来的新语法学派开辟了道路。他把语言分为3类：孤立语（如汉语）、屈折语（如印欧语）和粘着语。他还提出“谱系树”模式。他把原始印欧语比作树干，由此生出两支：一支是斯拉夫—日耳曼语支；另一支是雅利安—希腊—意大利—凯尔特语支。从这些语支再分别生出日耳曼、立陶宛、斯拉夫、凯尔特、意大利、希腊、伊朗等语言。这个谱系树模式为后人所采用。施莱歇尔还著有《立陶宛语手册》（1856—1857年），是第一本科学描述立陶宛语的书。

拉斯克（1787—1832年），丹麦语言学家，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之一。1807年毕业于哥本哈根大学。1811年丹麦科学院设奖征求有关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源流的论文。拉斯克到瑞典和冰岛实地调查，历时3年，1814年完成论文并获奖。他的论文《古代北方语即冰岛语起源研究》，举例证明了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冰岛语塞音的对应关系，并揭示了这3种语言的词形的相似性。他的思想和素材为“格林定律”的提出奠定了基础。1816—1823年，他到俄国、波斯、印度各地旅行，就地学习各种语言，从而对印欧语言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后来他又写出了冰岛语语法、古英语语法和弗里西亚语语法等书。

波斯塔尼（1819—1883年），黎巴嫩语言学家，近代阿拉伯文艺复兴的先驱之一。他精通阿拉伯文学，熟悉多种语言，如古叙利亚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等。他协助美国传教士将希伯来语《圣经》译成阿拉伯语，了阿拉伯语两卷本大词典《新词海》及其缩编本《词海点滴》、语法专著《明灯之钮》。他还编著了阿拉伯《百科

全书》前7卷。

惠特尼(1827—1894年),美国语言学家。他1848年在耶鲁大学学梵语,后与德国学者共同研究梵语并与他们合校梵文经典,1854年回耶鲁大学教梵语,直到1894年。他著的《语言的生命与发展》(1875年)及《梵语语法》(1879年)很快被译成法文本和德文本,受到欧洲学者推崇。德国语言学家德尔布吕称赞他的《梵语语法》是“我们有的最好的梵语语法”。惠特尼被认为是美国梵语研究的开路者。他主编的百科性《世纪词典》(6卷,1889—1891年)以解释精详而著称。

波铁布尼亚(1835—1891年),乌克兰与俄罗斯语言学家,语文学家,哈尔科夫大学教授,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他主要研究普通语言学、俄语以及其他斯拉夫语、语文学、民间文学、诗歌和人种史。早期受洪堡特和斯坦塔尔影响,侧重从哲学和心理学角度研究语言,后来着重研究各斯拉夫语的方言、语音和语法等问题。其代表作是《俄语语法札记》(共4卷),详细阐述了关于词、语法形式、语法范畴等基本问题。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1845—1929年),波兰语言学家,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俄国彼得堡大学语言学博士,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他的主要贡献是建立音位学说,是现代音位学的先驱者之一。他越过德国学者偏重历史比较研究的樊篱,提出了一些为现代语言学所关心的问题,如语言的系统性等问题。他把语言看作心理社会现象,认为语言学属于心理—社会科学。他的学术视野相当广阔,能用波兰语、俄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写作。一生共写了600多篇(或本)论文及专著。

3. 汉语的发展与研究

(1) 书面语的变化及词汇扩充

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汉语的标准语是近几百年来以北方官话为基础形成的,它的标准音是北京音。汉语的标准语在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称为国语,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称为华语。

汉语的书面语和口语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有很大差别,人们口里说的是白话,笔下写的是文言。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叶。不过作为书面语的文言在2000年的历史发展中本身也有变化。清末梁启超曾运用浅显的文言文来写政论文章,由于通俗易懂,风行一时,广为报刊杂志所采用。

汉语词汇在近代有很大发展。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被迫打开,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动荡和变革,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新事物和新概念不断出现,推动了汉语词汇的增加和创新。从1898年戊戌变法以后的几十年间,汉语增加了许多新词,其中有的是自创新词,有的是借用日语汉字词,也有的是吸收印欧语词。19世纪下半叶,以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为中心翻译了大量科学技术著作,引进了大量科学术语,例如,徐寿在译《化学鉴原》之前,中国只有一些最普通的化学元素名称,如金、银、铜、铁、锡、氧

气、氢气、氯气等。《化学鉴原》一书开始使用按照西文第一音节创造新字的命名原则，于是出现了钠、钾、锌、钙、镁等词。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严复在翻译新名词时，一面选用意译词，同时又创造了不少音译词。同期，胡以鲁在《论译名》一文中一方面力主意译，同时也提出不妨音译的10类词。这说明汉语词汇在扩大，也表明术语的提出和规范化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

到了清末，要求译名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1909年5月，学部上奏宣统皇帝，建议派候选道严复编定各科中外名词对照表及各种词典，9月复奏设编订名词馆，严复为总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审定学术名词的统一机构。

(2) 切音字的产生和威妥玛式拼音

汉字切音字产生在清末变法维新的历史浪潮中。当时，民族危机严重，一些人把中国跟西方国家和日本等国相比，感到中国落后了，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教育。他们看到西方国家和日本富强是因为教育普及，教育普及是得益于文字简易，也就是“切音为字”。于是，一些有维新思想的人也纷纷创制中国的拼音文字，用来辅助汉字，推动普及教育。宋恕是第一个有这种想法的学者，在1891年写成《六斋卑议》。该书指出：“江淮以南须造切音文字多种，以便幼学。”他还主张仿效日本，实行强迫教育，儿童入学，先教拼音，后教汉字。1892年，卢懋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在厦门出版，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切音字方案。这个方案的字母采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拼厦门音，增加声韵后可兼拼泉州和漳州音。从此开始了中国人自觉的拼音化运动。在此之前，有过外国传教士发动的中文罗马化。根据“切音新字”，清末的拼音化运动称为“切音字运动”。从发表切音新字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的20年间，有近30种拼音方案提出，其中汉字式字母占2/4，速记符号式或拉丁字母各占1/4。

从清末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之前，在中国国内和国际上最流行的中文拼音方案是威妥玛式拼音，又称“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威妥玛（1818—1895年）是英国人，从1841年起在英国驻华使馆工作，1871年升为英国驻华公使，1883年回国。他在华任职期间，为了外国人（主要是使用英语的人）便于学习和掌握汉语、汉字，先后写成《寻津录》（1859年）和《语言自迩集》（1867年）两部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威妥玛用他根据北京读书音制定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给汉字注音。这个方案以后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等，一般称为威妥玛式拼音。

后来，英国驻华外交人员翟理斯（1845—1935年）在他所编著的著作中采用威妥玛式拼音给汉字注音，故有“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之称。他的著作主要有《语学举隅》（1873年）、《字学举隅》（1874年）和篇幅巨大的《华英字典》（1892年上海初版，1912年伦敦再版）。《华英字典》后来成为当时邮电部门拼写中国地名的主要依据。

(3) 语法学和文字学的研究

19世纪末，语法学的研究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尤其是虚词的研究。

1898年，第一部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书——马建忠（1845—1900年）所著《马氏文通》问世。作者在序言中表明写作之目的在于帮助人们阅读古书和使用文言。全书引证古文达七、八千句，可谓集文言句式之大成。其研究方法，模仿印欧语法建立体系，同时也注意了汉语的特点，在许多地方突破了西方语法的框架。《马氏文通》给后来的汉语语法研究以深刻的影响。它重视句法，此点与当时详于词法的西方语法书明显不同，这与汉语缺少词形变化的特点是相一致的；词类划分着重意义标准，并把助词单列一类，认为“助词”为“华文所独”。《马氏文通》出版以前，汉语语法研究只是萌芽，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马氏文通》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有开创之功。

中国的文字学在清代有很大发展。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集录铜器铭文的，在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之后，有吴式芬（1796—1856年）的《捃古录金文》，吴荣光（1773—1843年）的《筠清馆金文》，方濬益（？—1899年）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等。著为图录的，有吴大澂的《恒轩吉金录》，刘喜海的《长安获古编》等。刘心源的《古文审》、孙诒让的《古籀拾遗》、《籀廌述林》、《古籀余论》等书对研究金文都有独到贡献。清光绪25年（1899年）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使古文字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王懿荣、刘鹗首先开始搜罗甲骨。刘鹗印出《铁云藏龟》一书；孙诒让开始辨认甲骨文，写出《契文举例》，后又写出《名原》，对汉字的发展有了更多的理解。文字学家王筠（1784—1854年）著有《说文释例》20卷，《说文解字句读》30卷，《说文系传校录》30卷。

（4）晚清著名的语言学家

陈澧（1810—1882年），中国清代音韵学家，字兰甫，号东塾，广东番禺（今广州）人。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举人，曾任河源县训导，作学海堂学长数十年，晚年主讲菊坡精舍。他创造了一种新的音韵研究方法，即反切系联法，用以考证《切韵》的声类、韵类。他用这种方法，通过《广韵》考定出《切韵》有40声类，311韵类。他的主要学术著作有《东塾读书记》、《切韵考》、《说文声表》、《东塾记》等，涉及经学、小学、天文、地理、乐律和算术等多方面内容。他还善长诗文，作有《忆江南馆词》。

江有诰（？—1851年），清代音韵学家，字晋三，号古愚，安徽歙县人。他是全面、深入、系统研究古韵的学者。他既善于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能运用大量新材料来解释具体问题。他最初把古韵分成20部，后来看到孔广森东、冬两部分立，很表赞成，增加到21部。他以等韵作为辅助手段，从一字两读、谐声偏旁和先秦韵文押韵3个方面来分析古韵，从而彻底解决了平入相配和四声相配问题。从而勾画出先秦语音系统的全貌，同时对古韵构拟有重要意义。他的《谐声表》对后来古音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他是第一个肯定古音有四声的学者。他的著作有《音学十书》。

朱骏声（1788—1858年），清代文字训诂学家，字丰艺，号允倩，江苏吴县人。他博览群书，娴习经史，善作诗赋词章，曾任安徽黟县训导。他写了许多书，刻板的只有《说文通训定声》和《传经堂文集》10

卷。《说文通训定声》一书 18 卷，历时十数年最后完成，这是一部按古韵部改编《说文解字》的书，全书共收字 17240 个，内容极为丰富，对研究词义的发展和转变大有帮助。

王照（1859—1933 年），清末主要切音字方案“官话字母”的创制者和推行者，字小航，号芦中穷士，晚年又号水东，河北宁河人。青年时代颇具维新思想，广读时务书，热心教育。戊戌变法中上书言事，建议皇帝、皇太后出洋考察，从日本开始。变法失败后，他被革职拿办，逃往日本。他赞赏日本普及教育和实行的文字改革。1900 年春，他化装成台湾和尚回国，在被八国联军占据的天津潜居一年，创制“官话字母”，著《官话合声字母》，署名“芦中穷士”，1901 年由中国留学生帮助在日本出版。1903 年，他不顾自己是被通缉的政治犯，冒险到北京办“官话字母义塾”，由学生王璞任教员，自己躲在屏后听课。义塾重印他的《官话合声字母》作为教材，改名《重刊官话合声字母序例及关系论说》，又出版注音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官话字母义塾丛刊》（又称《字母书》）。为了避免被人告密，1904 年，他赴提督衙门投案，3 个月后获释。因直隶总督袁世凯允许推行“官话字母”，他去保定办“拼音官话书报社”，出版供新军学习字母用的《对兵说话》。1905 年他重回北京，办官话字母第一号义塾，共办 24 号；“拼音官话书报社”也迁到北京。他还创办一份《拼音官话报》，出版了许多用官话字母编写的书。他一心推行字母，直到 1910 年因《拼音官话报》触犯了摄政王载沣，官话字母被禁为止。

十一、世界新闻出版事业

世界近代后期是世界新闻出版事业大发展的时期。18—19世纪，资本主义在欧美进入成熟时期，资产阶级陆续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国家发生了产业革命，生产力大大提高，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人口大大增加，许多国家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受教育人数迅速增加。随着市民文化程度和对政治兴趣的提高，一方面，他们要求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另一方面，大大增加了对新闻出版的需求。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国家加强了新闻立法，许诺允许新闻自由。同时，金融资本的发展为办报、办通讯社和广播电视提供了资金来源，铁路的广泛修建加速了运输和邮递速度，产业革命使与新闻出版有关的造纸、印刷、电信等领域发展很快。1820年发明了新造纸法，使纸价下跌；60年代发明用圆筒纸印报；欧洲的电报开通于1845年；英国与欧洲大陆间的海底电缆开通于1850年；欧洲与美洲间的海底电缆开通于1866年。1835—1853年，出现最早的5家通讯社，新闻的采访、传递，报纸的组织、机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19世纪中后期，广播电视也萌芽和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印刷机械和印刷技术也不断改进，加速了新闻出版事业走向现代化。

1. 欧美新闻事业的发展

(1) 新闻立法

到19世纪，欧美许多国家制定了关于新闻的法律，在宪法或普通法（民法、刑法等）中对新闻出版作了规定。在宪法或基本法中，一般都是一方面规定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保障新闻工作者在法律的范围内正常行使其采访、报道、出版、传播的职能；另一方面又规定防止滥用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而侵犯公民权利、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有些国家还规定保障公民获得情报和信息的权利。法国1789年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规定：“思想与言论的自由交流乃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任何公民均享有言论、写作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限制内须担负滥用此项自由的责任。”1874年瑞士联邦宪法规定，“出版自由应予保障之”；“但各州得依法规定必要的处分，以杜流弊”，“联邦政府有权颁布关于利用言论自由权反对联邦政府及官员之惩戒条例”。一些国家普通法中，包括民法和刑法，有许多规定也适用于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者，主要是关于诽谤、煽动、淫秽等罪行进行惩戒的规定。另外，对于侵犯隐私、泄露机密、诋毁国家声誉、危害国家安全等，不同国家也在法律上有不同的规定。有些国家还制定了适用于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者的专门法规。瑞典议会早在1776年通过的《报纸自由法》，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关于新闻的法规。新闻法规一般包括以下内容：新闻媒介的职能与权利；新闻媒介的义务、新闻事业的管理等。

(2) 各国报业

英国报业。19世纪初，英国工业发展很快，新兴工业资产阶级要求取消“知识税”（即印花税、广告税和纸张税），自由出版报纸。1832

年英国通过“国会改革法案”，1833—1861年逐渐废除对报纸、纸张和广告的税收，报价下降，许多廉价报纸纷纷创刊，出现了“一便士报”。

第一张成功的廉价报纸是1855年由斯莱上校创办的《每日电讯报》。该报创办之初销路不畅，3个月后由利维买下并加以改组。1856年以后由利维的儿子劳森接办该报，进行了诸多改革，追求质高而廉价，销数不断上升，到1861年，发行量达24万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报纸之一。这一时期也正是英国报纸扩张时期，1821年英国有报纸267家，到1861年增至1102家。经过激烈竞争，到1880年，伦敦有日报18家，英格兰有日报96家，全国有专业报纸157家，如宗教报、禁酒报、幽默报、时装报、体育报等。为工人提供教育和服务的报纸也相继问世，较有影响的如《戈根》、《一便士报》、《穷人卫报》、《毁灭》、《铁手套》、《人民之声》、《联合行业报》、《穷人律师》等。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于1834年创办了《新道德世界》周刊。

19世纪上半叶，《泰晤士报》是英国最有影响的报纸。其前身为《每日天下纪闻》，1785年由沃尔特创办，1788年改称《泰晤士报》。该报善于反映和引导舆论，使之成为最有影响的大报。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还出现了激进报纸，如《谢尔温政治纪事报》、《曼彻斯特观察家报》等。

法国报业。18—19世纪的法国，政治动荡不安，共和与帝制反复出现，政府对新闻出版业的控制也时紧时松，1799—1815年的拿破仑执政时期，对报纸管制很严。从1805年起，政府向各报社派驻新闻检查官，到1810年巴黎仅有6家报纸，所有报纸均要为拿破仑歌功颂德。

1819年，司法部长塞尔主持制定新闻法，称为塞尔新闻法，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新闻法。1830年7月革命后，新王朝两次公布法令，进一步扩大新闻自由，减少报纸缴纳保证金的数额。在30年代，法国哈瓦斯通讯社诞生，这是世界上第一家向订户供稿的通讯社。

1848年法国爆发二月革命，成立第二共和国。不久出台的新法令规定，报界享有绝对自由，废除印花税和保证金。于是，很快就有450家报刊创刊，著名的有《人民之友报》、《火炬报》、《罗伯斯庇尔报》、《红色便帽报》、《断头台报》等。拿破仑三世复辟后，报纸锐减，从400多家降到14家。但是，动荡的局势使国人更为关心政治，渴望阅读报纸，致使法国的日报发行量大增，1870年比1815年增加19倍。此间，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广为传播，出现了宣传空想社会主义的报纸，如傅立叶主义的《法朗吉报》、《和平民主报》和圣西门主义的《地球报》等。1836年，法国第一家成功的廉价报纸《新闻报》创刊，1866年《费加罗报》改为日报。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期间，出现了许多革命报纸，如《口令报》、《人民呼声报》、《杜歇老爹报》、《复仇者报》和《公社报》等。1877年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刊是法国第一家马克思主义报纸。

德国报业。在整个18世纪，德国对报业一直管制很严，新报纸创办不多。法国大革命以后，民主自由的思潮传到德国，一些人不顾政府禁令，开始宣传新思潮和鼓吹革命。1814年，戈尔斯在科布伦茨创办《莱茵信使周报》，传播法国的民主自由思想，抨击德国的专制制度，后被勒令停办。而支持法国大革命的《全德新闻报》继续出版，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政论报纸。

1848—1849年，普鲁士和奥地利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取消对报纸的限制。在奥地利，1848年有200多家报纸创刊，其中90家为日报，最著名的是《新闻报》。1867年，奥地利通过基本法，建立议会政党，并逐渐开始了工业化进程。1889年出版政治报纸《工人报》。这一时期著名的报纸有《新自由新闻》和《新维也纳日报》。维也纳也成为当时欧洲报业中心。

1848年以后，在普鲁士也有许多报纸相继问世，比较重要的有1855年创刊的《柏林交易报》，1856年的《法兰克福新闻》。柏林成为普鲁士地区报业竞争地。报纸发行量从1847年的不足10万份，增加到1870年的900万份。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工业和金融业得到较快发展，这也进一步促进了报业的发展。1871年《柏林日报》创刊；1883年《柏林地方通讯报》创刊；1898年《柏林晨邮报》创刊。它们都是很有影响的报纸。

在1848年欧洲革命风暴中，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报纸——《新莱茵报》（全称《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1848年5月31日在科伦出版，马克思任主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马克思恩格斯为该报写了40多篇文章，近80万字。该报不顾种种迫害和警察当局的刁难，坚决拥护革命，捍卫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恩格斯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象手榴弹一样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1849年5月19日该报被迫停刊。

恩格斯是一位优秀的无产阶级报刊活动家。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从事新闻工作，先后担任过《德意志电讯》、《知识晨报》的通讯员，《德意志——布鲁塞尔报》驻巴黎记者和《新莱茵报》驻瑞士记者。50年代后又成为军事刊物的通讯员和记者，并为几十种报刊撰写文章，其中包括美国最大的一家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恩格斯为这家报纸撰稿达400篇以上。到1891年，71岁高龄的恩格斯还为一些报刊勤奋笔耕。

在19世纪，德国还出版了一些与社会主义运动有关的报纸，如1864年在柏林创刊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1869年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一批德国流亡社会主义者还在法国巴黎创办了激进派报纸《前进报》（1844年1月创刊），马克思曾参加该报编辑工作。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曾在该报上连载。

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废除新闻检查制度。1874年又通过帝国新闻出版法，第一条规定治安法不适用于新闻出版；第四条规定新闻出版自由。此后德国报业得到迅速发展。

欧洲其他国家的报业。19世纪30—40年代，俄国的资本主义逐渐发展，要求废除农奴制的呼声日益强烈。1847年，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在伦敦创办《钟声报》，并把报纸偷运到俄国，宣传改革思想，产生很大影响。1861年俄国发生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此后报业得到发展，比较著名的报纸有《俄语报》和《时务报》等。

19世纪初，意大利独立运动兴起。1820年，烧炭党创办《意大利周

报》。1831年，马志尼建立青年意大利党，1832年创办《青年意大利报》。1847年，加富尔创办《复兴报》。1860年加富尔统一除罗马、威尼斯以外的意大利各地，出版《人民公报》。1870年罗马归属意大利。同年梵蒂冈天主教教廷出版机关报《罗马观察家报》。1876年米兰《晚邮报》创刊，其发行量很大。这一时期创刊的米兰《世纪报》，都灵《邮报》及罗马《论坛报》、《意大利新闻》也都有较大影响。

19世纪瑞士的《新苏黎世报》（1821年）、挪威的《晚邮报》（1860年）、荷兰的第一张廉价报纸《每日新闻》（1869年）、西班牙的《西班牙先驱报》、瑞典的《瑞典日报》及芬兰的《赫尔辛基日报》也都是影响广泛的重要报纸。

美国报业。独立后的美国报业迅速发展。报纸成为政党的舆论工具，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到1830年，美国拥有8000以上人口的城镇仅26个，但有日报65家，周报350家。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1827—1832年出版了50多种工人报刊。第一张工人报纸是1827年在费城出版的《雇工机工拥护者》。60—70年代，各业工会纷纷成立，10年之内创办工人周报、月刊130种，著名的有《芬区尔工会评论》、《工人拥护者》等。

商业报纸和廉价大众化报纸相继出现。第一张成功的廉价报纸是1833年在纽约创刊的《太阳报》，发行量很大，1873年达3万份。19世纪上半叶创刊的重要报纸还有《纽约先驱报》（1835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41年）等。到19世纪中叶，美国约有日报400家，周报3000多家。这些报纸以刊登广告收入为主要财源，在政治上标榜独立、超党派，重视地方新闻和人情味新闻。从50年代起，美国报纸已成为工业巨头控制的大企业。普利策在美国的新闻改革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并以普利策奖闻名于世。普利策原为匈牙利人，后移居美国并参加过南北战争。1867年他取得律师资格，1868年当上圣路易的《西方邮报》记者。1878年普利策买下《圣路易电讯报》，后又将它与《晚邮报》合并为《圣路易邮报·电讯报》。1883年，他又购得纽约《世界报》并对其进行改革；大量登载有人情味和耸人听闻的新闻，迅速打开销路。4个月后，《世界报》销数由2万增至4万。在其影响下，美国各报都开展了新闻改革运动，普利策也由此赢得“新闻事业”创始人的声誉。

19世纪下半叶，美国创刊的重要报纸有《亚特兰大宪法报》（1868年）、《华盛顿邮报》（1877年）、《圣路易邮报》（1878年）、《洛杉矶时报》（1881年）等。在这一时期，《世界报》和《纽约新闻》展开激烈竞争，两报竞相刊登耸人听闻的消息和滑稽连环画《黄孩子》，被称为《黄色报纸》。这一做法在美国得到迅速广泛的效仿，到1900年，在美国21个大城市中已有1/3的报纸成为“黄色报纸”。

19世纪末，随着美国经济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报业也出现了垄断倾向。斯克里普斯创办了美国第一个报业集团。他从1878年起先后创办了《克里夫兰新闻报》、《圣路易纪事晚报》（1880年）、《辛辛那提邮报》（1881年）和《肯塔基邮报》（1885年）。1889年，他又与麦克雷组成斯克里普斯—麦克雷报业集团；1897年建立斯克里普斯—麦克雷通讯社。到1900年，该报团在15个州共创办23家报纸，放手让青年人作为创办人和经营者。

(3)最早的通讯社

19世纪30—50年代，在欧美国家建立了5家通讯社。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讯社。当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得到发展，人民文化程度提高，出现了“大众化”的报纸，发行量激增，对新闻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与此同时，电报通信事业迅速发展，形成了从欧洲、美洲到亚洲的有线电报通信网络。这样，通讯社专门采集新闻，并以较经济的订费同时供给多家报纸使用成为可能。通讯社的出现，使新闻事业内部实现了社会分工，促进了报业的进一步发展。

哈瓦斯通讯社。世界上第一家通讯社是法国人哈瓦斯于1835年创办的哈瓦斯社，它就是法新社的前身。哈瓦斯本来从事翻译外国报纸上的材料供巴黎报纸使用的工作。哈瓦斯社成立后，他在欧洲各国首都聘用了通讯员，向法国大众化报纸《新闻报》和《世界报》提供新闻。1840年，该社用信鸽从伦敦和布鲁塞尔向巴黎传送新闻。1845年，它又使用新开通的巴黎——里昂的电报线路发新闻。1851年，该社已成为在巴黎和欧洲大陆各国首都及伦敦之间用电报线路传送新闻的电讯社。19世纪后期，它和英国的路透社和德国的沃尔夫通讯社并称当时世界3大国际性通讯社。1929年因经济危机，法国外交部通过给予资助开始控制该社。1944年，法国几家参加抵抗运动的通讯社接管后成立了法新社，继续由政府提供经费和任命社长。1956年成为独立的新闻机构。

港口新闻联合社。1848年，美国纽约《太阳报》、《纽约先驱报》、《论坛报》等6家报社为了分担向从欧洲来的船只联合采访新闻的费用，在芝加哥成立了港口新闻联合社，即美联社的前身。这是世界上第2家，也是美国第1家历史悠久的通讯社。1857年，该社又与1850年成立的电讯与一般新闻社合并，组成了纽约联合社。以后，它又同美国其他地区报纸创办的几家联合社联盟。1892年进行改组，建立了联合通讯社，简称美联社。1895年采用该社稿件的报社达700家。1900年总部从芝加哥迁往纽约。

沃尔夫通讯社。沃尔夫通讯社于1849年成立，创办人是德国贝纳德·沃尔夫。他早年在法国哈瓦斯通讯社工作，1848年回国任柏林民族新闻报社社长。该社成立时专门报道商业和经济新闻。它成立后降低了采访费。自1855年开始，向报社提供一般新闻，业务发展很快。到1860年，每天发出大量新闻稿，与哈瓦斯通讯社、路透社及美联社一起被称为西方4大通讯社。

路透和路透社。路透（1816—1899年），1816年7月21日生于德国卡塞尔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原名约瑟法特，1844年改为路透。1851年在英国创办通讯社，1899年2月25日卒于法国尼斯。1829年在格丁根任银行职员，40年代初到柏林，1845年经营过书店和出版业务。路透于1848年到巴黎，在哈瓦斯社当译员。1849年他开始在德国亚琛设立通讯机构，搜集商业信息和股票行情，以信鸽传递信息。

1851年夏，路透移居英国，创办路透办事处，同年10月4日，他在伦敦皇家股票交易所租用房间，开始了通讯社的业务工作。在英、法海峡海底电缆投入使用后，他立即用电报传递消息，服务对象是交易所、银行、股票商、投资公司和贸易公司。该机构把从欧洲大陆得到的金融、

商业信息编成“路透快讯”供给用户。到1852年，路透社的快讯畅销欧洲各国，并且从50年代中期开始，还发布政治、军事新闻。1858年有《广告晨报》、《每日电讯报》等多家报纸订用它的通讯稿，英国当时最有影响的《泰晤士报》也与该社签订了供稿合同。该社以发表独家新闻赢得声誉并不断扩大其影响。1859年2月7日，法国拿破仑三世发表外交政策演说，1865年4月美国总统林肯遇刺身亡，路透社都发表了独家新闻。后来路透社发展为英国最大的世界性通讯社，总部设在伦敦，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驻有上千名专职或兼职记者，除发布政治新闻外，经济和体育新闻也占有重要地位。

斯蒂法尼电讯社。1853年，斯蒂法尼在意大利都灵创办了斯蒂法尼电讯社。斯蒂法尼曾是一个新闻记者。该社开始时只是向皮德蒙特和附近两个州的报纸提供新闻，以后随着意大利的统一扩大了规模，成为全国性通讯社。

(4) 广播、电视的初步发展

广播、电视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适应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萌芽、20世纪上半期诞生并迅速发展起来的。

1864年，英国麦克斯韦预言电磁场以波的形式传播。1888年，德国赫兹证实电磁波的存在。19世纪末期，意大利马可尼和俄国波波夫发明无线电通信技术。进入20世纪后，无线电技术的研究和实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1906年，德国德律风根公司实验无线电话成功。1907年，美国德福雷斯特在纽约进行了音乐和语言的无线电实验广播。1920年10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私人经营的广播电台取得政府营业执照，开始播音。这是世界上第一家正式广播的私营商业广播电台。

电视源于欧、美洲。19世纪初，科学家发现了硒，并确认它是一种不导电的元素。1873年，英国史密斯却发现硒遇见阳光会象电池一样产生电。美国人肯阿里根据史密斯的发现，用硒研制成了光电池。这时，贝尔已发明电话，肯阿里就设想光电池能不能把图象或景物传送到远处呢？1875年，肯阿里研制了一个实验装置，试图把用黑白小点组成的图片放在硒板前用灯光照射，利用硒对光的反映，把图象显示出来。但由于硒产生的电流太弱，没有成功。10年后，波兰人尼布可在肯阿里实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实验，改进设计。1884年，德国尼普科夫发明机械圆盘扫描方法（通称尼普科夫圆盘）。20世纪初，进入电子方式电视广播的研制阶段。1927年，美国的全电子式电讯通过有线网络把图像和声音从华盛顿传到纽约。1930年，实现了声像同时播出。

2. 亚、非、拉、澳国家的报业

18—19世纪，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向海外扩张，掠夺殖民地。殖民当局、移民和传教士为了他们各自的利益，在殖民地创办了主要用宗主国文字出版的报纸，成为亚、非、拉广大地区报业的开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亚、非、拉的许多国家兴起民族独立运动，由本国人

士创办的以国语为主的报纸纷纷诞生，特别是在拉丁美洲，19 世纪上半叶就出现了 10 多个独立国家，并较早地创办了当地报纸。这些报纸为争取民族解放、推动社会进步和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1) 亚洲国家本民族报纸的诞生

印度于 1838 年创办了《印度时报》；1868 年出版《甘露市场报》；1875 年出版《政治家报》；1878 年出版《印度教徒报》；1881 年出版《论坛报》。尼泊尔于 1902 年创办《廓尔喀新闻》。菲律宾争取独立的人士于 1889 年在西班牙创刊《团结报》（西班牙语）；1892 年菲律宾同盟会出版《自由杂志》。泰国于 1858 年创办《政治公报》。伊拉克于 1869 年出版《朝拉报》。土耳其于 1862 年创办《舆论写真报》。在 19 世纪 60—70 年代，黎巴嫩出现阿拉伯文报。

亚洲的日本，由于在 70—80 年代实行明治维新，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其报业发展情况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相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大众化报纸陆续诞生，重要的有《东京日日新闻》（1872 年）、《读卖新闻》（1874 年）和《朝日新闻》（1879 年）等。到 1910 年，日本已有报纸 250 家。

(2) 中东和非洲国家报业

19 世纪，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都沦为殖民地或保护国。这些国家的统治当局一般都创办了阿拉伯文报纸，民间人士创办了当地报纸。如《伊拉克新闻》（1816 年）；《叙利亚报》（1865 年）和也门的《萨那报》（1879 年）；埃及的《哈吉报》（1827 年）和《尼罗河绿洲报》（1867 年）、《金字塔报》（1875 年）和《祖国报》（1877 年）。还有苏丹的《苏丹人报》（1899 年）；利比亚的《马格里布的黎波里报》（1886 年）；阿尔及利亚的《荣耀报》（1847 年）以及《突尼斯先驱报》（1861 年）等。

在南部非洲，各国的殖民当局都用宗主国文字出版了报纸。尼日利亚于 1859 年由传教士创办了约鲁巴语报纸——《伊韦·托林报》，后来加上英文，成为非洲第 1 张双语报纸。到 20 世纪初，尼日利亚已有 10 家报纸。

(3) 拉丁美洲报业

巴西殖民当局于 1808 年创办官方葡文报纸——《里约热内卢公报》。智利天主教牧师于 1812 年创办西文报《智利之光报》。乌拉圭教会于 1878 年创办西文报《好公众》。

拉丁美洲在这一时期出版的重要民族报纸有：巴西的《巴西邮报》（1808 年）、《圣保罗州报》（1875 年）、《巴西日报》（1891 年）；阿根廷的《新闻报》（1869 年）、《民族报》（1870 年）；秘鲁的《秘鲁人报》（1825 年）、《商报》（1839 年）；智利的《信使报》（1827 年）、《最后消息报》（1902 年）；乌拉圭的《日报》（1866 年）；厄瓜多尔的《电讯报》（1884 年）；危地马拉的《中美洲日报》（1880 年）；墨西哥的《美洲觉醒者报》（1810 年）和巴拿马的《明星先驱报》（1849 年）、《巴拿马明星报》（1853 年）等。其中不少报纸至今仍在出版。

(4)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报业

澳大利亚原为土著人居住地区。1770年英国航海家库史率船队驶抵澳大利亚东海岸，宣布澳为英国殖民地。1788年英国航海家菲利普带领着首批移民1030人（包括736名流放犯）抵达悉尼附近定居。以后由于金矿的发现，矿工和移民激增。英国移民于1803年创办英文周报《悉尼公报与新南威尔士广告报》。到1886年，澳大利亚有日报48家，并开始出版星期日报。

新西兰在14世纪时已有毛利人居住。1642年荷兰航海者曾登陆，但被毛利人赶走。18世纪下半叶英国航海家库克5次抵达新西兰，此后英国向新西兰大批移民，并宣布占领。1840年英国全权代表霍布森和毛利人族长签订《威坦哲条约》，规定新西兰成为英国殖民地。同年，英国移民出版了《新西兰及不列颠尼亚旁观者报》。

3. 世界出版业

出版业在世界历史的各个时期都为积累和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19世纪的图书出版业开辟了一个新纪元。19世纪印刷机发生演变，从木质手工操纵的印刷机过渡到铁质机械化印刷机。1831年双滚筒印刷机问世；1846年发明第一台高速滚筒印刷机；1863年发明能自动连续进纸的印刷机；1872—1892年又发明了浇铸排字机；1889年又出现能双面印刷并自动折叠的印刷机。这一系列发明使印刷技术不断进步，加速了书报印刷的现代化。随之，在西方国家诞生了一批出版社，涌现了一些出版商，出版业确立起来。

(1) 各国著名的出版社和出版商

法国的马松于1804年在巴黎创办医学与科学书店，主要出版医学书籍，1905年改名为马松出版公司。1826年，阿歇特在巴黎开办阿歇特出版公司，主要出版教科书、青少年读物、工具书等。1852年，拉鲁斯和布瓦耶在巴黎创办拉鲁斯出版社，主要出版法语词典、百科全书、教科书、儿童读物和美术书；拉鲁斯还亲自编纂了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19世纪百科大词典》。1875年，弗拉马里翁在巴黎开办欧内斯特·弗拉马里翁出版社，最初出版医学图书，后来主要出版画册、工具书、文艺书、青少年读物和袖珍图书等。

英国的海纳曼1809年在伦敦创立海纳曼出版公司，主要出版文学图书、中小学教科书等。1819年，柯林斯在伦敦创办柯林斯出版公司，主要出版青少年读物、小说、传记、教科书和词典等。1843年，麦克米伦与其弟在剑桥创办麦克米伦出版公司，主要出版教科书、小说、学术著作和参考书等。

德国的贝特尔斯曼在尼特斯洛创办贝特尔斯曼出版公司，创建之初主要出版神学书、教科书、青少年读物等，后来主要出版文学书、工具书及专业书。1842年，施普林格在柏林创办施普林格出版公司，主要出版医学、生理、生物、数学、化学、地理、工程、经济、法律、哲学等专业类图书。

布罗克豪斯（1772—1823 年），是德国著名的出版商。他于 1808 年买下勒贝尔《百科全书》的版权，采用小条目编法，重新设计，采用精新材料，便于查阅，使其更适于在校学生和非专业读者的需要。1811 年第一次出版时，改名为《布罗克豪斯社交词典》，1812 年再版时，又改名为《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它的小条目编法对许多国家的百科全书编纂都有巨大影响。后来，布罗克豪斯在莱比锡开办了印刷所，编辑出版百科全书、辞典及各种多卷集工具书。

美国这一时期建立的出版社有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1807 年）、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832 年）。1861 年，在华盛顿成立了政府印刷局，由政府印刷总监领导，只为国会服务。哈珀兄弟是美国著名的出版商，他们是：詹姆斯（1795—1869 年）、约翰（1797—1875 年）、约瑟夫·韦斯利（1801—1870 年）和弗莱彻（1806—1877 年）。1817 年詹姆斯和约翰在纽约创办哈珀公司，从事印刷出版工作，后来约瑟夫·韦斯利和弗莱彻加入，1833 年改名为哈珀兄弟出版公司。该公司专门出版图书，以出版高水平文学著作和教科书而赢得赞誉，是美国最大的家族出版公司。1850 年，哈珀兄弟创办《哈珀斯新月刊》，以最成功的文学杂志在美国出版界活跃百余年。利平科特也是美国著名的出版商，人称“书业拿破仑”。他当过书店店员和经理。1836 年他买下书店，改名为利平科特公司，开始出版宗教和文学书籍。1850 年，他又买下费城最大的图书批发店。南北战争开始以后，他改变出书方向，以出版医学书籍为主，出版的《美利坚合众国药典》是世界上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专业参考书。

俄国著名的出版商是斯米尔金和帕夫连科夫。斯米尔金热心出版普希金和果戈里等人的著作。他在俄国首次实行按页给作者付稿酬的制度。他的大量出版、低价出售的经营原则有利于作家的创作和文学作品的传播。因此，19 世纪 30 年在俄国文学史上被称为“斯米尔金时期”。1828 年，他定期出版《斯米尔金图书馆俄罗斯阅读书籍清册》，收录近万种书籍。从 1846 年起，他着手出版《俄罗斯作家作品全集》，但不久破产，并离开出版界。

帕夫连科夫开设过书店，并从事翻译和出版工作，因出版进步图书《贫乏的俄国思想》和《俄罗斯堂吉珂德》而受审和被流放。流放期间又因编写《维亚茨勿忘草》而再遭迫害。1877 年获释后他回到彼得堡，仍坚持出版图书。他一生共出版图书 750 余种，350 万册。《赫尔岑选集》、《别林斯基选集》和《皮萨列夫选集》都是经他首次出版而搬上文坛的。

（2）各国的图书馆

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掌握了政权的资产阶级对图书财产非常重视。法国皇家图书馆于 1792 年改名为国家图书馆，成为国有财产。拿破仑一心想把它办成世界上最好的图书馆。他给该馆增拨经费，重新颁布呈缴版本法令。到 1818 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书近 100 万册；1860 年增至 150 万册，成为名符其实的法国第一图书馆。

法国大革命对德国图书馆事业产生很大影响。一方面德国的许多珍贵图书在法军侵入德国后被运到法国巴黎；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也加速了德国教会的世俗化，许多大教堂、修道院、教会和僧侣的图书馆都转为州、市所有。慕尼黑王室图书馆（建于 1558 年）改为慕尼黑市立图书

馆，收藏了德国境内最丰富的珍本书籍，被称之为欧洲的“宝库”之一。

19 世纪下半叶，英、美两国几乎同时出现近代“公共图书馆”。这在图书馆发展史上和人类文化史上都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公共图书馆的基本特征是：向所有公民免费开放；经费来自地方税收；其设立和经营有法律依据。

英国公共图书馆运动是与爱德华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被称为公共图书馆运动的“精神之父”。1847 年他发表了《伦敦和巴黎的公共图书馆》一文，受到议会重视。1850 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英国第一部公共图书馆法。1851 年在温切斯特市成立公共图书馆。1852 年又陆续在一些城市建立公共图书馆。19 世纪后期，公共图书馆的发展较快，到 1889 年全国共有 153 所。

这一时期，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出现了一位杰出的馆长帕尼齐，人称“图书馆员的拿破仑”。他原是意大利人，1832 年加入英国国籍。他全身心地投入博物馆的工作，为不列颠博物馆奋斗了 35 年。由于他的力争，英国议会同意每年给博物馆拨 1 万英镑的固定经费，另加 5 千英镑的附加经费。这样不列颠博物馆每年都有较充裕的经费采购图书。为了收齐英国的出版物，他严格要求出版社按著作权法权交纳呈缴本，对不遵守著作权法的出版社进行起诉。因此，呈缴本的册数由 1845 年的 3596 本猛增到 1856 年的 26335 本。帕尼齐强调要有科学的著录规则，目录一定要严格按著录规则加以编制。他与同事共同研究制定了 91 条著录规则。这些规则在后来的一百多年间为世界许多国家所遵循。帕尼齐还支持修建了世界闻名的圆顶阅览室和铁制书库。由于他的努力奋斗，不列颠博物馆不仅赶上了巴黎的国家图书馆，而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

美国的公共图书馆法不是由国会统一制定的，而是各州、市自行制定的。1848 年 1 月，波士顿市请求马萨诸塞州议会立法，依法建立波士顿公共图书馆。同年 3 月，州议会通过一项法令，同意波士顿市的要求，并规定图书馆经费从该市财政经费中支出，每年不超过 5000 美元等等。1854 年，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随后各州纷纷通过公共图书馆法，全国各城市都建立了公共图书馆。

杜威是对美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他 1851 年生于美国，1874 年于阿默斯特学院毕业后留校任图书馆代理馆长。他是成立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发起人之一，并担任秘书长。1883 年杜威任纽约哥伦比亚学院图书馆馆长，并创办第一所训练图书馆馆员的图书管理学校。杜威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他 1870 年发表一份分类表，并把书籍按主题分类排列。6 年后，公布了划时代的《杜威十进分类法》，杜威采用 0—9 的阿拉伯数字代表目类，简单、明了、易懂，在近百年来的图书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这一分类法的问世是图书馆学和目录学史上的一个创举。

4. 中国的新闻出版业

(1) 印刷技术的发展和新型出版机构

在近代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过程中，伴随着资本主

义列强对中国的军事干涉，文化侵略也步步逼进。作为文化输入的一个重要方面，先进的印刷技术在中国出现了。

1807年春（清嘉庆12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为了在中国传教的方便，他到澳门后就开始研究中文，并推行适于汉字的现代印刷技术。他曾雇人秘密镌刻字模。1814年马礼逊在马六甲设印刷所，收中国刻工印工数人，在几十年时间里雕刻20多万活字，印成了马礼逊自编的《马礼逊字典》（亦称《华英字典》）600部和多种英华合刊的书籍，开了中文采用西式字模的序端。

道光年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澳门设立了一个石印印刷所，此间在广州也出现了外国人开办的石印印刷所。外国人为了在中国搞出版，开始考虑用字模铸造活铅字。最早有巴黎人赖各兰德在中国留学生帮助下，雕造字模2000多个。1860年，上海美华书馆主持人姜别利用电镀方法制造华文字模获得成功，制成大小不同的铅字7种。此后姜氏又致力于华文排字架的改革。他雇佣两名中国学者调查华美书馆所印《新旧约全书》等27册书籍中的华文铅字的使用率。姜氏根据调查情况，将华文铅字分为常用、备用和罕用3类，并创制“元宝式”字架（俗称三角架或升斗架），大大提高了排字工效。商务印书馆印刷厂采用了这种排字架，并作了一些改进。

1884年，在上海创办《申报》报馆及点石斋石印书局的英商美查又组织了图书集成局，创制扁体铅字，称为“美查字”。这种字大而特扁，节省印刷篇幅。

外国人在华开办的新式出版机构和创制的新型印刷手段，对中国人有很大影响。1843年墨海书馆在上海成立，成为上海有铅印设备的第一家。由于“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国人开始了解和学习外国，不少知识分子出国考察学习印刷技术，同时也聘请外国技术人员来华传授先进技术。商务印书馆曾聘请日本人木村今朝男为技师。一些出版机构还直接引进西方印刷机械。1872年，上海申报馆引进了手摇转轮印刷机。1898年，商务印书馆引进了铅版印刷机。20世纪初叶，手拍铸字炉、脚踏铸字炉和手摇铸字炉在中国印刷行业相继采用。在学习西方先进印刷技术的过程中，中国第一代出版印刷业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经办的企业诞生了。据1906年（光绪32年）“上海书业商会”出版的《图书月报》第一期记载，入会的出版者已有22家。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初创时以印书业务为主，故名商务印书馆。在其全盛时期，不但在上海设有制度完备的总务处、编译所、发行所以及机械、技术完善的印刷总厂，还在北京、香港等地设有分厂，在全国各省市和重要商埠设有85个分馆，在海外的新加坡和吉隆坡也设有分馆。它的规模之大为国内各出版机构所不及，在世界各国亦属罕见。它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颗明珠。此外，文明书局和中华书局也为保存我国古代文化和发展近代出版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2）翻译出版事业的兴起和发展

进步文化是世界各民族贡献给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我国近代的先进文化人士，努力吸收西方进步文化，促进了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为全球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中西文化的交流首先是以书籍作为

媒体而出现的。鸦片战争前后我国开始兴起翻译出版事业，积极从事翻译的人员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

鸦片战争前后到洋务运动前这一时期里，从事西方书报翻译工作并具有较深刻先进思想的人有林则徐、魏源等。林则徐主张翻译西书，他在广州领导禁烟期间，手下聚集不少译员。林则徐组织人力编译了《四洲志》和《华事夷言》等。魏源曾为林则徐幕僚，清末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在林则徐禁烟遭贬后，他继承林氏未就之业，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纂成了《海国图志》，1844年出版，1848年又加以增修。这部著作成为当时东方国家了解西方和抵抗西方的宝贵典籍，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也产生过影响。林、魏翻译出版西书表现了一种开放意识，从此中国人开始正视西方，学习了解西方，进而抵御西方的侵略，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历史学家范文澜称林则徐是近世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曾一度兴起洋务运动，并兴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这一潮流也影响到翻译出版事业。这一时期建起了一批翻译出版机构，如官办的外语学校兼翻译出版机构，洋务派官僚经办的翻译出版机构以及教会办的翻译出版机构等。

1860年洋务派奕訢奏请设京师同文馆，以培养外语人才。1862年，京师同文馆正式开馆。以后在上海、广州都设立了同文馆。同文馆成立后培养了不少外交人员，并且学生在学期间就开始进行翻译外国书籍的练习，使同文馆兼有学校和翻译机构两种职能。

洋务派官僚经办的翻译机构，要首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此外还有福州的船政学堂、北京海关税务司、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机器局、金陵制造局等。

教会洋人经办的翻译机构有墨海书馆（1843年建于上海）、美华书馆（1844年建于澳门）等。在洋人创办的翻译机构中最有影响的是广学会，原名同文学会，1887年由英国教士韦廉臣创建于上海。广学会翻译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书籍，如《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译）、《列国变通兴盛记》和《日本政变考》等书，曾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广泛流传，康有为还向光绪皇帝介绍过，并把它们作为变法维新的思想工具。

(3) 新闻报业的兴起和发展

中国近代报刊首先是由外国人办起来的。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比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要晚200年。中国近代报刊的存在和发展是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宗教宣传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侵略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来华创办了最初的报刊。从1815年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创办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0%以上，我国的新闻事业和新闻传播基本上被外来势力所控制。

最早被派到中国传教办报的是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年）。他于1807年9月来到广州。由于清政府实行禁止外国人入内和传教的政策，他在广州的传教活动遇到障碍。1813年，伦敦布道会又派出另一名传教士米怜（1785—1822年）来华。他先在南洋群岛华

侨聚居地散发马礼逊翻译出版的《新约》，获得了很大成功。以后，他向马礼逊建议在马六甲设置对华传教活动的总机关。

1815年8月5日，在米怜的帮助下，马礼逊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问世，这是外国人创办的第一个中文近代报刊。在1815—1821年的7年中，共出7卷84期。创刊号封面上刻有“嘉庆丙子年”，并刊有孔子语录：“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编者还在创刊号上解释了刊名的来源和函义，序文说：“既然万处万人，皆由神而原被造化，自然学者不可止察一所地方之各物，单问一种人之风俗，乃需勤问及万事万处万人，方可比较辨明是非真假矣。……所以学者要勤功察世俗人道，至可能分是非善恶也。”《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同时介绍各种科学知识和社会知识，介绍世界各国的情况，起到了传播新闻的作用。尽管这一报刊具有宗教性质，但与中国的封建报刊大不相同，它有消息，有言论，面向社会，面向广大民众，它的问世，标志着我国新闻史由古代进入了近代的发展阶段。

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之后，《蜜蜂华报》于1822年在澳门创刊，葡萄牙执政党领导成员和澳门的教会领导人安东尼奥任主编，用葡文出版，系我国第一家外文报纸。《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于1823年在巴达维亚（雅加达）创刊，为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主编的教会报刊，是近代中国第二家中文报刊。1827年《广州纪录报》在广州由英商马地臣和美商伍德创办，它是一种商业报纸，也是在华出版的第一家英文报纸。1828年，英国传教士吉得在马六甲创办中文教会报刊《天下新闻》（月刊）。《中国丛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各国消息》的创刊，尤令世人瞩目。

《中国丛报》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1801—1861年）于1832年5月在广州创办与主编。这是一份英文报刊，主要向在华的外国人发行，同时也销往美国和英国。该刊大量向西方提供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情报资料，并为帝国主义侵华制造许多舆论。例如要求英国政府向中国增兵，提出使用武力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等，《望厦条约》的某些条款就是《中国丛报》提出的。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于1833年在广州创立，它是中国境内第一家近代中文报刊，创办人是郭士立（1803—1851年）。该刊已设有新闻专栏，这是近代报刊的重要标志之一。新闻栏主要刊载国际新闻；也报道中国的情况，并开创了报道社会新闻和商业消息的先例。如曾报道过酒徒打人致死及105岁老翁与22岁姑娘结婚并生子的消息，报道过中外贸易进口货物价目表等。郭士立是一个殖民主义者，他创办的这一报刊也表现出为帝国主义侵华政策服务的倾向。

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麦都思于1838年10月在广州创办并主编的《各国消息》，是中国境内第二份近代中文报刊，主要传播各国新闻，介绍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政治情况等，并大量刊载商业贸易、航运、台风消息。这些都与当时英国本身的需要有关，起到了为英国侵华政策服务的作用。

见《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第1卷，第1期。

到 19 世纪 70 年代初，外国人所办报刊在中国报界处于全面垄断地位；到 19 世纪末，其数量与中国人自办报刊相比，仍占明显优势。外国人在中国办报，是中国新闻史中的特殊现象，是帝国主义进行文化渗透的一种手段。

19 世纪 70 年代，有了中国人自己办的报刊。香港的《循环日报》和上海的《汇报》是主要代表。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举起变法维新旗帜，创办了《中外纪闻》、《时务报》、《国闻报》、《湘报》等报刊，形成了中国人办报的第一个高潮。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走进新闻界，大量撰写文章，宣传新观念、新知识，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

《循环日报》由王韬和黄平伯于 1874 年 1 月在香港创办。这是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近代报纸之一。王韬自任主编，宗旨为“强中以抑外，谏远以师长”。全报共分三栏，首栏选录京报，次栏为羊城新闻，最后一栏为中外新闻。报首常刊论说文，论说洋务方略和时政大事，颇能吸引读者，其中许多论文出自王韬亲笔。

《中外纪闻》由《万国公报》改名所得，系京师强学会的正式机关报（强学会 1895 年成立），由梁启超担任主笔，康有为题报名。该刊成为宣传维新思想的一个阵地，但只出版 4 个多月就被迫停刊了。

《中外纪闻》被查封后，康有为与黄遵宪立即筹备创办维新派的正式机关报《时务报》，1896 年正式出版，每月 3 期，每篇三、四万字，发行对象主要是同情变法的官吏和知识分子。《时务报》全面提出了变法维新的要求和主张，并提出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梁启超以《时务报》为中心，推动了全国新闻报刊的发展。维新党纷纷在各地创办报刊，如《知新报》、《湘报》、《湘学报》、《国闻报》等。

在中国人的办报热潮中，女性也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中国妇女办报第一人江苏无锡才女裘毓芳。她于 1898 年 5 月创办并主编了《无锡白话报》。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白话报刊之一。裘女士熟知中外历史，精通英文，思想敏锐，文笔优美，立志办通俗报刊，以开民智。她经常亲自采写或改写新闻稿，《无锡白话报》几乎每期都有她的编译之作。

(4) 新闻学理论的研究和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新闻学研究起源于德国。1845 年德国学者普尔兹出版了《德国新闻事业史》，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史专著。20 世纪的美国把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总体理论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它发端于 17 世纪末，盛行于 19 世纪。到 20 世纪 40 年代，广为流行的是客观主义报道理论。

外国传教士也给中国带来了新闻学。鸦片战争前后，外国传教士开始向中国读者零星介绍报纸的观念和知识。1834 年第一篇新闻学专论《新闻纸略论》，简述了报纸的起源、新闻自由和西方报刊出版现状等问题。1854 年，洪仁环在《资政新篇》中提出整套办报方案，主张通过报纸发挥“收民心公议”的作用。这是中国人最早发表的有关报纸的论述。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关于报纸作用的探讨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关心。王韬、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陈虬等一批改良主义思想家，纷纷撰文，阐述了报纸在开风气、通民隐、达民情和促进工商业发

展的作用，倡导把报纸办成推动国家富强的工具。同时，对外报在华占据垄断地位表示了强烈不满。在维新运动的办报热潮中，梁启超等改良派强调了报纸的“去塞求通”、联络同党、权衡国是的职能。这期间，任职外商报馆的中国编辑人员也发表了不少探讨报纸工作的文章，主要强调报纸应该反映庶民意见，兼录闾里见闻和新奇之事，要使市民广泛爱读等原则。西方的“报纸兴趣性”观念也开始在报界传播。19世纪80年代初，“有闻必录”的新闻用语也提了出来。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在中国报界产生很大影响。他主持过《中外纪闻》，并创办了《时务报》，在长期的新闻宣传工作中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他对报纸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认为报纸可以“浸渍于人心”，可以影响舆论。他把报纸的功能作用概括为一个字：“通”。“通”的作用就是“耳目”和“喉舌”的作用。“观国之强弱，则与其通塞而已”；“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导其端也”。“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曰惟通之故”。他发表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的文章，明确指出《时务报》是为维新变法服务的舆论工具，这实质上是提出了党报的概念，戊戌政变之后，他又肯定了《时务报》作为维新党人机关报的这一根本性质。

梁启超赞赏西方国家的新闻自由思想，对清王朝压制言论自由表示不满。他说：“西国议院定一事，布之日众，令报馆人入院珥笔而录之。中国则讳莫如深。枢府举动，真相不知，无论外人也。”

梁启超很重视报纸的教育作用。在戊戌维新时期他就注意到了报纸的“开民智”作用，同时也注意到了开官智。他痛感“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报纸的功能除监督政府外，就是为国民之向导。他明确指出，“重教育为主脑，以政治为附从”。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梁启超广泛介绍、评议和宣传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许多人接受了新思想，由不满清王朝而走向革命。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为我国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当时的报界和以后的报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他的有些思想观点是自相矛盾的，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不尽恰当。

十二、世界体育和卫生

1. 世界体育

(1) 几种体育观

体育在 19 世纪引起了一些有远见的教育家、思想家的重视。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提出的要素理论把体育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认为体育是保证人的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他认为，儿童身体发展的最简单的要素是各种关节的活动，只有关节的活动才能保证行动的可能。儿童体力的练习和发展，不仅能发展他们的身体，而且能训练他们的劳动精神和劳动技能。他专门制定了一种“技能入门”，包括劳动活动中最简单的一些身体操练，如打、拿、掷、推、挥动、角力等等。他还认为军事操练、军事游戏、各种战斗的活动在体育中应占有重要的地位；认为体育在人的性格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他的体育思想不仅对瑞士，对 19 世纪初期的德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曾派遣一批教师到瑞士向裴斯泰洛齐学习。

19 世纪初，德国学校在泛爱主义教育思想和裴斯泰洛齐思想影响下，又经 F·L·扬及其学生的倡导，形成了以器械体操为中心的、重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意志教育的德国体操体系，以及德国式的体育运动体系。

19 世纪初，由于拿破仑帝国和沙俄帝国的侵略扩张，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瑞典处于险境。出于保卫祖国的需要，瑞典人较早地开展了近代体育。瑞典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体操家、剑术家 H·林同林德福尔斯共同创立了瑞典式的体育运动体系，即通常所说的瑞典体操。H·林在《体操的一般原理》一书中，把体操分为 4 大类：教育体操、兵士体操、医疗体操、健美体操。总的要求都是保持与获得协调。教育体操是为了使身体各部获得协调；健美体操是为了使思想感情（精神）同身体之间保持协调。他的教育体操后来被引入普通学校。

马克思从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学前教育实验中受到启发，认为体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意义重大。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广泛的体育，力求培养坚强的、有力的和勇敢的青年一代。恩格斯建议在学校中进行体操训练和军事训练，以增强学生的体质，提高他们的军事素养。恩格斯在《欧洲能否裁军》一文中阐述了关于青年体育运动的精神见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体育观成为社会主义体育的根本指导思想。

(2) 国家体育制度及法规

19 世纪是近代国家体育制度及法规草创时期，丹麦走在世界前列。丹麦政府于 1804 年创建了“军事体操学院”，开始有组织地训练陆、海军人员。第二年，又指令在中学教育中开设体操课。1814 年颁布训令，把体操课列为普通教育的内容，明确规定了小学体育教师的录用和运动场地设备的要求。1820 年丹麦政府设置体操督学，作为管理全国体育的官员。

在瑞典，1814 年以后全国逐步建立了以“皇家中央体操学院”为中心的培育体育师资的机构。1820 年颁布在男子中学实施体育的法令。

随后，所有公立学校都开始施行体育，在许多城市设置了体育督学。

在德国，普鲁士政府于 1842 年下令规定：身体操练是男子教育的组成部分。两年后，体操列入文科中学、市立高等学校和师范学校男生的选修科目。1860 年，普鲁士当局规定所有小学男生一律开设选修的体操课，两年后体操课被列为必修科目。1865 年，所有的新式中学都被要求开设体操课。到 1890 年，几乎所有的高等学校都把体育列为必修课。1894 年规定女子学校必修体育。德国培养体育师资的机构主要是普鲁士中央体操学校，一些大学也开设了体操师资训练班。1889 年，许多地方举行了体育教师资格考试。

法国在 1837 年已设全国体育监督。普法战争的失败刺激法国政府开始重视学校体育。1872 年、1880 年和 1887 年，政府先后以法律形式规定体操为学校正式课程，首先在男学生中开设体育，随后扩展到女学生。私立学校和教堂附设学校也逐步施行体育课程。

俄国最初的体操课程只在部分军队中施行，时间是 1838 年。从 1863 年起，军队开设培训体操和剑术指导者的短训班。到 70 年代前后，政府开始注意学校体育工作。1870 年在师范专科学校的课程大纲中列入体操课程；1872 年在职业学校教学计划中列入体操；1889 年政府公布了“男子学校体操教学指示和大纲”。

日本于明治维新后的 1872 年把体操列入学校教学内容。英国于 1885 年才规定小学必修体育科目。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于 1866 年制定的学校法明文规定对学生实施“正规体育训练”；1892 年俄亥俄州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对市立学校一二年级学生和在校财政上由州政府补助的学校实施体育训练。日本、英国和美国由政府对于体育实施管理都开展得比较晚，到 20 世纪初才逐渐把体育列为正式课程。

(3) 英国的户外运动和游戏

英国素被称为“户外运动之乡”。18 世纪末叶以后，当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热衷于德国体操和瑞典体操等“人工设计”的体育运动时，英国则盛行着传统的户外运动和游戏，如狩猎、钓鱼、射箭、旅行、登山、赛艇、帆船、游泳、水球、滑冰、疾跑、跳远、跳高、撑杆跳高、投石、掷铁饼、羽毛球、板球、地滚球、高尔夫球、曲棍球、橄榄球和足球等。这些运动和游戏，大多发展为现代球类、田径和水上运动项目。因此，英国是近代竞技运动的重要发源地。

19 世纪，英国各项户外运动和游戏的运动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并逐渐形成了统一的规则，陆续成立了全国性的单项运动协会，并且各项运动开始向世界各国传播。

橄榄球运动是英国人的发明。1823 年，在英国格拉比学校举行的一次足球比赛中，该校学生埃利斯踢球发生失误，深感遗憾，于是，不顾规则约束抱起球就跑。这种情况在以后的比赛中屡有发生，逐渐为人们所认可。1863 年英国足球协会成立时，决定将这种可以抱球跑的运动与足球运动区别开来，成为另一种独立的球类运动，因其球形似橄榄，中国称之为橄榄球。1871 年成立了橄榄球协会，制定了统一规则。以后，这种运动流传到英联邦各国以及法国、美国和南非各地，并发展成为各种不同的橄榄球运动。

曲棍球起源于英国。1875年，在伦敦制定了最初的比赛规则。1883年，温布尔顿曲棍球俱乐部明确了场地区界。1886年英国成立曲棍球协会。19世纪末，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之间经常举行比赛。后来，曲棍球运动传到英联邦各国，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尤为盛行，并有“国球”之称。

早在中世纪，英法两国就有了室内网球运动，但参加者仅限于王公贵族们。18世纪以后，这项运动发展到户外，演变为硬地网球和草地网球。这项运动由板球俱乐部组织。1873年英国人温菲尔德出版了《草地网球》的小册子，1874年他又确定了场地的大小和网子的高低。1875年英国板球俱乐部制定了网球规则。1877年在温布尔顿举行了第一次草地网球锦标赛。

(4) 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活动

19世纪，美国的体育运动非常盛行。1870—1890年间，棒球风靡全国，1872年就有“国技”之称。网球于1870年传入美国，在妇女中很有“市场”。80年代，高尔夫球亦传入美国，很快就出现许多高尔夫球俱乐部。

在美国近代体育史上，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活动占有重要地位。基督教青年会于1840年建于英国，1850年在美国也建立了同样的组织。这个组织注意结合青年的特点进行以宗教为主旨的教育。1869年，旧金山、纽约及华盛顿等城市的青年会即建造了当时最完备的体操馆。1880年，波士顿青年会为培训体育指导者而开办了体操班；1885年该组织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创建了基督教学校，后来改名为斯普林菲尔德学院，设有体育部。1891年该院教师奈·史密斯发明了近代篮球运动；1895该院毕业生、霍利奥克城青年会体育干事摩根发明了排球运动。这两项运动迅速风靡美国和加拿大。

美国是一个否定中央集权的国家，民主制度比较完善，其体育发展，除在战时以外，基本没有受到民族主义情绪及军事倾向的影响，体育的重点是增强体力和提高健康水平。美国民众对竞赛运动的兴趣在19世纪50年代就很明显，南北战争以后更加流行。这期间有的大学已开始管理竞赛运动，因为非正式的体育活动造成许多伤害事故，并且也贻误学习时间。大学校际比赛的第一个项目是赛船，也是实行正式管理的第一个运动项目。1870年成立了美国大学划船协会；1875年成立了美国大学校际业余田径协会，是现在仍然存在的最早的田径协会。体育专业组织的兴起是美国体育发展的另一个标志。美国第一个体育专业组织是1885年11月成立的“美国体育促进学会”。1896年开始发行《美国体育评论》（季刊）。1897年还成立了“全国男子大学体育协会”。引人注目的一次专业会议是1889年在波士顿举行的“促进体育会议”。会议由海明威夫人资助；霍曼斯负责行政辅导；会议主席是教育总局局长哈里斯。

中学生竞赛运动的管理，基本是步大学的后尘，也是自然发展起来的。教师、校长和看门人都可自由参加竞赛。早期中学生竞赛运动的督导是由各州联合会进行的。威斯康星州被认为是设置联合会的第一个州。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美国体育运动是歧视黑人的。1867年全国棒球联赛大会通过一项规定：拒绝黑人参加比赛。犹太族公民也被排

斥在大多数乡村俱乐部和体育俱乐部之外。有些犹太人的棒球运动员只好改名换姓，隐瞒自己的宗教信仰。

(5) 德国体操和瑞典体操及其传播

德国是近代体育的重要发源地之一。19 世纪初，德国体育开始从学校向社会发展。在此过程中，一些体操器械，如单杠、双杠、跳马、鞍马、吊环等也随着出现。

弗·扬（1778—1852 年），是德国著名体操家。他创立德国体操的目的在于激发德意志的民族意识。他是第一个研究体育术语学的专家。他在 1810 年出版的《德意志国民性》一书中，出于对德国语言的尊重，把“体育”一词由希腊文换成德文的 Tur-nen，在此基础上，又派生了其他体育词汇。他在体操的内容和形式上也有所创新，采用的“体操练习”内容十分广泛。1816 年，他和艾泽伦合写了《德国体操》，对近代体育产生了极大影响。

艾泽伦（1792—1846 年），是弗·扬的学生，对德国体操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825 年，他开设了剑术和木马练习所；1833 年，建立了德国最早的女子体操场，推行医疗体操，开设培训体育师资的课程。他还创造了跳台、棍棒、哑铃、回旋木马和摆吊环等运动，大大推动了德国体操的发展。

施皮斯（1810—1858 年），是德国体育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他创编过一套学校教学体操体系，包括悬垂和支撑运动、队列训练和徒手体操等。他创编了许多能按音乐节拍进行的练习和步伐，这为女子体操开辟了道路。他很注意发展学生的协同一致和服从指挥、守纪律的品质。1852 年，他创建了德国最早的近代室内体操馆，也是女子体育的早期提倡者。

德国体操于 19 世纪前半期几乎传遍欧美各国。1822 年传入英国；1824 年传入美国；1833 年传入意大利。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中国洋务运动后期，也引进了德国体操。

与德国体操发展的同时，具有军事、教育、医疗目的的瑞典体操学派亦开始形成。这个体操学派的特点是特别重视发展肌肉力量的全身运动，训练中多采用轻器械练习，操练程序严格而呆板。

P·H·林（1776—1839 年），是瑞典有名的文学家和诗人，也是体操家和剑术家。1814 年，他在斯德哥尔摩筹建了“皇家中央体操学院”，并任院长达 25 年之久。他对解剖学、生理学和体操理论进行过长期研究，创立了瑞典式体育运动体系，即瑞典体操。他为了使教育体操和医疗体操有效地发挥作用，他创设了栅栏、瑞典栏、窗梯、跳箱和平均台等辅助器械。他还在一间特设的医疗室内实验物理康复，接受各种年龄和身体上有缺陷的人推行医疗体操。他去世之后，布兰廷继任“皇家中央体操学院”院长，对医疗体操在生理方面的作用有重要论述，1840 年整理出版了林的《体操的一般原理》，使林的体操获得发展。林的儿子 H·林进一步把林的教育体操引入普通学校。

瑞典体操在国际上曾广为传播。1840 年传入德国；1838 年，瑞典人代贝通曾到英国传授医疗体操；1846 年，那奥尔伊曾到法国和英国介绍瑞典体操；1850 年，英国出版的有关瑞典医疗体操的著作传入美国；1883

年，瑞典人尼森开始在美国传授瑞典体操；1884年以后，瑞典体操在丹麦流行起来。

在竞技体操中，最古老的器械之一是鞍马和跳马，大约在1500年以前就问世了。到了中世纪，每个骑士都要掌握包括体操在内的七种独立技能，体操中又以骑马为最重要，“跳马”练习很受重视。但当时“跳”的是活马，以后改为与真马外型完全一样的木马。18世纪末，德国体操兴起，维斯采用时去掉了“马头”，弗·扬采用时又去掉了“马尾”，1804年，古茨穆斯又把木马的马鞍换成了铁环，这就是现代鞍马的雏型。以后又用木环代替铁环。后来在障碍体操的影响下，又开始作跳跃练习，这就是支撑跳跃——跳马。

吊环亦有悠久的历史，我国的秋千就是它的前身，清代民间流传的“皮条”已很接近现代的静止吊环了。近代的吊环运动起源于法国，稍后传到了意大利和德国。1842年，德国的施皮斯制做了第一副现代吊环。

世界上第一副单杠出现于1812年。近代体操中的单杠运动，开始于德国维斯和古茨穆斯，发展于弗里得利希·扬。到1850年，将木棍换成了铁棒，产生了现代的单杠。双杠由德国的扬氏始创于1812年，其目的是为练习手臂支撑力量和为练习木马做准备，后来发展成为独立的器械项目。

高低杠出现得较晚，大约到19世纪后半叶，由于女子体操运动在欧洲盛行，为了适应女子的生理特点，对双杠进行了改装，出现了高低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正式列为比赛项目。

19世纪初，德国的古茨穆斯就把平衡木练习作为他所倡导的体操3大练习内容之一，并丰富了平衡木的动作。

自由体操是竞技体操的一项，它出现于19世纪初德国斯切普分萨尔教育学会的一次体育表演中，在1911年的第五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上才列为世界比赛项目。捷克斯洛伐克是竞技体操的故乡。19世纪60年代，体操运动发生了较大的变革。捷克斯洛伐克产生了“鹰”派体操，他们使竞技体操成为独立分支，并逐渐发展起来。“鹰”派体操的创始人是米·德尔士，他认为在不否认卫生、军事目的的前提下，体操练习最重要的是优美和吸引人。因此，不仅要求动作的外形美，还要求运动员穿着专门的体操服，并将自由体操和器械体操编成成套动作纳入比赛。1862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按上述要求举行了一次体操比赛，成为竞技体操的开端，这次比赛的规则成为最早的体操比赛规则。

(6) 田径运动的发展

田径运动是世界上起源最早的运动项目，据考证，迄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近现代的田径运动一般认为应从1653年算起，那时产生了田径史上第一个“现代”的记录：英国人克罗依顿用1小时25分钟跑完了从圣阿尔班斯到伦敦的路程。

英国是田径运动和许多现代竞技运动项目的发祥地。1830—1860年英国的一些大学已举行田径比赛。伊顿公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当时田径比赛的中心。1864年3月5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两个代表队进行了比赛。这次比赛被认为是现代田径比赛的重要开端。这次比赛

的获胜者及成绩是：达比赛厄以 10 秒 5 跑完 100 码，以 56 秒整跑完 440 码；劳埃斯以 4 分 56 秒跑完 1 英里；达尼埃尔以 $17\frac{3}{4}$ 秒跑完 120 码栏（栏高 1.06 米）；文恩—芬奇以 $26\frac{3}{4}$ 秒跑完 220 码栏；古茨创造了跳高 1.65 米和跳远 5.48 米的纪录。同年跨栏跑的栏架高度被公认并延续至今。1866 年在伦敦举行了包括 12 个项目的英国首次田径锦标赛。直到 1876 年美国才在纽约举行首次田径锦标赛。

近代的短跑比赛始于 1860 年前后，当时的英国已有短跑比赛的职业选手。计时是衡量跑得快慢的基本方法。1862 年 5 月 14 日，瑞士人尼科勒发明了跑表并取得了专利，从而解决了赛跑的计时问题。最早跑表的最小计量单位是半秒、 $\frac{1}{4}$ 秒、 $\frac{1}{5}$ 秒，后来才以 $\frac{1}{10}$ 秒计算。今天有了电子计时设备，成绩可精确到 1% 或 $\frac{1}{1000}$ 秒。1868 年，美国大学生柯蒂斯作为第一个业余短跑选手首次穿上了跑鞋。1888 年，美国那鲁大学的著名田径教练员墨菲的学生谢里尔首次采用了蹲踞式起跑。据说，居住在苏格兰的毛利人麦克唐纳尔德早在 1884 年就采用了这种起跑姿势，当时使看客目瞪口呆。

现代长跑的发祥地也是英国。18 世纪英国就有职业赛跑选手进行长跑比赛，有的长跑项目距离达 100 英里；大约在 1850 年有了业余长跑比赛。1893 年，首次举行了从维也纳到柏林的超长距离跑比赛，全程 578 公里。德国运动员阿·埃尔塞泽尔用 6 天 10 小时 35 分的时间跑完获胜。1896 年举行的首届现代奥运会上已有长跑项目，但只有马拉松赛跑（长跑指田径跑道上由 3000—10000 米；公路上 20000—30000 米及 1 小时以上的比赛项目；马拉松赛跑长 42195 米）。

竞走发源于英国。1867 年英国举行第一次竞走锦标赛。1870 年英国人托马斯创造了 20 英里场地竞走世界记录，成绩是 2 小时 47 分 55 秒。这是国际田联承认的最早的竞走世界记录。后来竞走运动传入北欧和美国，到 19 世纪 90 年代初，这一运动在德国也盛行起来。

在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德国著名的体育教育家古茨·姆茨和扬就把撑杆跳高作为一种体操来练习了。它作为正式运动竞技项目，第一次比赛是在 1866 年。在英国的法尔汉，惠勒跳过 3.047 米高度，成为英国第一位撑杆跳冠军。在兰开夏郡的尤尔沃斯通小城，有人用柞木或胡桃木制成的竿子来助跳高，创造了早期的撑杆技术。伍德伯恩用这一技术于 1874 年跳过 3.37 米高度。从 1879—1888 年，英国人赖依把撑杆跳高成绩多次提高。在 1887 年，他成为第一个跳过 3.52 米的人。

现代三级跳起源于爱尔兰和苏格兰。19 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形成了三级跳技术的几种流派，如“爱尔兰式”技术、“德国式”技术。后来的“国际式”三级跳技术就源于“爱尔兰式”。1873 年，爱尔兰人达利跳出 13.81 米的成绩，这是有案可查的最早的三级跳正式成绩。1887 年，澳大利亚的麦克曼纳斯和爱尔兰的巴塞尔分别跳出 14.98 米和 15.11 米的成绩。1888 年，爱尔兰人桑纳汉又把三级跳成绩提高到 15.25 米；1895 年，另一个爱尔兰人罗森格雷夫再次刷新世界纪录。创 15.26 米的好成绩。

跳高作为田径比赛项目，见于 1800 年苏格兰高地运动会。1866 年，利特尔和鲁佩尔以 1.75 米的成绩成为英国最早的跳高冠军。1876 年，菲肯以 1.65 米的成绩成为美国第一个跳高冠军。直到 19 世纪末，跨越式

是普遍流行的跳高技术。1800年，爱尔兰人达文用“远高式技术”越过1.90米；后来苏格兰人罗登以同样方式跳过1.97米。1892年，美国运动员斯韦尼发明剪式跳高技术；1895年，身高只有1.74米的斯韦尼创造了跳高1.97米的世界记录。

铅球运动的前身是古代的石块投掷。从投掷物来看，在铅球之前是炮弹。早在1340年就出现了圆型的炮弹，重16磅（7.257公斤）。按这个重量制成了灌铅的园球作为比赛器材，即后来的铅球。19世纪中叶，英国人斯通和米切尔分别把铅球推出11.57米和11.79米远。1872年英国人鲍尔第一个突破“12米大关”，创12.92米纪录；1883年美国入兰布莱希特又第一个破“13米大关”，取得13.10米的成绩。1885年爱尔兰人奥布莱恩把铅球推出13.39米远。

标枪比赛比近代体育史上大多数田径项目起步都要早。1792年在瑞典的法隆已有标枪比赛；希腊在1859年出现标枪比赛；1870年和1879年匈牙利和芬兰也开始举行这种比赛。1887年瑞典还有了标枪比赛记录，但当时标枪没有统一规格。标枪运动发源于北欧国家，成为北欧人的拿手项目。1886年，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运动会上，就有了现代男子掷标枪比赛。

掷链球是田径运动田赛掷部项目之一。1873年，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生首次把这一运动项目纳入运动会比赛项目，并规定了比赛方法和投掷距离。当时他们投的不是现在的链球，而且装有木柄的大铁锤，叫做“掷锤子”。1874年，剑桥大学的汉恩把“锤子”改为铅质的圆球，柄予以加长。后来又有人把木柄改为钢链，并加了把手。大约正是在这个时期，掷链球运动传入中国。

(7) 游泳、跳水和水球运动

游泳是一种古老的体育活动，但现代游泳是19世纪才出现的。19世纪初，蛙泳是第一种在游泳比赛中被采用的泳式。随着比赛的频繁进行，相继出现了侧泳、爬泳等。1875年8月24日，著名运动员马修·韦布采用蛙泳姿势横渡英吉利海峡，历时21小时45分钟。直到1904年第3届奥运会才把蛙泳与其它泳势分开，增设了男子400米蛙泳项目。1794年出现了原始仰泳技术。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几乎整个19世纪，仰泳均采用两臂同时在体侧向后划水、两腿做蛙泳的蹬夹水动作，所以当时也叫反蛙式仰泳。1902年，爬泳的技术被引用到仰泳中去。

现代花式跳水起源于德国。约翰·古特斯穆特斯（1759—1838年）被誉为“花式跳水之父”，在他的《游泳艺术教科书》中介绍了跳水技术。1853年，德国体育教育家奥托·克鲁克出版了《游泳和跳水》，提出了53种原地跳水动作，22种助跑跳水及14种其他姿势。到1870年，在该书的修订版本中已列出110种跳水姿势和动作。从此可见，19世纪跳水运动在德国已有很大发展，在竞技跳水出现之前，跳水的好坏是以高度来衡量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总是力求从更高的地方往下跳。1871年，美国人卓松曾在通往纽约的一座桥上往水里跳，高度是46米。1900年，瑞典运动员在第二届奥运会上作了精采的跳水表演。一般认为这是最早的现代竞技跳水。

随着游泳运动的开展，人们感到项目太少了，于是产生了水球运动。

1860年，在英国流行着两种非正式比赛：一种是抓鸭子比赛，即将鸭子放入水中，运动员下水抓鸭子，谁先抓住谁获胜；另一种是将苹果桶安上木制的马头，将桶扔到水里，人骑在木桶上，手握长勺，用勺打球。同时，英国有些地方的孩子们将足球踢到水里，在水中将球掷来抛去。为了竞赛的需要，1870年5月12日，伦敦游泳协会指定一个委员会来起草一份这种水上足球比赛的规则。这时，在苏格兰、英格兰某些地区，有球门的水中掷球竞赛已很流行。被公认的第一场正式水球比赛在1876年7月14日举行，由英国波内蒙斯首相划船俱乐部举办。19世纪末，水球开始传入美国以及欧洲大陆诸国，如德、奥、比、法、匈和瑞典等。

(8) 柔道和拳击

到19世纪，著名的柔术流派已达四、五十种。19世纪中叶，日本正值大动荡时期。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随着德川幕府的倒台，社会制度发生变革，模仿西方先进国家科学文明之风日盛，柔术被看作封建的东西，被列入摈弃之物。柔术家受到影响，有的消沉、隐居，有的替贵族当卫士，有的做杂耍表演，柔术面临着衰败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没落的武士依仗柔术，在社会上进行骚扰，欺侮平民，敲诈勒索，柔术成为一些浪士打架斗殴的工具，为社会各界蔑视和厌恶。1882年2月，嘉纳治五郎目睹柔术的日趋衰落，决心振兴柔术，改造柔术。于是，他觅访柔术高师，潜心钻研柔术奥妙，并吸收了中国武术的踢、打、摔、拿等动作，终于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柔术。为区别于以往的柔术，嘉纳称这种新柔术为“柔道”，并在下谷北稻荷町永昌寺内设道场（讲道馆）训练柔道。为鼓励学习和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于1883年建立了段位晋升制度，还逐步制定和健全了一套完整的柔道比赛规则，他的讲道馆成为当时日本柔道训练的中心。当时日本的柔术界对嘉纳传授柔道有许多非议、指责和对抗，因此，常有人到讲道馆寻衅闹事，柔道与柔术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1886年5月，在日本警察总监三岛通庸的倡议和亲自主持下，举行了柔道和柔术的大决战。当时，双方各出15人进行决战，结果，讲道馆柔道获大胜。这样，确立了讲道馆柔道在社会上的地位，使其声威大振。从此，日本的柔道在警视厅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体育运动，走上了兴旺发展的道路。

拳击亦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体育项目，19世纪中期得到迅速发展。1838年，在英国著名拳击家杰克·布劳顿拳击规则（1743年制定）的基础上，又颁布了新的《伦敦拳击锦标赛规则》。1853年又进行修改，正式规定了24呢（约7.30平方米）的拳击台，而且禁止用脚踢、头撞、牙咬和低击等动作。1867年，英国记者约翰·格拉汉·钱伯斯编写了新的拳击规则，这就是著名的昆斯伯里规则。这个规则直至1891年才被世界公认，从此，拳击才真正在世界上成为一项运动项目。

(9) 球类运动

近现代足球运动始于英国。1855年，英国谢菲尔德成立了第一个足球俱乐部，他们以剑桥大学的足球规则教当地的足球爱好者，并进行足球比赛。1863年10月，英国11个足球俱乐部在伦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足球协会，制定了最初的比赛规则，现代足球运动随之逐渐兴起。

最早的比赛阵形是英国人创造的“九锋一卫”式，即 9 个前锋，1 个后卫，再加一名守门员，共 11 人。1870 年，苏格兰人创造了“六锋四卫”式阵形。接着，英国人又创造了“1+2+3+5”的“塔式”阵形。这一阵形对当时世界足球运动的发展影响很大，体现了攻守力量的基本平衡。1872 年开始举办优胜杯赛，从而开展起全国性的足球运动。1875 年传入荷兰、丹麦；1882 年传至瑞士；1885 年德国也建立了足球组织。后来，又很快传入捷克和奥地利，以致于迅速普及全球。

篮球和排球运动均起源于 19 世纪末的美国。1891 年，美国马萨诸塞州春田青年会学校教授奈·史密斯，为了使学生不受寒冷天气的限制，能够在室内开展有益的运动，便想出将竹篮钉在墙上，让学生向篮子里投球，从而兴起了篮球运动。1892 年才制定了简单的 13 条规则。我国于 1896 年引入篮球运动，当时曾译为“筐球”。排球运动是马萨诸塞州霍利约克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威廉·摩根于 1895 年创造的一项球类游戏。首次排球赛是 1896 年在美国斯普林费尔特体育专科学校举行的。当时，出场人数由双方商定，不限多少，但必须相等；击球的次数也不限。当时，也没有固定的“名字”，后来有人叫它为“Volley ball”（“空中飞球”之意）。“排球”是中国人的叫法。

现代羽毛球也起源于英国。1870 年，出现了用羽毛、软木做的球和穿弦的球拍。1875 年，鲍弗特公爵在格拉斯哥郡伯明顿镇的庄园里进行了一次羽毛球游戏。从此，羽毛球运动便逐渐开展起来，“伯明顿”也成了羽毛球的英文名称。世界上第一部羽毛球比赛规则出现于印度的普那。3 年后，英国又制定了更加完善和统一的规则。1893 年，英国羽毛球协会成立，并于 1899 年举办了首届全英羽毛球锦标赛。

(10) 自行车比赛

自行车运动起源于欧洲。1800 年，俄国一个农奴工匠阿尔塔蒙诺夫用铁制做了一辆脚踏车。1808 年，法国巴黎出现了第一批木制脚踏车。1818 年，在英国、德国相继出现脚踏车。1865 年，法国米邵和他的助手拉尔曼又加以改进，在前轮上安上脚踏，发明家给这种车子取名为“自行车”。19 世纪末，自行车经过不断改进，受到人民的喜爱，并列入了体育竞赛项目，自行车运动便在欧洲逐渐开展起来。1883 年 7 月，在莫斯科赛马场上，举行了世界上第一次自行车比赛，引起人们极大兴趣。1893 年，举行了第一届世界赛车场锦标赛。1896 年在希腊举行的第一届奥运会上，自行车运动就被列为主要比赛项目之一。

(11)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恢复

近代体育运动的兴起促使希腊人首先产生恢复奥运会的念头和行动。1859—1889 年，希腊举行了 4 届奥运会。此间，德国一批建筑家和考古学家对古代奥林匹克遗址进行多年考察和发掘，使人们对古代奥运会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兴趣。19 世纪 80 年代，恢复奥运会成为许多人的心愿。1888 年，当法国教育家顾拜旦提出恢复奥运会之后，立即得到一些国家的响应。1894 年 6 月，顾拜旦在巴黎主持了一次国际体育会议，与会的 12 国代表一致同意在国际范围恢复四年一届的奥运会，并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会议决定于 1896 年举行

第一届国际奥运会，并委托希腊筹办。这届运动会在雅典举行，从而揭开了近代奥运会史的新篇章。

这届奥运会有 13 个国家 311 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游泳（包括跳水）、举重、摔跤、体操、自行车、射击、击剑等 8 个项目的比赛。女子仍被禁止参加。跨栏、三级跳和马拉松都列为本届奥运会的比赛项目。这届运动会有了 100 米和 400 米短跑比赛。随着首届国际奥运会的召开，非英语国家越来越多地以米制长度作为竞赛项目的距离。

这届运动会 100 米冠军的成绩是 12 秒。大会授予夺魁者橄榄枝环、月桂冠和一枚银质奖章；第二、三名获铜奖。希腊皇帝乔治一世亲临会场宣布运动会开幕。当时的雅典城有居民 12 万多人，入场券却售出 7 万张。奥运会的恢复大大促进了近代体育运动的国际化、规范化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国际社会的进步。

2. 世界卫生

(1) 医学卫生理论的发展

人类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人类健康与周围环境有密切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医学不断发展，改善环境的卫生知识和卫生措施也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实践。19 世纪的自然科学在物理、化学和生物等领域都有重大突破，进化论、细胞理论和能量守恒原理的发现，奠定了辩证唯物论的自然观，也为医学和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这一时期在医学科学领域形成了病理学、微生物学、生理学等基础医学学科。基础医学学科的出现给卫生学提供了实验的手段。而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条件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是极为恶劣的，这就造成了疾病的流行，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推出改善环境的措施。在这一背景下，首先在西欧出现了实验卫生学。许多卫生学家开始用实验的方法研究并阐明空气、水、土壤、住宅等生活环境和工厂车间、矿井等生产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提出了要迫切解决外界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以及环境和疾病的关系问题。这一时期已将预防医学分为流行病学与卫生学两大分支；卫生学又分为劳动卫生、环境卫生、营养及食品卫生等许多分支。

(2) 卫生立法和健康教育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前半期，一些国家开始通过有关卫生、安全和福利的立法，许多国家都有了保护童工、女工和保持公共卫生的法律。英国议会于 1757 年为泰晤士河上运煤工人颁布的一项法令是社会保险的第一范例。1802 年英国颁布《学徒健康与道德法》，以改善纺织厂童工的劳动条件。英国 1833 年的《工厂法》是现代工厂立法的先导。同年的《清除污染物与预防疾病法》和《澡堂与洗衣房法》是 1848 年《卫生法》的序曲。1883 年德国俾斯麦制定全国社会保险计划，从而为欧美社会性的立法树立了榜样。美国马萨诸塞州于 1842 年颁布《童工法》，宾夕法尼亚州禁止 12 岁以下孩子当童工，但收效不大。美国于 1878 年颁布《全国检疫法》，执行港口检疫，次年成立了全国卫生局。所有这些都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

健康教育又称卫生教育，它是一门有关维护和促进人们健康的应用科学，属于预防医学范畴。在西欧各国，健康教育最早起源于法国。在19世纪，法国政府首先颁布法令：要“关心学校卫生和儿童健康”。后来，各国相继仿效，称之为“卫生教育”。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卫生教育发展为两部分：一是学校卫生教育，对象是中小學生；二是社会卫生教育，对象是人民群众，目的是灌输卫生知识，培养卫生习惯。

(3) 与卫生相关的器械设备及用品的发明和改进

科技的进步和发明，不断改善人类生存的环境。暖气、自来水管系统、空调机、洗衣机、吸尘器的发明，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是有利于人类健康的。

古罗马的公共浴室和有钱人家的房子都装有地下火炉，它被认为是地面暖气的前身。18世纪末，发明家詹姆斯·瓦特在伯明翰市郊的工厂安装了第一套水蒸汽取暖设备。1851年，在英国定居的迈耶·阿姆谢尔·德·罗思柴尔德男爵为他的别墅安装了暖气和现代化自来水管系统。1899年美国出现了组合式散热器。1900年法国的夏佩公司也开始采用这种暖气装置。

世界上第一台空气调节器诞生于1881年。这一年7月的一天，美国第19届总统格菲尔德在华盛顿车站遭到枪击，后被送到医院抢救。可是病房里非常热，以致于使总统手术后无法休息。有关部门就把这个问题交给一个名叫多西的矿山工程师来解决。他根据空气膨胀吸热的原理在医院里装了一台空气压缩机，使病房的温度从摄氏30多度下降到25度。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空气调节器。

吸尘器的前身是吸气机。19世纪，吸气机一词专指各种使用吸管抽吸空气或其他气体的工业设备。制作一种能吸灰尘的机器是美国人首先想到的。麦克·加菲和布思先后于1869年、1901年申请了吸尘器专利。1907年美国斯普兰勒发明了第一台电动吸尘器。1906年，法国人比姆发明了一种手摇式吸尘器。

最早的洗衣机出现于19世纪，当时是一个木制盒子，用滚筒来回摇动。1830年英国一家洗染店首先使用蒸气洗衣机；1840年法国人设计出一种工业用双壳四格洗衣机。这种洗衣机用手柄驱动，下边装有排水阀门。1901年，美国人阿尔瓦·丁·费希尔设计并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电动洗衣机。

最早的洗碗机于1850年到1865年间出现在美国。这种洗碗机是根据原始的手柄驱动波轮式或喷射式洗衣机的原理制成的。1912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动洗碗机问世，美国从20年代开始小批量生产。

肥皂是重要的日用卫生清洁用品，原始肥皂有悠久的历史，但现代意义上的肥皂却是近代产生的。世界上最早的肥皂厂由英国建立。女王伊丽莎白时期，在布里斯托勒城建立了第1座肥皂厂，那是用煮化的羊脂混以烧碱和白垩土制成肥皂。1791年，法国勒布朗用硫酸处理海盐得到烧碱，他在巴黎附近建立了第1家制碱厂。他的代表作是用碱制作的路易十八的半身肥皂像，上边铭刻着：它将消除一切污迹。1823年，法国化学家谢弗勒尔证实，肥皂是各种化学成分精确组合的结果，同时发现了一种新的制皂原料——三油精。1873年，比利时工程师塞尔维又

取得了一项新成果，研制出纯碱制造法——氨碱法，使现代肥皂制造业发展起来。

(4) 一些良好卫生习惯的产生和发展

洗澡、刷牙都是良好的卫生习惯，也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的一种进步。在古希腊，洗澡既是一种卫生需要，也是一种礼节。贵客临门，第一件事就是招待客人沐浴（即洗澡）。营业性澡堂可能也是源于古希腊。我国的营业性室内澡堂从宋代开始。到了清代，澡堂业得以普遍发展。

刷牙用的牙刷可以说最早产生于印度，以树枝为牙刷。1780年英国一犯人威廉·阿迪斯用猪鬃和骨头为原材料制成了比较适用的牙刷。1840年牙刷在法国正式投产。19世纪中叶，医学研究证明，刷牙是保护牙齿和保持口腔卫生的必要措施，牙膏应运而生。牙膏制造者在调味和香气的研究方面狠下功夫，造出了各式各样的牙膏。挤出式牙膏管源于美国。1892年美国康涅狄格州牙科医生华盛顿·谢菲尔德设计了世界上最早的牙膏管。后来他成立谢菲尔德牙膏有限公司，使这种牙膏商品化。

口罩的普及是在19世纪。1895年，德国一位名叫赖德斯的病理学专家，证明空气传染同伤口感染有关，他认为谈话时唾沫会带菌而致伤口感染。经他建议，当时的医生、护士戴上了用纱布做的能掩上口、鼻的罩具，但鼻、口被紧紧包住，很不舒服。1899年一位法国人做了改进，把4层纱布的口罩缝在手术衣的后衣领上，用时往前翻下即可，后来，又有人在口罩两边钉上带子，系于头部或挂在两耳上，更为适用。此后，口罩走出手术室，进入民间。

(5) 护理事业的发展和国际红十字会

护理事业的发展 and 护士队伍的形成是世界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1854年，英国妇女南丁格尔（1820—1910年）组建了第一支护士队伍。当时正值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由于没有妥善的卫生服务，引起了公愤。南丁格尔组织了一批修女和护士进行战地救护，使伤病员死亡率由42%下降到2.2%。南丁格尔受到维多利亚女皇的褒奖。随后，她在伦敦圣托马斯医院里创办了一所护士学校。人们为了缅怀南丁格尔在战场上深更半夜寻找伤兵的功绩，誉她为“火炬之神”。后来全世界都把她视为伤兵救助事业的创始人。

1878年4月，在法国巴黎创办了第一所法国护士专科学校，不久很快发展到4所：皮赛特、拉萨拜特里也、拉比蒂埃和拉里博瓦西埃尔护士学校。

国际红十字会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1859年6月24日，法国与奥地利军在意大利北部的索弗利诺小镇附近交战，伤亡惨重，成千上万的伤员得不到及时救护。瑞士商人亨利·杜南偶经此地，为这目不忍睹的惨景所震惊。他四处奔波，动员当地居民救护伤员。回国后，他又撰文提出“准许医护人员进入战地救治伤员”的主张。1863年，他在几位好友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次年8月，由瑞士发起召开国际会议，签订了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成立了红十字会。为了肯定瑞士对红十字会的贡献，会议决定将瑞士的红底白十字国旗图案

变换为白底红十字，作为红十字会的标志。为了纪念红十字事业的创始人亨利·杜南，1948年，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协会第20次理事会宣布，将亨利·杜南的诞辰5月8日定为世界红十字日。

(6) 中国卫生事业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中国的卫生条件极差，人民的健康水平、劳动和生活条件日益下降，各种传染病广泛流行，人口死亡率很高。直到1905年才建立了管理全国卫生的行政机构，即在清政府警政部警保司下设卫生科，后改属民政部。以后民政部又改称内政部，卫生科改为卫生司，设在北京。

中国海港检疫的创始先于清政府中央卫生机构的建立。1873年，暹罗（今泰国）及马来西亚半岛流行霍乱病，传入中国上海和厦门。外国人把持下的两地海关先后制订了《海港卫生规则》，各口岸由海关派遣医师对进口船只实行检疫。医师均系外籍人士，只有中方1人。1883年，汕头海关仿照实施。1894年，在香港和广东流行鼠疫，各海关相继设检疫机构。天津曾在大沽设海港检疫管理站，汉口公布了《检疫章程》。

中医中药在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中药材有几千年的历史，是中国极宝贵的资源之一。19世纪中期，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中药材大黄与茶叶为主要出口商品。英国大量需求大黄。全国城乡普遍设有中药铺。北京最老的中药铺西鹤年堂发售饮片，同仁堂发售丸散。

中医和西医交流始于明末清初，至1840年，西方出版的关于中医的书籍约60余种，其中针灸学47种，而1581年至1851年，译为中文的西医书籍只有两种，均为解剖著作，以后逐渐有所增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开始出现“中西汇通派”。

鸦片战争前后西医传入中国。主要是外国教会打着“慈善”的旗号在中国行医，这也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政策的组成部分。基督教的医药事业是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结合在一起的。随着教会医院的开设，外商相继在中国设立西药房。1853年英商老德记药房在上海开业。以后在上海相继出现了德商科发药房（1868年）和英商屈臣氏药房（1886年）等，均以老德记药房为模本，到1889年发展成为资金雄厚的股份公司，并在天津、汉口和芜湖开设分店。1898年戊戌变法之时，梁启超等维新派也主张提倡西医。据1905年的材料，当时在华传教士3445人，其中行医者301人，办教会医院166个，诊所241家。

中国官方开办医院及西医教育始于洋务派，但始终没有大的起色。1863年（清同治二年）李鸿章雇佣“常胜军”镇压农民运动，曾聘请外国医生在松江、昆山开设军医院。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兴办了一些有益于社会的医药卫生事业。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许多中医医生参加了太平军，从事医疗工作。太平天国在进军过程中，明确提出要“努力护持老幼男女病伤”。建国后积极兴办医院，把医院、疗养院称为“能人馆”。洪仁玕当政时，在自己的住所设立一所医院，亲自领导给群众治病，并建议用庙宇和迷信费用建立医院。太平政权还张贴告示招聘医生，规定先考试后聘用；在政府里设国医1人，负责医疗卫生工作。太平天国还注意开展群众性卫生工作。

城市里设有“老民残废馆”，收养跛、盲、聋、哑、老残之人，让他们做力所能及之事，如打扫街道、维护城市清洁卫生；在乡村设立“乡兵”，负责洒扫街渠，清除垃圾，预防疾病的发生。

